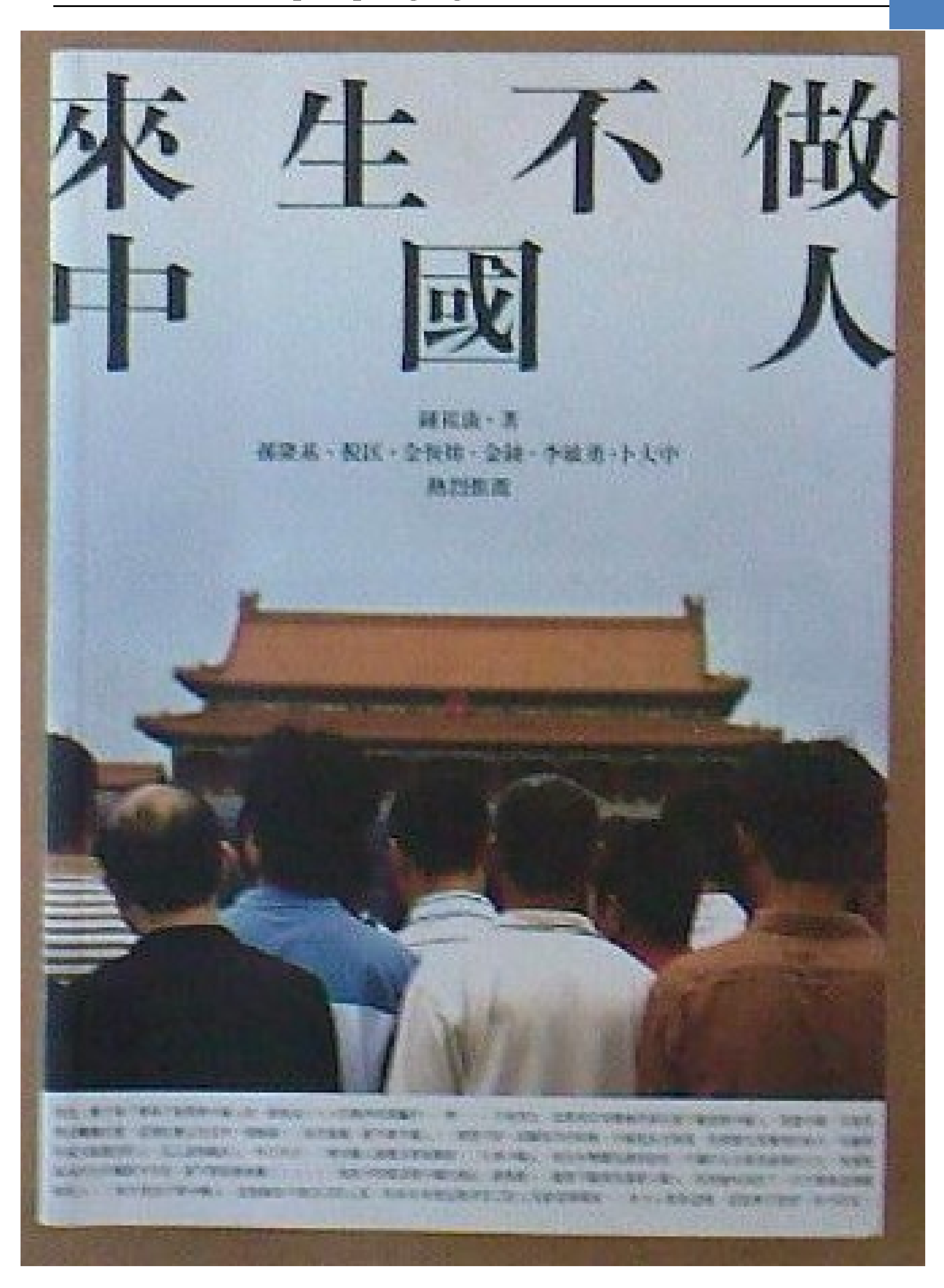

來生不做
中國人

来生不做中国人

作者：钟祖康

评论

这本书受到好评，在网络书柜类型的网络社群网站 aNobii 评分为 85%。科幻小说家倪匡及文化评论家李敏勇等人也对这本书好评不绝，当中倪匡更说："对于认为做中国人十分幸福的人来说，要读这本巨书，需要相当程度的勇气……需要一定程度追求真理的良知……不然，绝不适合观看……若真的要在学校进行所谓'爱国教育'，那么，《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就应该列入学生必读。"。

虽然受到好评，但由于内容的问题，亦受到不少批评，例如是有读者认为内容太过激进。

锺祖康——一个曾经在《开放杂志》看过的名字，这个名字以及他在杂志里的一些关于中国的篇章在我脑海留存着印象。我尚在郑南榕基金会担任董事长时，《开放杂志》的金钟来台湾时常见面，他偶而也会从香港来电谈论政治形势，杂志寄到郑南榕纪念会馆，阅读过后陈列出来。在郑南榕纪念馆里，一九八九年为言论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声音彷佛仍然听得见：「我是郑南榕，我是外省人第二代，我主张台湾独立!」那是那年四月七日，不久，中国的北京就发生 June Fourth 天安门事件。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一右一左，都以列宁式政党起家。在台湾，「中国」的经验：从前是从中国国民党，现在更从中国共产党去体会，中国文化也在他们的旗帜里宣扬着。

锺祖康的新书稿，《来生不做中国人》拿在手中捧读时，想起每一个被烙印中国人标记但又能够反思中国人虚实光影的人。在台湾，可以想起几个名字，他们在战后台湾历史的进程留下见证。在香港，在中国境内或在世界，有「中国人」身分者的中国反思，也有。但是，这毕竟是稀罕的声音。以一个在香港出生，成长并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锺祖康誓言来生不做中国人，在「中国崛起」的宣告甚嚣尘上的时际，特别令人感动。在不完全受到中国教育的条件下成长的锺祖康，或许才有这样的见地吧！」

我是没有去过中国的台湾人，但在成长的历程不乏对跑到台湾的中国人的接触。我的父执辈与我这个世代，分别经历日本殖民统治和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类殖民统治。父执辈比较两种外来统治，自是感触良多。中国之为祖国，是台湾人的痛，这是战后台湾历史的写照。而我，从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进与退：进占统治不久，就发生二二八事件；政权从中国流亡来台的白色恐怖；二〇〇〇年，失去绝对统治权力后，对民主化的不适应症候，反映在对台湾民主新政权的蛮横；以及对亡其国家条件的中国共产党的卑恭屈膝，样样铭刻五脏。

一九九七，香港从英联合王国的殖民统治转而成为中国的一国两制属地。名之为回归，其实是香港人无奈的接受命运。这样的际遇，与一九四五年，日本结束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而台湾人竟在祖国的迷障中迷惘地迎接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进占，迎接中国国民党以祖国之名的统治相似。左线开车的日本和英联合王国，在台湾和香港的殖民统治烙印了异于大清帝国，异于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化和经济形迹。台湾之被中国国民党政权接收，是因为祖国的迷障与迷惘；香港呢？

香港之被中国共产党接收，是眼睁地跳火坑。被中国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台湾人，因压迫、戒严，起而反抗，推进民主运动，改变了外来统治；而香港人呢？英联合王国的殖民统治，行政权的相对进步性让香港人忽略了寻求主权，失去了脱中国的机会，也缺乏民主的发展。

大限时，我有感而发写了《香港乱弹》和《变奏曲》两首诗，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下了历史的注脚。看香港人和在台湾附合在中国国民党体制的中国意识论者，不以问题意识看香港的变局，中国文化病理的令人反胃，让人作痛。

「大限
　　但他们称之为
　　回归
　　真是愈扯愈远
　　离谱而且
　　变调
　　……

殖民地的安魂之歌
　　以世纪末的华丽
　　张灯结彩
　　敲响丧钟欢迎祖国
　　…：
　　伊伊唔唔
　　琵琶配南胡
　　幕启时
　　善终」

— 〈香港乱弹〉

「…
　　五星旗蓄势待升
　　洋紫荆在风雨中
　　颤抖
　　远远望去
　　白纸黑字

近看原来是
忌中
……
咚咚隆咚呛
在欢乐颂里
演出跨世纪的安魂曲
唉唉唉唉
关掉电视」

—〈变奏曲〉

这样的经验，从台湾看香港，比起从香港看香港，从香港看中国，只能说是隔靴搔痒。看着一篇又一篇《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稿，看着锺祖康大无畏的反思中国的文章，那种劲儿和力道，那种鞭痛入里的感受，好像每一言每一语，每一字每一句，都直接从打字机打在脑海，那么鲜明那么有力。

锺祖康以文化看中国，而非以中国共产党看中国，大哉看也！中国文化的病理才是中国问题之所在。右翼的中国国民党和左翼的中国共产党，到头来一个样子。中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唉啊，什么样的进步观点到了中国，就被中国文化揉成一个样子。中国国民党以蓝色革命推翻帝制的大清帝国，带有民族革命色彩，但民主发展不全；中国共产党以红色革命推翻中华民国，带有社会革命色彩，但福祉的发展一样不全。吞噬近现代意义国家形式与内容的，原来就是中国文化这只巨兽！

台湾的中国迷障和迷网仍在，从前，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中国，现在则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台湾不是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视野；台湾也不是没有从世界其他国家译介的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台湾的自我认同也脱离中国的迷障和迷惘，不断随着民主化进程而升高。但存在于台湾的中国文化论者，中国意识论者仍然笼罩着乌云，一些国文学界以抢救文言文口号的掀风作浪，就是事例。迷失，浸染在中国文化染缸，自以为是的托古或食古不化，弥漫在某些文化、教育、传播层面。锺祖康的论述像是当头棒喝！在台湾，锺祖康的中国文化批评和反思，应该是非常有力的辩证。

被视为「中国人」，而对「中国」，对「中国文化」，能够深刻地批评，反思，必

须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而批评，反思具有说服力和动人之处，则必须具有见地，具有广博，深沉的视野。锺祖康异于「香港症候群」的地方是，他从北欧，特别是从挪威的国家发展经验，思考出来的对走资化的视为当然的批判。盛行在香港，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自圆其说的高利得掠夺性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奇迹」被复制。在锺祖康的书里是被批评的。这样的批评反映了对功利主义的文化思维，具有对人性真挚与善美的憧憬。

中国有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批评与反思。许多来自世界，分别为近、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批评，长期不受中国重视，也应当重视才对。锺祖康的文明批评视野，从文化、经济、政治的多重角度和层面，呈现他的多方多层多重观照。他不以中国为重，他不以香港为本位，他能够对台湾的民主化以正面去观照，去期待，更令人感动。看看世界的文明发展、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社会化，文化的优质化，若不从这样的视野去看一个国家，只感于「中国崛起」的「经济大国」幻影，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是一个大国，源于秦并六国的大一统思想加上中国文化里多重非人道，功利性，与近现代文明的人权，自由，民主相违的集体化动态，形塑出一个形态上的大国。台湾与香港都是在这形态大国动态历史中脱中国被殖民而演绎出不尽然文化中国性的蕞尔之地。去中国而有以致之的近现代文明观，也许引领的是更人性化的社会，而锺祖康在本书于所援引的北欧，特别是挪威，更是中国文化八竿子无关的小国，人性的善美与真实不断孕育着的国家，异于中国大而不当，华而不实的国家。来世不做中国人的锺祖康，既对中国探触究底，也对北欧观察入微，对照出选择之得以形成的关键。

世界许多国家惑于现实利益，无视中国之阴暗面。甚至在民主化的台湾，也有一些利己主义经济观，混合着大国崇拜的，尚未觉醒的中国迷障和迷惘。读一读锺祖康的见解，或许会混沌大开。一个在酱缸文化里膨胀，充满虚假的大国，在近现代人性化文明发展未必有贡献的大国，它的光里潜藏多少阴影？台湾人在民主化发展之路，在正常国家的建构之际，看看这本书吧！许多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人们，看看这本书吧！为什么，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生不做中国人？

晚间新闻里
我看见魏京生

来自挪威的消息
和平奖可能为中国
烙下一个印记

遥远的距离
在监狱之外

人权被镌刻在良心犯的心版
自由成为捆绑自由人的绳索

中国是一个法庭
中国是一座墓园

回荡着
哀悼生命的钟声

—〈中国〉

这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发表的一首诗，以人权与自由去衡量，去观照中国，才不会落入大国的深渊；也才不会落入中国文化的陷阱。诗里出现的挪威，就是锺祖康在书中一再引述的挪威，庆幸生为台湾人，在台湾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之路以棉薄之力参与的我，以〈中国〉这首诗做结尾，序介引人深省的锺祖康这本书。

卜大中

西方有些笑话是讽刺中国人的：如果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是中国人的话，就不会忤逆上帝的旨意受蛇的诱惑去吃苹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吃掉那条蛇。

停车场里有一百个停车位，德国人停一百辆车，因为他们精确。日本人停一百二十辆，因为他们车小。美国人停八十辆，因为他们车大。中国人只停两辆。为什么？一辆停入口，一辆停出口。

一家餐厅为了招来早起的顾客，推出早上第一个客人免费的策略。第一天，来了一个黑人，吃完后免费。隔天早上，老板一开门，发现门口一篮花，卡片上写着感谢的话。是昨天那位黑人送的。第二天第一个客人是白人，也免费，隔天早上老板一开门，门口摆了一篮苹果，是那白人送的。当天第一个客人是老中，免费，隔天早上老板一开门，发现什么？门口站满了老中。

今年 9 月，西方某杂志发表一项报告，是对西方女性做的一项问卷调查，询问她们对几国主要国家男人的看法。其中最令西方女人嫌恶的就是中国男人。她们认为中国男人的恶习是：不爱洗头、全身脏臭，尤其脚奇臭无比、爱吐痰、爱乱丢垃圾、没公德心、不爱干净、喜欢掏牙、抓头皮；喜欢留长小指头的指甲专挖鼻屎、耳屎，挖出还搓成一团仔细看，甚至拿来闻....

我在中国时看过他们的「痰吐不俗」奇技。只见他咳嗽一声，喉头发怪声开始累积浓痰，等累积足够之后，开始在嘴里呼噜呼噜团成一团，然后只见他双眼一瞪，丹田运气，吐气开声，呸地一声，脓痰激射而出，有如弹丸破空，呼地一声正中数公尺外的目的地——或痰盂、或水沟、或墙角、或树上、或路边，奇准无比，绝不落空。厉害的是不会半途飞散，一定集中，而且力道奇大。然后一脸的神气得意，悠然而去。在中国几乎人人有此神功，而且不吝当街表演。

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之后，祖国同胞携老协幼纷纷赶来，一时之间大乱。有人插队，有人狂呼大喊，有人就在园里当街尿尿，还发扬国粹在地上蹲一长蹓。有的母亲抱着孩子就在洗手槽里大小便。媒体大登特登，港人看不下去，纷纷上网批评。伟大又永不认错的中国愤青火大了，网上回嘴说：「劳动人民走累了，路边

蹲着歇歇不行吗？孩子来不及大小便，能不拉吗？」劳动人民什么时候有钱来香港玩迪斯尼了？不都是中国贪官污吏和资本家的家眷吗？

这本＜来生不做中国人＞很有意思，它不讲大道理，没有学术匠气，不从什么精神分析的马桶训练、肛门期退行等方向着手，只很明白地重现中国人那烂德行的现场，让大家欣赏。制作这面镜子的代价很高，包括作者会被痛骂成「汉奸」、「国际反华势力走狗」、「脱老祖宗裤子给洋人看」、「崇洋媚外」等等奇怪的咒骂。

锺祖康的文笔很好，有种奇特的魅力，会诱惑人停不下来地看下去。他是继鲁迅、柏杨以来，反省中国人民族性的新接棒人。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压制反省的民族，必无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中国眼前的畸形繁荣，像是个穿着华丽庸俗的暴发户，还站在路边撒尿一样，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敬。

谢谢锺祖康的警世言语。台湾读者看了本书也要反省，检讨我们自己从中国遗传了多少的烂基因还没清除掉？

我所认识的中国

锺祖康

1979 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魏京生因行使中国没有的言论自由而被判重刑。何以批评一下邓小平独裁就要坐牢 15 年？那时我 14 岁，对中国了解未深，对此判刑非常震撼，觉得一个政府只会是精神失常才会如此疯狂。但我肯定魏京生只是说出事实，因为这样的判刑正正就证明了邓小平确是非常独裁的暴君。

这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历史资料，而是活生生的事件，因而迫使我思考：为甚么中国这样恐怖？

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只管叫我们要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和有「四大发明」，而且那个那个朝代又东征西讨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从来不会有老师提起我惦念的魏京生。

而幸得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赏赐的资讯自由之福，我得以从香港认识到绝大部份中国大陆民众所不知道的中国大陆情况，我心里的疑惑就越来越大：难道这就是巍巍「五千年文明大国」的风采？

然而，人人都说，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干的，跟中国文化，甚至跟中国人也无关，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因为违背了中国文化才会这样做。中国依然是圣洁的。

1984 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敲定中国将会收回香港。鉴于中国乃以独裁残暴着称于世，而且整个会谈都禁止香港人参与，我认为这样的会谈和「中英联合声明」只应发生在奴隶身上，我还以为香港的意见领袖、传媒和知识界会群起声讨，但令我非常震惊的是，虽然这「声明」在英国本土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在香港却深受各界热烈赞美，就好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众人赞美皇帝的新衣真漂亮那样。

当时我感到非常迷惑，为甚么全世界，甚至包括香港绝大部份的所谓民主派，都说这「中英联合声明」是伟大杰作，却好像只有我觉得这是一份为奴隶而写却没有奴隶参与起草的移交奴隶协议书。记得那年的香港信报有限公司还出版了一本《荣耀全归邓小平的香港前途谈判》，为那个刚判了魏京生 15 年重刑的邓小平涂

脂抹粉。我就想，我们都是邓小平的未来奴隶而已，需不需要这样自作多情的妄自颂扬未来奴隶主呢？

当时我在疑惑，到底是我有问题呢，还是绝大部份的香港中国人有问题？但当我读到鲁迅说的：「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鲁迅书信集?致萧军、萧红》**1935** 年），我就更坚信我是对的。

后来，当我在香港这中国人社会的体验日深，我越看到，中国人即使不是在共产党奴役下也是大都非常自私、丑陋、无聊和「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当中尤以奴隶性最为触目。而且，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令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绌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其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你若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国或香港访问一下那里无数的中国人赤贫户，问他们是否想改革那万恶之源的政治体制？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已经被中国人的独裁统治折磨得生不如死，却不会因而反对这个独裁政权继续扩张领土，涂炭更多生灵，他们都拥护独裁的中国继续占领西藏或统一民主的台湾。其实，从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的角度着眼，也不该再让以暴殄天物、糟蹋自然闻名的中国人再把魔爪伸向任何净土吧。

当我观察和接触中国人越久，就越觉其不可爱，更不可敬，「礼义之邦」，口号而已。到后来，当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诬为不够文明的夷人时，一经对照，我更看清楚中国文明之假大空和好狡辩。

为了印证我的怀疑，我再多认识了一点中国历史，多读一点学校老师没有叫我看的中国古书，和涉猎一下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不得不相信：中国之胡天胡帝确实并非始于中国共产党。原来杀中国人最多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并非毛泽东才这样，而是向来如此，几千年来人人为逞一己私欲过皇帝瘾而杀戮不绝；以人肉为粮史不绝书；花费大量精力炮制出旷古绝今的酷刑；强迫妇女缠足令其形同残废达一千年之久，为中国人当上东亚病夫铺路；以儒家垄断中国思想达两千多年；响应儒家的超世俗肤浅教义令中国的宗教发展半死不活两千年，怕死的奴才不敢反抗暴政，怕死的主子炼丹以希求长生不老；响应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兼重男轻女思想令中国人口失控和有量无质，进而为求生存严重破坏中国生态；儒家思想也令中国社会走上极端形式主义的歪途。混帐繁衍，兹不尽录。当然，每一个民族在民智未开之时都会犯下累累大错，但像中国犯得那样深实属

罕见，特别是，极少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弱于反思祖先的错误，和精于为自己的民族过失辩护，把精力都花去寻觅邻居的臭虫。像中国那样缺乏反思能力的文明早就湮灭了，就像人体衰老就该死去的那样合乎自然。但奄奄一息的中国文明却拒绝适时而死，因为它存在的理想不是体验生命之真善美，而是像一般中国人那样但求「活着」，甚至是能够糟蹋他人生命就感满足。一个文明该死而不死，不肯适时而死，强行以极昂贵的仪器和活人的鲜血去延长其性命，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老大难的一大根源。

我所认识的中国恰恰就如鲁迅说的：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馀》1934 年）

也如历史学 家李弘祺 教授说：

「像这样的（中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为原则，也不以之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维护统治机关……中国这样的体制一让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为止，然后朝代循环，一切从新开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序言 2007 年）

于是，我对中国这个所谓「五千年璀灿文明大国」的开化程度疑心越来越大。甚至连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好古」看来也是假的。中国史学大师顾颉刚（1893—1980）就曾写道：

「曹植做了鄄城侯，那边有一座旧殿，是汉武帝的行宫，他拆毁了。因为有人假借了神话来反对，他就下令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馀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1935 年）

也许，这个永远长不大的中国老头子真的只有遇上优质的全面殖民统治才能得救，盲目的爱他只会令他更加狂妄、堕落。

本文集主要收录了我在过去几年在香港《开放》杂志刊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刊登时限于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于另外一本文集《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两者可一并阅读。

《开放》杂志负责人 金钟 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以被北京爷们相中、饲养和阉割为荣的地方却是非常罕见的。

最后，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锺祖康

2007 年 10 月　挪威

来生不做中国人

◎锺祖康

二零零六年九月四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旗下的网易文化在网上开始了一项中共统治五十多年来最为敏感的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九月十五日下午六时的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初段投票结果即时引发轩然大波，投票原定于十月十一日结束，但投票连同非常热烈的网友讨论随即于九月十五日被强行终止，而且有关网页也被删除。九月十六日，网易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同被解雇。

调查共给出十个选项，「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在那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是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有百分之十七点一是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有百分之七点八称就是不愿意，没有给出理由，有百分之零点七是因为「在中国不能恶搞」，有百分之零点四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好的动画片」。至于在那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称来生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十八是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没有别的原因」，有百分之六点六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给我自豪感」，有百分之六点二是因为「我要做龙的传人」，有百分之二点七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相信来生也会这样」，有百分之六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前景看好」。

被虐狂病患者上亿计

在一个自信可以睥睨全球、号称是英明领导爱民如子的所谓共产主义天堂｜｜中国，居然有百分之六十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大笑话、大丑闻，极大的国家机密。特别是，尽管中共几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强制全民洗脑和封锁资讯，但依然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并深深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这确是令我颇感意外，也肯定令中共领导人更感意外，而且面目无光。来自中国的朋友说，他对投票结果不感意外，只对有人有胆量做这个调查感到惊奇。我就希望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只想控制人民的今生，不管来世。

当然，说百分之六十的比率高，也只是以中国人的特有标准而言。若按一般文明人的标准，以中国大陆民众被奴役的悲惨程度，按理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九说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才算合理。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无药可救的被虐狂病患者已上亿计。

如果再看看这些网民的留言，你就看到这些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人并非戏言，而是态度相当认真，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感到无限讨厌、无奈、苦涩，对中共领导有咬牙切齿的愤恨。

请细读：「我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被罚做中国人的，罚做受ＸＸＸ的愚弄和欺骗的 …… 哭 …… 」

「不用来生，如果现在有机会我现在就不愿意做中国人，我爱中国，但是我无法继续去爱，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的贪官比哪都多，两级分化太严重了，如果有可能，现在就不愿做中国人!!!」

「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 」

「制度不好，但愿来世的时候，中国是民主制度，我深爱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愿那些成天说谎言的人，以人民为敌的人，早日死去。」

「做中国人感觉活着很憋屈。」

「生为中国人，我没有尊严我感到悲哀！中国的文化都是虚伪的文化！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我找不到爱这个中国的理由！请指教。」

「愿意不愿意我还是中国人，但我会叫我的下一代不要做这个国家的人。」

「来生我决不做中国人，这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没有理由要求自己

的人民爱这个国家。」

「为什么不愿意来生作中国人，因为不愿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

「我痛恨我为什么是个中国人。为什么生我的土地却要我办暂住证？」

「多少人都是这样，这是无可奈何，命中注定。」

「在我们所住的这个苹果里，发表言论说其他苹果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苹果要好，属于非法行为。根据这个事实，请问其他苹果是更好的可能性大，还是更坏的可能性大？」

「我都快三十了，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女友，一天到晚在工作压力中麻木度日，到公司快三年了，老板没有给我们加过一次工资，物价却在飞涨，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如果我还有梦也许就只剩下期望下辈子不再生在中国！」

「想想自己在中国降生后所走过的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我所经历的不幸，所有同龄人都能够一听就明白：刚刚学会说话就天天喊『饿』喊了三年，刚刚懂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意思，就天天喊『万岁』喊了十多年。再后来，我赶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却上错了车而被载到一个又一个没有权势的小衙门里，如今成了一个标准的穷人 …… 幸好，中国也有了互联网，我不必像前辈陶县令那样消失在荒野，而能够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失败者，隐遁到虚拟世界去打发自己馀下的垃圾人生。说来令人可笑的是，我在无望的现实人生中一败涂地，却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自认为有意义的生存方式，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发明互联网的美国人。但也仅此而已 …… 」。

实在是字字含悲凝恨。如此彻底绝望的悲号在一个民族或文明当中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民族或文明确确实实是彻底失败、原是不该存于世上，涂炭生灵的了，就像其他多个老朽不堪的所谓古文明永远消逝那样。但中国却大抵是靠着惊人的繁殖欲和繁殖力，和长期「无耻当道」（ survival of the meanest ）和不择手段而得以死拖活拉的苟延残喘下来。这样一个该死而不死、人多势众、论量而不论质的颓败末路文明，是很难再有任何出路的。更坏的是，这样的颓败末路文明，一方面通过贸易全球化扰乱全球的经济秩序，要全球无限量分担中国人的大毒瘤，

并以不合规格的中国式劣货残害全球民众健康，而且由于全国民众都厌恶再做中国人，都只希望逃到自由文明的地方重新做人。长此下去，玉石俱焚怕会早于和平演变的实现。

看来，一切都已太迟

这些网友的的悲愤之情，令我想起香港歌手卢巧音的名曲《好心分手》里的经典歌词：

「曾给你驯服到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赴过汤，蹈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坷。」

现在，相信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梦想，再不会希望领导人改邪归正，或希望国人重拾失落已久的人性，因为这是没有可能的，而且看来一切都已太迟了。他们的梦想就如这调查中的另一些网民说的那样：

「生在如瑞典、瑞士、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欧洲宁静的小国，并且有一个舒适的白领工作。然后一直和家人朋友们幸福地生活到老！ 」其实，这些地方不像中国，即使蓝领工作也是舒适的。

「我下半辈子很想找个安静有人性的小地方生活， 看到亲切的笑脸， 过上自然的生活，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打交道，有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我恨透了我现在不得已生活在中国杭州，我去了国外回来后，就越来越看不顺眼这里了。」中国人能够终于摆脱做「大国奴才」的虚荣，而宁愿作个蕞尔小邦的自由民，难能可贵。

「我爱我的祖国，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爱她的历史。但是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现在的中国人都带着虚伪的面具，高尚的外表下却是肮脏的灵魂，我要学着辨认每个面具后面的嘴脸，以防被暗剑所伤，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人活得太累。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到一个坦率的、充满爱心的国度渡过幸福浪漫的一生。」

很抱歉，只要你还是迷信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你还是不可能深刻反省，你的灵魂还是要在苦海飘零的。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铸成大错

◎ 钟祖康

中国人拜孔子为师，企图以道德取代宗教！结果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两样都落空。共产党和儒家如出一辙，以道德力取代宗教，这是中国人容易对共产主义起好感的原因之一，造就了弄虚做假的极端形式主义。

我常对外国人说，今天中国人跟外国人走的路是很不同的，中国人若要得到外国人一样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往往要比外国人付出多倍的血汗，甚至有时即使你愿意付出更多，也可能都得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并不单是靠我们自己，还和我们的祖先有关，要看他们在过去几百年，甚至是一两千年，是认真生活，还是胡混度日。

我对他们说，我们中国的祖先特别自先秦以还，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一步错一步，走一百步就错九十九步。需要认认真真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祖先都几乎交了白卷。他们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到繁文缛节、打拱作揖、草菅人命、研究酷刑、做圣人文章、终身投考科举、阴阳五行、炼丹、研究长生不老术、搞文字狱、压制异端、管生不管养的无限繁殖、包扎和清洗女人脚、品玩女人小脚、父母死在家守丧三年、节衣缩食用于厚葬、赌博、内战和吸鸦片等等数之不尽的愚行恶习上面，为了这些无聊事，恐怕已经花去了我们祖先八九成的时间（况且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短得多），即使他们真的还有善心、还有精力，还有脑袋想做点正经事，做点有益于我们这些后代的事，也不可能再有时间了。

宗教与道德在中国两皆落空

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也很不负责任的是，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于这些恶习，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一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以至发展之长期拆东墙补西墙、权宜度日反复沉沦，宗教信仰之支离破碎与功利化是一大病源。

我们的祖先怎样处理宗教呢？诚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拜孔子为师，企图以道德取代宗教！结果是，也必然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两样都落空。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儒家所做的如出一辙，都是企图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

教，这是中国人那么容易对共产主义起好感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结果也是一样：迫出了弄虚做假的极端形式主义。

孔子说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等一大堆非宗教化的话，但中国人却结果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乱神之邦！这还不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痛定思痛？否则，历史当然就要重演了。五十年来中共铺天盖地的政治口号总是与社会实情背驰，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而已。

「以道德取代宗教」摧毁了道德和宗教，也必然会令全民的精神陷于萎靡不振、人人贪生怕死、不惜以一切代价保存性命，这是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十九年世纪下半叶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 **Arthur Henderson Smith**（汉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就提到一段难得一见、意义重大的插曲。当时他多次看到在大饥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也不去附近有粮的地方要粮，而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是默默等死，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那些中国人不会联合起来与县官对质，争取救济呢？他认为，即使结果也是死路一条，但揭竿起义而死，总比饿死有价值吧。于是深谙汉语的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去追问那些等死的饥民，希望弄个明白。果然，饥民都只是众口一词说：「不敢！不敢！」

西方大科学家也需要宗教

梁漱溟说得很好，「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 ......不仅文化不甚高的时候如此，便是高等文化亦多托庇在一伟大宗教下，而孕育发展出来 ......盖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 ......此即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它一切莫不随之。」 (见《中国文化要义》)

的确，环顾当世的自由民主兼物质丰裕之邦，无不有其深厚的宗教信仰。能够没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而依然可以做到自由民主兼物质丰裕的，极之罕见，甚至没有。当然，有宗教信仰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保证（若遇到的宗教极其反智、极欠宽容），但若没有宗教或公然打压宗教，却几乎可以肯定说没有幸福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文明和人类幸福，宗教尽管不是足够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美国人没有宣布国教，但到今天还在钞票上印着 **In god we trust**（神乃吾信）；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表示效忠美国；在法庭作证，要举手向上帝宣誓；在庄重仪式上不忘说 **God bless America**（神佑美国）；所有欧美国家的节日绝大部分都缘宗教而来；英国奉圣公会为国教；在挪威，则不单以路德教为国教，政府负责全国全国路德教教会全部开支，也资助回教、佛教等任何其它宗教。尤有进者，宪法甚至规定政府执政班子中必须有过半数为路德教教徒，其它四个北欧国家也大同小异。这些洋人的科学水平远在中国之上，尚且对神必恭必敬；从伽利略、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波耳（**RobertBoyle**）、牛顿、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到爱因斯坦、个个对宗教怀虔敬之心，连当中对宗教较具怀疑精神的爱因斯坦也说「科学无宗教则瘸，宗教无科学则盲。」中国人有能力独辟蹊径，一边藐视甚至压制宗教一边以「西学为用」、「科技兴国」吗？

舍宗教造道德大国如水中捞月

历史已经说明，不论是儒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妄图以人的理性和内在道德力取代宗教，是一个集无知、狂妄甚至是人定胜天种种人性糟粕而成的超级灾难。要巩固社会上的道德伦理、建立社会秩序、解决人类对科学尽头的彷徨、对生老病死的恐惧和迷惘，宗教就是最方便、也是代价最低的灵药。

中国人自命实际，却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也再一次旁证了我一贯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没有大智能，只有小聪明、小权谋。他们硬要舍易取难，水中捞月，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礼义之邦」。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么？这还不算，当这个「道德大国」和「礼义之邦」终于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一，口是心非无双时，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么坚持自称「礼义之邦」，要么如鲁迅说的那样「以丑恶骄人」，以「祖传老病，夸示于众。」这个，真真是无药可救的了。

〈原载于 **2006** 年 **3** 月《开放杂志》〉

◎ 钟祖康

观察、研究了中国二十年，深深体会到理解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汉人之难，要描述汉人的行为已经很难，要解释其成因就更难。

的确，接触过来自欧、美、非等许多地方外国人的人都会同意，要了解他们心底的想法并不困难，但要确定一个汉人对某事的看法就大不容易。我发现，汉人向不同的人说不同话，也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言不由衷或见风转舵情况，相当普遍，这个行为习惯令人觉得汉人的看法和行为飘忽不定、难以触摸，而由于他们普遍「见人讲人话」，不同背景的人接触他们，或在不同时候接触他们，可会得到相当不同的反应和印象，这些反应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若放在一起，汉人给人的印象就会显得很费解、支离，可以很两极化。

汉人崇拜白人误尽苍生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过去十多年我问过逾百个到过中国大陆旅游的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的印象，答案中都几乎必定包括这样一句：他们很友善，很乐意帮助我们。所以都说很喜欢中国。由于这跟我对中国大陆的认识有太大差别，最初我感到他们的答复很费解，也以为他们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刻意奉承一下，但后来越来越多被访者也能说出他们获中国人民帮忙的细节来，我就肯定他们在大陆确是普遍得到礼待的，但为什么我自己或者我说认识的汉人在中国却几乎可以看尽人间的恶形恶相呢？　以至为什么最近两个民意调查均显示，竟有约两成到过大陆的香港人曾经在大陆遇劫呢？　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问的那些外国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白人，为此我去问了一些到过大陆的黑人或肤色深于黄色的人种，他们得到的待遇跟那些白人是完全不同的。

就单单汉人崇拜白人这一点，就足以严重误导了许多白人对汉人以至中国的理解。这情况在香港也严重，比如前阵子英国著名传媒人 **Martin Jacques** 在黑人爱妻因小恙在香港的医院失救不治后，就因为指医院因肤色歧视、救治不力而告上法庭，十分哄动。　其后 **Martin Jacques** 在一篇很感人的痛斥香港社会种族歧视的文章中称，他懂广东话的黑人妻子生前常常向他诉说怎样受到香港华人的歧视，但说他自己身为白人只感到香港人待他很好。　这个悲剧是汉人「见人讲人话」习性的一个极佳注脚。　因此，很吊诡的情况是，若是白人的话，在未到过中

国之前，可能还可以通过具深度的著作了解中国，但一亲身踏足过热衷于言不由衷、弄虚做假、奉迎白人的中国后，反而会大乱阵脚，完全失却原来已经不多的认识，严重的可会一辈子就这样被汉人的「变脸」牵着走。 到过中国受过汉人奉迎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简单的，罗素如果没有到过中国，恐怕他对中国的了解会准确得多；如果孟德斯鸠到过中国，恐怕就不会有「中国人是世上最不择手段的民族」 **(the most unscrupulous people on earth)** 这样精彩的判语。

说到底，白人由于其肤色根本就很难了解中国，这一点《纽约时报》美籍华裔记者伍洁芳 **(SherylWudunn)**在其名著 **China Wakes(**中国觉醒了**)**中就说很清楚，她说
“My Chinese looks were a ticket to view thereal side of China"(我一副中国人的脸孔让我得以目睹中国的真相 **)**，她说，她若不是黄脸孔，而是白人，那些官员就不会胆敢非礼她，她也不可以到寻常中国 **(**汉人**)**民众家庭登堂入室，亲历中国汉人最不想让外人**---**特别是白人**---**披露的一面。

汉人的行为反应不但为来者的肤色度身订造，也会细心考虑他们的权力大小、财富多寡、职业「贵贱」等诸多因素，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这样做看来并不感到痛苦，而且一旦受到质疑时多会死力

否认。尽管这种势利眼在外国社会也有，但决没有汉人社会那样铺天盖地，这种「见人讲人话」的猴子戏，几乎每个汉人都是专家，但洋人就不容易有这样的兴致。 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汉人此现像是孔子人伦关系等差论的延伸，是金耀基说的「身份取向」(**status-oriented**)、「特殊取向」 （**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及「关系取向」(**ascriptive orientation**)，是许烺光笔下的「处境取向」 **(situation-centered)** 。

在这汉人重重面具的障碍下，洋人特别是白人要理解汉人当然异常迷惘、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亲炙过中国的文化污泥，但汉人自己却也不见得很了解汉人，原因是他们已沉溺于中国大汉的文化污泥。

育儿方法斲丧是非观念

为什么汉人可以那么轻松的「见人讲人话」、见风转舵呢？ 这就得从汉人的道德是非观去解释。无可否认，汉人道德是非观之弱，是世所罕见的，今天的中国

显然已到了「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汉人父母 (甚至教师)对待儿童的恶劣方法。由于汉人父母一如一般汉人那样，都是弱于逻辑智辩而精于羞辱、暴力，也笃信只要动机良好就可以不择手段，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为了避免羞辱和皮肉之苦，不得不长期讲大话，捏造故事，甚至出卖兄弟姐妹，华盛顿勇于承认砍掉樱桃树的故事对传统汉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试问一个儿童在这种大话生涯中浸淫十至十五年甚至更长日子后，长大了有什么大话是会感到难以启齿的？ 鲁迅说得好：「……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 (见《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

无神论/泛神论摧毁道德约束

汉人讲大话不面红的第二个要因是汉人不是无神论者，就是泛神论者，结果在行为的道德尺度上毫无制约，因此汉人是彻底的世俗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就是一级的现实政治信徒。

任何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与汉人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汉人评价一个人的成就时，不会单看其正面的建树，也考虑其破坏能力，只要你有极巨大的破坏力，汉人也会欣赏你，甚至因而觉得你隐隐然有神力有杀气而奉你为神，因为任何人类由于其宗教本能，若缺了天上的神，就得早晚在地上造神。

汉人大都信奉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所以对强人甚至杀人魔王如史太林、希特勒、毛泽东或波尔布特等多不反感，甚至奉为偶像，这一点是让许多外国人感到费解甚而呕心的。正如中英会谈翻译吴吉平在其揭露了不少国家机密的回忆录《中英会谈风云录》中就印证了我的观察，就是「中国领导人对强有力的外国领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因此戴卓尔夫人……深受中国领导人欣赏。」但当然，由于这次铁娘子是为对付中国而来的，作者觉得「从后来访问的发展来看，中方是有点叶公好龙之嫌。」其实，中国领导人固然喜欢强人，中国平民也是一样喜欢那怕是暴虐苍生的强人的。

也由于汉人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许多人对近年冒起刚已作古的史学家黄仁宇的非道德化历史观如获至宝，因为他们终于为自己毫无道德约束的手段找到理论

依据，也视之为摆脱传统汉人所谓泛道德化的突破性贡献。

汉人之难解费解，让无数世人误认汉人喜好和谐、爱护自然、客观中庸、甚至友善、灵性、幽默、优雅……，实在是很滑稽的悲剧。

〈原载于 2001 年 5 月《开放杂志》〉

中国畸形崛起全球文明遭劫

◎ 钟祖康

许多中国人为中国的崛起感到亢奋，我却感到忧心，因为中国这种崛起是极不健全的畸形崛起。虽说一个衰弱的中国较一个强大的中国更可怕，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我发现，持此论调者通常没有较深入的认识到中国畸形崛起极有可能会带来的祸患。一般论者或多关注中国的透支式、竭泽而渔式生产作风会摧残全球生态，却大大忽视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祸患：

(1)全球文明国家会为了打进中国市场，而默许或认同中国许多违反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从而导致全球平均文明水平下降；

(2)由于中国崛起乃主要靠当局以武力控制近十亿劳动力、有效压制其劳工权益并由官商垄断经济成果而达致，这由当局控制的十亿奴工将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公平贸易，令全球文明地方的生产事业无辜焦头烂额；

(3)中国输出大量不合安全规格的产品，严重危害使用者的健康。

畸形崛起害苦全球

中国这十亿奴工的威力，不仅已反映于中国到去年近六千亿美元的出口总值，也见于中国长期成为反倾销最大被投诉户的地位。据《世界贸易组织半年度反倾销报告》指出，在 2005 年首六个月的 96 宗反倾销调查中，就有廿二宗即四分之一指向中国，情况最为严重。而当中更能说明中国货平通天下，无坚不摧的是，从 1995 年到 2004 年间，投诉中国反倾销的指控竟有三分之二来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穷国！

中国挟其庞大、廉宜和驯服的劳动力，逐步铲除了原本星散于全球的制造业，令其他穷国更穷，令富国失业率长期高踞，不然就要减少工作福利兼延长工时。全世界都因中国靠刻薄成家的畸形崛起而受罪。

过去许多资本家、理论家或野心家倡言在中国问题上应将经济跟政治分开处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当政治腐败和极权到某个程度，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经济问题；当一个政府可以操控数以亿计的人口，使之任其奴役，然后投入国际贸易，本身

就是摧毁其他循规蹈矩的国际贸易对手的必胜邪术。

极权统治难有「市场经济」

美国早在《1930 年关税法》中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一词称，「国家操控式经济」下的产品无法反映商品的真实价格，此法甚有远见，也合情合理，往后每用以反倾销的指控。这是为甚么中国现在非常渴求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更不时对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冷言冷语。一个共产国家居然强迫各国承认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就好比一只猴子强迫所有人承认自己像人类那样用两腿走路和没有尾巴，谁不承认就咬谁。这是个滑稽得令人窒息的中国式笑话。

在中国的不断苦缠、哭闹、利诱和施以公关计谋下，至今已有逾四十个国家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任何稍为认识中国经济的人都会觉得这是荒谬的，就如赵高指鹿为马那样，但在这问题上，世界上不是人人都有像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的本钱可以向中国说不的。但我深信，在中国对个别目标作更大的苦缠、哭闹、利诱和施以公关计谋下，美国、日本和欧盟也是早晚会加入指鹿为马行列的。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说到最好听，也只是非驴非马，怎称得上具有充分的「市场经济地位」呢？其次，一个在政治上如此极权的国家，一个自立国以来没有一个合法独立工会、藉此严厉操控劳工薪酬和福利的国家，有可能推行文明国家的「市场经济」吗？张五常说，「没有人否认，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奇迹，可能是历史上最神奇的。」而且「对得神奇」！又智珠在握地说，「中国做对了些什么？答案大致上我是找到了。」姑且不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否有 Thomas Rawski、Lester Thurow 或 Lawrence Klein 等教授所指的捏造灌水成份，但一个政权靠牢牢的操控着这十亿奴工、刻薄成家、发财不立品，又操控着外界用以了解问题真相的资讯，这种「经济发展」到底有甚么难度，有甚么神奇？

假冒伪劣产品怵目惊心

各国除了因中国的畸形崛起而无辜受刑之外，也极有可能被来自中国的劣质制品残害身体。外国人越来越爱买中国货，不但是因为输入的中国货越来越多，也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崛起后失去工作或工资被减而不得不改买廉价得多的中国货。但

中国国内产品的品质之劣，已到了灾难失控的地步，有没有可能生产平均素质合格、合乎人类使用的产品以供外销，实在极成疑问。请重温以下人尽皆知的中国产品新闻：

〈馊水污水粪水泡制臭豆腐〉
〈饮食中竟掺入罂粟成分贵州 215 家餐馆停业整顿〉
〈劣质奶粉充斥阜阳，上百婴儿受害近半死亡〉
〈毛发水酱油让人发毛〉
〈无铅汽油两成不合格〉
〈北京市质监局抽检显示北京灯具合格率不足两成〉
〈珠宝零售抽查仅三成合格〉
〈饼干四成不合格糖果两成不能吃〉
〈上海超过四成安全防护品不合格〉
〈深圳批发市场四成菜农药超标〉
〈每天 1500 斤蔬菜臭河涌中洗，河涌水镉元素超标 40 倍〉
〈广东近五成毛巾不合格〉
〈近五成雪糕不合格，部分大肠杆菌超标 24.4 倍〉
〈抽检显示儿童服装五成多有问题，玩具合格率仅为 5%〉
〈家俱抽检六成不合格〉
〈近八成童车不安全，两成多童装不合格〉
〈突查八家毛绒玩具厂，仅一家合格〉
〈广东毛绒玩具九成不合格〉
〈休闲服甲醛超标严重〉
〈粤香菇红白瓜子全不合格，木耳含过量铅汞，茶叶有残留农药〉
〈九成新轿车甲醛超标 5.6 倍以上〉
〈新车释苯气，京妇中毒亡〉
〈九成半内地啤酒甲醛超标 6 倍〉
〈木家俱甲醛超标近 8 倍〉
〈广东查出皮蛋铅超标 8 倍〉
〈穗餐馆纸巾细菌超标 17 倍〉
〈新车甲醛超标 26 倍〉
〈部分印刷厂甲苯超标 30 倍〉
〈苏浙查获有毒茶叶，染色碧螺春含铅超标 60 倍〉

〈福建查获有毒龙眼 1300 公斤，二氧化硫超标 100 倍〉
〈废胶制饭盒致癌、有害成分超标 160 倍〉
〈熟食大肠杆菌超标 160 倍〉
〈部分冷饮大肠菌群高于标准值 240 倍〉
〈「菊花茶」硫磺熏制，厂家自称的「纯天然饮品」菊花茶，二氧化硫含量超标 2000 多倍〉
〈江西劣质口服液细菌超标逾万倍〉
〈「雪牌」美颜霜，水银超标 3 万倍〉
〈消毒湿巾竟然细菌超标数万倍〉
〈北京特殊化妆品四成合格，祛斑品汞含量超标 4 万倍)
〈「娃哈哈」乳酸菌饮料：细菌超标 8 万倍〉
〈祛斑化妆品汞超标 10 万倍〉！

像这样一个极度污染、粗制滥造兼弄虚作假的国家，居然成为世界工厂，也够荒唐、危险吧。可是，绝大部份外国人在中国官民合力长期宣传下，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个极富文明之邦，哪会想到中国为自己人制造的产品会恶劣到这个地步，哪会相信中国人会那样的丧尽天良。起码在我接触过讨论过这问题的数以十计外国人中，没有一个对中国产品有这样的认识，而且也不会相信〈他们充其量只知道国际传媒广泛报导的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婴事件〉，直到我揭示有关资料和数字之后，他们才吓得发呆。我对他们说，中国人这样弄虚作假并不纯是因为穷〈譬如比中国更穷的地方也不闻有类似事件发生〉，最重要的是，人的价值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极其轻贱的，加上伦理道德上毫无制约，复因中共 50 年来对人性价值和理想主义的摧残，坑蒙混骗已成中国国技，即使谋财害命也多视作等闲。

黄祸在望文明遭劫

中国人为自己同胞制造的产品低劣得如此触目惊心，为老外生产时是否就可以一下子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样的戏剧性呢？我看是，既无心，也无力。早前首批欲进军欧洲市场的国产陆风牌〈Landwind〉越野车在德国的「车毁人亡」式安全测试报告〈怕还没有测试车内的甲醛和苯含量〉，就已说明许多问题。这是为甚么中国每年因安全、卫生超标犯例而给退运的出口货量惊人。但中国当局大抵为了面子，恒称这些因安全超标造成的退运为外国用以刁难中国的「绿色壁垒」。关注中国环境的万洪富教授就指出，农业生产污染物指标，联合国有 2522 项，美国有四千多项，而中国仅涉及 62 种，甚至连二恶英这类强致癌物，都不

在「黑名单」上，「我国的『绿色食品』，在发达国家看来，甚至连『安全食品』都算不？」一直为中国食品安全奔走呼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之多独一无二，特别是氮肥，中国有着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但是氮肥的使用量却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居世界之首。这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导致了在食品中的有害残留；并称，以畜禽粪便作有机肥生产绿色蔬菜也有问题，原因是养殖业大量使用化学药物和微量元素以饲喂畜禽，畜禽粪便本身就是污染之源。的确，中国生产的许多食品特别是肉类由于严重超标而长期被摒诸欧盟门外，大都只能倾销到香港或非欧盟国家。

然而，各国海关也只能抽样检查进口货，加上中国货排山倒海而来，漏网之鱼必不在少数，加上通过非正规途经、不经本国政府抽检的进口货，日积月累，有多少玩具、茶叶中的铅、多少肉类中的抗生素、多少成衣中的甲醛侵进欧美国家的使用者体内，从而窒碍当地儿童智力的发展，摧残当地人的体质，令世界的文明地带「中国化」，这才是最吓人的黄祸。

〈原载于 **2005 年 12 月《开放杂志》**〉

回教世界与中国何以友好？

◎ 钟祖康

哈佛大学杭廷顿教授〈 Samuel Huntington ， 1927-〉在其《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一书中，说害怕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结盟，从中共年来对回教世界的武器供应，以及中共与回教国家之间如胶似漆的亲昵表现，这个忧虑确是甚有道理的。

但这现象实在耐人寻味。查中国对回教徒的残害与侮辱，罄竹难书，世所罕见，清朝为镇压西北部的回乱(即回民口中的「起义」)，铲平回教汗国，先后屠杀回民以千万计，令十字军东征中死难回民之惨烈也相形见绌，令以色列的暴行也显得琐碎。中共掌政，长期残暴镇压西北部回民的立国或复国运动，文革期间更曾胆敢鼓励回民吃猪肉，强迫回民养猪，关闭清真寺，甚至强迫回民仿猪爬、学猪叫，甚至戴猪头，挂猪肠子游斗。

再以整体文化格局而言，中国人彻底世俗，宗教精神荡然，一切利字当头，万事以吃为先。回教视猪、狗和病死动物为「不洁」，生人勿近，中国人居然通通放进嘴里大嚼。一个笃信无神、多神或泛神，一个坚信一神。一个不准借贷附利息，一个是高利贷之邦。论情操，一个贪生怕死，或为财而死，一个为了宗教信念视死如归，连中国的残暴狡诈也无法将之根灭。唯其如是，伊斯兰世界还是看来与中国异常友好。除了美国这个共同敌人令他们团结起来之外，到底还有甚么原因？

践踏人权声气相投

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在某些很重要的价值观上出奇一致，譬如对人权、民主、平等等概念的蔑视。别的不说，伊斯兰世界对妇女的压迫，和中国对老百姓的压迫，已经难以见容于现代文明世界。虽然无数中国人仍然执信「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但现代文明世界也已经不容许父母虐待子女，也不容许政府虐待国民。「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的中世纪奴隶主法宝已经失效。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同样以中世纪的价值观勉强拐进现代文明世界，举步维艰，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完全不会理会自己虐妻虐儿、为所欲为的朋友。这实在是很美妙的享受，对于挽回过气世界盟主的一点点尊严和自我，尤为重要。这就是所谓「不得干预别国内政」的义蕴所在。

但「不得干预别国内政」也很容易发挥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譬如俄罗斯血洗信奉回教的车臣，波斯尼亚、科索沃的回教徒惨被种族清洗，中共仍以「不干预别国内政」为由，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而且还豺狼塞路。同样讽刺的是，搭救这些回教徒的居然是伊斯兰世界视为死敌，并且是信奉基督教的美国。

过去，伊斯兰世界跟中国同样发展了一些相当灿烂的科技文明，前者有阿拉伯数字〈最初从印度传入〉、十进位制、代数学等，后者则有纸张、印刷术、火药、罗盘等等，单看这些，谁不肃然起敬，焚香顶礼呢？但两者却始终发展不出、也拒绝移殖自由、人权、宽容这些精神文明，结果是糟蹋了无数技术发明。伊斯兰世界跟中国都因为欠缺了这些精神文明而由盛而衰，同样两者至今都没有对其「死因」深刻反省。从这一点看，这两个文明却又是性相近，大有物以类聚的先天条件的。

中国领导两面人误导回教领袖

伊斯兰世界居然和中国异常友好的另一原因是，中国人 -----或者说是中国领导-----热衷于弄虚作假，演猴子戏。这一点过去我已略有论及，最近在克林顿刚出版的自传中再得印证。克林顿在书中这样推崇江泽民「他迷人、风趣 ……总会聆听不同意见。」 (He was intriguing ，funny.....always willing to listen t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香港人恐怕不会有几个会觉得江泽民风趣，和乐于聆听不同意见，倒会想起他大骂香港记者「听风就是雨」、「闷声发大财」，too simple sometimes too naive 时的凶相。即使是深受当局洗脑的大陆民众，相信也不会对江泽民有克林顿这样的正面评价。但我相信克林顿这样说不尽是外交辞令，也是发自内心。原因是中国领导人素来有一传统，就是对着国民扳起脸孔，呼奴喝婢，对着洋人就嬉皮笑脸，讨洋人欢心。江泽民敢搥胸顿足的教训美国记者，教训访问他的华莱士〈 Mike Wallace，l918-〉「听风就是雨」、「闷声发大财」、「头脑简单」吗？江泽民会见克林顿时敢不装得泱泱大度、侧耳聆听克林顿的意见吗？你甚么时候会看见江泽民对着中国人民会嚷着要乱弹琴，作天才表现的？又或听到他在中国人民面前朗诵林肯谊歌「民有、民治、民享」的盖茨堡献词？连精明、直言得多的前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女士〈 Madeleine Albright ，1937-〉也只是略带尖酸的说江泽民「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柴郡猫常咧嘴而笑，好想倾倒众生，却弄出几分奸相来。」〈 Cheshire cat，somebody whotries to be charming ，but is quite wily.〉就是说，他们即使不觉得江风趣，也觉得他滑稽而已。这与我们对江的负面印象

还是颇有距离。

在洋人面前，特别在美国人面前，连神圣不可侵犯的邓小平也得哈腰卖乖，欣然戴上一顶大得惹笑的牛仔帽向着记者扮鬼脸，矮化自己，美国民众怎能想象得到这就是囚禁魏京生二十年、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他们怎会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虚伪做作的民族？在公开场合尚且如此，关起门来怎样吮痈舐痔、「有辱国体」真的不敢想象。毛泽东关起门来就对日本的访问团说不用为侵略中国感到内疚，更遑论道歉。但中国领导人或讨或逗平民开心，与民同乐，只会发生在外国，中国民众是没有这个福份的，因为「宁予外族、不予家奴」仍然是中国政治的铁律。中国领导曲意逢迎外人的伎俩，外国人是极难识破的，这对促进外国政府对中国友好，作用极大。中国统治者历来虐待同胞，善待外人，令即使是广受尊崇的人权斗士如曼德拉，也不得不像玉通和尚被红莲「破身」那样，拥护起比南非白人政权更野蛮的中共政权来。中共领导一手打压新疆争取摆脱暴政或复国的回民，另一手嬉皮笑脸的向回教国家领袖讨好卖乖，寻常回教领袖又怎能洞触其奸？

还是因误会而结合

但要是伊斯兰世界真的与中国那样水乳交融，为甚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与华人的关系那样恶劣呢？看看奈波尔〈 V.S.Naipaul，1932-〉在其大作《在信徒的国度：回教之旅》〈 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中在这两地的游历和深度文化探讨，就可见即使是较世俗的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回教徒也是跟中国人「同住难」的。当然，中国境内的回教徒也是难以与中国人同住的，但中国的社会控制和资讯封锁远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严厉，要了解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相遇的境况，观察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容易得多。也许有人在传媒上看到以色列或美国治下的回教徒很惨，但要是统治以色列和美国的是中国人，相信那里的回教徒连被传媒报导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一切都是「国家机密」！可笑的是，许多人，当中甚至包括回教徒，就是因为美国容许报导回教徒对美国迫害的指控，而中国则严禁报导回教徒对中国迫害的指控，而相信美国就是回教徒的头号敌人，而中国就是回教徒的老朋友。看来伊斯兰世界之所以能够普遍和中国保持友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大批移民到这些回教国家，以致双方都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对方，继续作搔不着痒处的蜻蜓点水式文化交流。彼此继续雾里看花，保持距离，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一步结盟的必要条件。就如中国的邻国很容易讨厌中国，你去问一问印度、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等国家的人就知道，但千里之外、连中国、台湾也无从分辨

的国家却每每美化中国那样，都是离不开「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的人间定律。

〈原载于 **2004 年 8 月《开放杂志》**〉

中国文明到了该死的时候

◎ 钟祖康

● 过去一年多在挪威解答了数以百计当地人或新移民对中国的疑问，来来去去还是环绕着几个老大问题，他们听后都大有茅塞顿开的舒畅。我且整理其要，与众同乐。

来挪威一年多了，我就像个好奇的稚童闯进五光十色的大观园那样，流连不去。许多当地人请我比较挪威和香港或中国。我总是说，差别实在太大了，这几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他们看了我呈上的香港笼民照片后已同意香港跟挪威极不相同，觉得香港笼民的待遇显然连这里畜生也不如，等我再拿出来广东婴儿汤照片后，他们往往已经呕心得无法再跟我讨论下去。

他们问，为甚么中国会搞成这样呢？我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过去几千年做错的事太多太多了，而且又是大错特错，今天不沦落也是说不过去的。香港比大陆文明一点，也只是英国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功而已。

中国文化崇尚空谈不落实处

中国人的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空谈，甚么“礼义廉耻”、“天下为公”、“五讲四美”之类都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就如中国文化大师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一个 “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用英语的概念来讲，中国人讲的中国文化十九是理想文化，即 **ideal culture** ，而不是现实文化 **realculture**，这是许多中国人甚至大学教授读了一辈子中国书还是昏昏然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外国人被中国文化迷惑，感到无所适从的罪魁之一。只要明白中国人爱讲理想文化少提现实文化这一点，你已经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命门，不会错到哪里去。

任何文明，不是理所当然的非要长生不老千秋万世不可的。一个文明如果已经老迈不堪，以致必要以极昂贵的方法延续残生，如学者说的 “杀子文化”，不断以年幼者的血液来为大人老者养命，又或必要“以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之类，那么这个文明确实已到了该死的时候。该死而死，是要额手称庆，鼓盆而歌的，就如古罗马帝国和其他几个所谓人类古文明的消逝一样。尽管这些帝国或文明在生时都以为自己必垂诸千秋万载，否则世界就会末日。中国比这些已消逝的文明都更狂妄自大，更自我中心，你看看它的名字“中国”自夸在万国之中。但中国人

一般不会觉得这有甚么问题。

中国传统留下许多坏东西

譬如在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思想，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阶级制度、人伦差等和奴才社会的儒教，将忠孝繁殖后代这些价值提升到荒唐胡闹的地步，更胡闹的是，这个 “后代”也仅指男性而言。

另外压抑正规宗教，捆绑妇女天足一千年，纵容皇权两千年，糟蹋生态环境三、四千年，而且越演越烈。最近几位洋学者出了几本关于中国人从古到今糟蹋环境生态的好书，你不妨看看。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的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大象的撤退｜｜中国环境史》），讲述中国人怎样在过去四千年摧残大自然，终令原本四散于中原的大象几乎绝迹于中国；第二本是夏竹丽（**Judith Shapiro**）的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China**（《人定胜天：革命时代中国的政治与环境》），讲述毛泽东糟蹋中国生态的荒唐史；第三本是 **Elizabeth C. Economy** 的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变黑的河流：中国前途的环境挑战》），讲述中国怎样拥有全球最污染城市中的六个，在那里儿童一天吸入的废气等于吸食两包香烟，四分之三流经城市的河流不宜饮用或养鱼等。

这是中国人讲一套做一套的传统。而且中国人都万众一口的说中国人崇尚自然，外人又怎敢造次，不为所惑呢？所以中国文化中有极大的欺骗性，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大师梁漱溟说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

如果让日本占领全中国如何？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良药苦口，但也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中国起码胡混了两千多年，到清中叶以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整个社会其实已是一具活死人。西方列强的文明对中国来说是求之而不得的补品，所以我们若真的要怪罪于西方列强，那就是这些列强没有以更强硬果断的手法管治中国，促使国人如中国爱国者梁启超那样呼吁国人对日治下的台湾 “虚心效之”，或如另一个中国爱国

者孙中山那样呼吁将英治下的香港模式传遍中国。

我相信，若列强当时能一鼓作气将中国全面殖民，或将中国瓜分，后果都很难比今天的情况更坏。虽然中国人都很擅于将异族异地殖民，也对以他们看来是高人一等的汉文明取代异族的文明甚感自豪，甚至以提升野蛮人的文明为天职。但当中国遇到在自己之上的文明时，却极端抗拒被人教化、提升。中国拒绝教化、提升的后果，只是伤害了自己。

中国文明该死而不死的代价

◎ 钟祖康

来了挪威一年多了，我就像个好奇的稚童闯进了令人目眩的大观园那样，留连不去。许多当地人请我比较挪威和香港或中国。我总是说，差别实在太大了，这几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我解释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仍然以婴儿肉做菜，或者这里的人也没有人要像成千上万香港人那样居于笼屋，而是还别有其他。尽管这样，他们看了我呈上的香港笼民照片后已同意香港跟挪威极不相同，觉得香港笼民的待遇显然连这里的畜生也不如，等我再呈上广东婴儿汤照片后，他们往往已经恶心得无法再跟我讨论下去。

他们问，为甚么中国会搞成这样呢？我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过去几千年做错的事太多太多了，而且这些错都是看来严重得鬼哭神号的大错特错，今天不沦落也是说不过去的。香港比大陆文明一点，也只是英国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功。

书本上不是说中国有五千年伟大文明吗？

中国人的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空谈，甚么「礼义廉耻」、「天下为公」、「五讲四美」之类都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就如中国文化大师梁漱溟 (1893-1988)说，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用英语的概念来讲，中国人讲的中国文化十倨其九是理想文化，即 idealculture，而不是现实文化 (real culture)，这是许多中国人甚至大学教授读了一辈子中国书还是以其昏昏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外国人被中国文化迷惑，感到无所适从的罪魁之一。只要明白中国人爱讲理想文化少提现实文化这一点，你已经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命门，不会错到哪里去。

你为甚么不为中国文明的衰落而难过呢？

任何文明，不是理所当然的非要长生不老千秋万世不可的。一个文明如果已经老迈不堪，以至必要以极昂贵的方法延续残生，如郭巨「为母埋儿」式的「杀子文化」，又或如邓小平说的「以死二十万，

换二十年稳定」之类，那么这个文明确实已到了该死的时候。该死而死，简直是要狂欢庆祝的，就如古罗马帝国和其他几个所谓人类古文明的消逝一样。要是那

个已堕落腐败的罗马帝国也像中华帝国那样用尽一切活命手段，如匪夷所思的思想控制、愚民政策、非人酷刑和疯狂杀戮等等，说不定也能死拖活拉到今天。在技术上罗马帝国和其他已消逝文明是完全有可能这样做的，只是世界上绝大部份民族也不会堕落到中国人那样，为求自己活命而彻底不择手段。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若跟今天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信众的迫害比较，简直是微不足道。该死的死不了，这是好事，还是人类大灾难？尽管那些已堕落腐败的帝国或文明在生时总会以为自己必垂诸千秋万载，而且笃信没有了他们世界就会末日，但是在他们灭绝之后，世界居然没有因而终结，甚至看来是变得比以前活得更好。中国比这些已消逝的文明都更狂妄自大，更自我中心，你看看它的名字「中国」 -----自夸在万国之中，不仅无知，简直是狂妄。但中国人一般不会觉得这有甚么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

那么中国人的祖先犯了些甚么大错呢？

譬如在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思想，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阶级制度、人伦差等和奴才社会的儒教，将忠、孝、繁殖后代这些价值提升到荒唐胡闹的地步，更 胡闹的是，这个「后代」也仅指男性而言。另外压抑正规宗教，捆绑妇女天足一千年，纵容皇权两千年，糟塌生态环境三、四千年，而且越演越烈。最近几位洋学者 出了几本关于中国人从古到今蹧蹋环境生态的好书，你不妨看看。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1938-**)的《大象的撤退---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History of China**〉，讲述中国人怎样在过去四千年摧残大自然，终令原本四散于中原的大象几乎绝迹于中国；第二本是夏竹丽 (**Judith Shapiro**，**1953-**) 的《人定胜天:革命时代中国的政治与环境》〈 **Mao's War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讲述毛泽东糟蹋中国生态的荒唐史；第三本是 **Elizabeth C.Economy** 的《变黑的河流：中国前途的环境挑战》〈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Environmental Challenlge to China's Future** 〉，讲述中国怎样拥有全球最污染城市中的六个，在最污染的城市儿童一天吸入的废气等于吸食两包香烟，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受酸雨侵蚀，全国四分之三流经城市的河流不宜人类饮用或养鱼，在广东省某个处理电路板的地方，水中含铅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标准的两千四百倍等等。

但为甚么那么多人仍然歌颂中国人崇尚自然呢？

这是中国人讲一套做一套的传统。而且中国人都万众一口的说中国人崇尚自然，外人又怎敢造次，不为所惑呢？所以中国文化中有极大的欺骗性，归根结柢，还是如中国文化大师梁漱溟说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西方的侵略须为中国的没落负责吗？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良药苦口，但也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中国起码胡混了两千多年，到清中叶以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整个社会其实已是一具活死人。西方列强的文明对中国来说是求之而不得的补品，所以我们若真的要怪罪于西方列强，那就是这些列强没有以更强硬果断的手法管治中国，促使国人如中国爱国者梁启超那样呼吁国人对日治下的台湾「虚心效之」，或如另一个中国爱国者孙中山那样呼吁将英治下的香港模式传遍中国。

我相信，若列强当时能一鼓作气将中国全面殖民，或将中国瓜分，后果都很难比今天的情况更坏。虽然中国人都很擅于将异族异地殖民，也对以他们看来是高人一等的汉文明取代异族的文明甚感自豪，甚至以提升野蛮人的文明为天职。但当中国遇到在自己之上的文明时，却极端抗拒被人教化、提升。中国拒绝教化、提升的后果，只是伤害了自己。中国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二次大战日本侵华，要是日本战胜中国而占领中国一段时间，迫使中国人改革，中国尚有起死回生的一线生机，情况就如当年日本甲午战争战胜、占领台湾后即明令女子放足、男子断发和禁食鸦片，并将台湾从 1895 年九成文盲建设为 1945 年时的九成以上识字，社会发展傲视整个神州那样。台湾因为被日本所占而因祸得福，而日本也能从二次大战后被盟军所占而学会民主政治，中国本土炎黄子孙的学习能力没有理由会比台湾人或日本人差。不过，假如二次大战真的日本战胜而占领中国，我又担心日本会被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大伤元气甚至被同化，倘如是，将不仅是日本的灾难，也是整个亚洲甚至全人类的大不幸，因为日本大抵不能像现在那样造福世界了。

中国共产定要为中国的没落负责吗？

许多人，特别是中国人，包括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甚么新儒家之类都普遍有一种他们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想法，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

至少是瑰宝远多于糟粕，中国现在这样堕落，都是共产党祸国五十年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中国文化，而在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是误人无数的浅见，尚幸这浅见今天只是多在华人的圈子里流行，在国际间学术界已纷纷为人所扬弃。须知文化本身必经极长时间的酝酿累积方成，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可以所谓翻天覆地，可以翻天覆地的极其量只是问题的皮相。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无数中国人的欢呼下君临中国，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文化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只是将中国文化中的主要特性如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有私无公、明争暗斗、人治挂帅、裙带作风、叶公好龙、过犹不及等等进一步发扬光大，不同的只是，老夫子穿上革命装而已。所以，没有中国久已准备了的特有恶土，中国共产党势难崛地而起，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完全没有反思自省自觉能力下，甚至自以为已摆脱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情况成为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也就是集受害人和刽子手于一身，埋葬自己，也埋葬他人。要突破中国这个封闭的恶性循环，外来高质文明看来是无可替代的。

〈原载于 2005 年 3 月《开放杂志》〉

继续沉思：北欧和中国

◎ 钟祖康

在北京到哥本哈根的长途飞机上，我再展读此行唯一一本随身带的书《鲁迅杂文全集》，翻到《坟》的「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评论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 (Henrik Ibsen，1828-1906)大作《傀儡之家》(即挪威语本的 EtDukkehjem 或英语翻译本的 A Doll's House)的文章我已看过几次。但这次看，似乎才真的看得明白。为人妻的娜拉一天突然觉醒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儿子又是自己的傀儡，她不能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离家追求自由去了。但 1923 年的鲁迅(1881-1936)就说：

『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 .....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就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甚么路。』

所以，鲁迅问，除了一颗觉醒的心之外，她还要带些甚么去？答案是：「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又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重要的 .....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其后我跟几个读过《傀儡之家》原着的挪威人谈起鲁迅这篇文章，他们都听得入神。

两地民智相差甚远

易卜生在 1879 年就写出如此颠覆女权的话剧，那真是了不起的，无怪今天挪威已是全球女权最高的地方了。挪威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易卜生的书，就如丹麦人书架上总有安徒生的书一样。除了《傀儡之家》之外，易卜生在那个年代还写出了暴露社会贤达藉大话连篇来保住个人名声的《社会栋梁》 (即英语翻译本 Pillars of Society)，写出一士谔谔口吐真言而不容于中国人的《人民公敌》(即英语翻译本 An Enemyof the People)，和中国正人君子无法了解的人生悲喜剧《培尔金特》 (Peer Gynt)等等，这些作品，中国人若真能读懂，是很难不深有体会的。

正如在病榻上也坚持把《培尔金特》翻译 (按理是从英译本再转译)成中文的萧

干(1910-1999)，在其回忆录《末带地图的旅人》中说，「我是在 1944 年于伦敦看过演出并立即爱上了这个戏的。文革期间，当是非整个颠倒，人们争先恐后为自己安哥尾巴好加入妖精一伙时，我就常想到这个戏。一边译，我一边回想着许多不久前的人和事。译到『当狼群在外边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牠们一道嗥』处，突然，几年来那一墙墙的『大批判栏』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觉得一百多年前，易卜生好像就是针对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写这出戏。不管我的译笔多么拙劣，我是对原着怀着无限共鸣来译它的。」但坦荡如萧干也得承认，「我为自己划了条线。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当年的难友刘宾雁再一次遇到麻烦时，我觉得自己的考虑还是现实的。」

我看鲁迅当年再四推介易卜生给中国读者，也是因为深有共鸣吧。

但易卜生与鲁迅的下场之巨大分别，说明了两个民族的民智相差多远。易卜生由于才气纵横，见人所未见，最初也备受争议，但到他死时已成为深受挪威人民爱戴的大文豪，今天更是挪威人感谢不尽的国家英雄。而他当时所倡议的进步社会概念，大都已在挪威得到实践。相反在中国，鲁迅思想之进步，绝对不在易卜生之下，但他要不是被人抵制，就是被人利用为政治图腾。尽管中国的领导及民众时时声称推崇鲁迅或易卜生之类进步份子的思想，但从他们的实际表现看来，却是与这些进步思想南辕北辙的，可见也只是口头上奉承，或者根本就读不懂。鲁迅当年所痛诋的独裁政治和病态社会，在今天中国大陆看来不知严重了多少倍。人们甚至普遍为鲁迅早死而为他庆幸，否则真的不知他会有甚么下场。

长期荒年影响深远

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二十世纪初的人文地理学大师杭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1924 年发表的巨着《种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Races)。出身探险家的杭廷顿走遍世界，觉得中国人和北欧人最让他着迷，他发现在中国和北欧历史上发生的自然淘汰性质截然不同，因而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北欧人，和自私自利的中国人，以至华南比华北进步的反常现象。

杭廷顿独具慧眼，一眼就看到中国荒年特多对民族性的残害，杭廷顿很有兴趣知道，『在这种形势之下，死亡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是不是死亡的人的品质和不死的人的品质有些不同？』为此他于 1923 年再次远赴中国，实地考察和走访包

括多次参与赈灾的传教士，他赫然发现：

『一个人要是没有这种畸形发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挡不了那种残酷的荒年.....于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多经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总之，极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过荒年，生存下去 .....二千年的长时间里，惟有这种自私的人才受选择。』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完了。』

读之能不心惊肉跳，能不拜服？但这类卓见，由于太不可思议，不明中国情况的局外人是不敢相信的。

杭廷顿审视过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后甚至断言，『鉴于中国人几乎完全没有责任心，中国根本绝对不宜建立共和国这样的政体，但相对冒进的南方人却硬要把这制度带来了。』

鲁迅曾说：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1927 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但为甚么总是变成个人主义呢？也许杭廷顿已经给了一个很深刻的答案。

如果中国式的自然淘汰是一种让「不择手段之徒」留下劣种、进而开枝散叶的淘汰，那么回到香港，多年来的惨烈竞争又是甚么样的淘汰？在九七金融风暴后依然风光无限、或更上层楼的人，会是怎样的人？最终的胜利者又是怎样的人？

民族优秀征服劣境

杭廷顿见识过中国后，却对北欧人之优秀赞叹不已，他惊叹，连终年冰寒的冰岛落入北欧人之手后，也能发展出如此高度的文明，千年不堕。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处于如此高纬度的国家，有此高度文明，反而地理上看似较优胜的中国却日趋衰败。所以，作者说，冰岛虽小〈当时约有 10 万人，目前有近 30 万人〉，

但其发展经验的启示可与中国等量齐观。

信奉自然淘汰学说的杭氏认为，北欧人如此优秀，是因为他们很晚近才经过万水千山，经过严酷自然淘汰才得以落籍于北欧一带，整个民族仍然充满着年轻人一样的朝气，因此勇于吸收新事物新思想，譬如擅于应用青铜器进而铁器，于一千年前接受天主教为国教，再于 16 世纪初第一时间改投勇于改革的路德宗，和当时被指为腐败落伍的天主教廷决裂，到 20 世纪初就率先效法德国，先后推行全民的老人和健康保险计婳；而在政治方面，就自行发展出恐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民主政制。

杭廷顿又说，由于北欧人要好好规划，每年才可以挨过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日光、黑暗严寒的悠长冬季，因此让他们培养了凡事未雨绸缪的态度。当你看到他们对社会问题有条不紊的的集体规划，看到他们实践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规划经济，就会觉得此说似有道理。

尽管基督信仰最初是由维京人的皇帝在丹麦、挪威等地强制人们马上接受，但从中也可见北欧人的精明和果断。杭廷顿就举出一段发生在冰岛的有趣插曲。就是在公元 1000 年那年，当天主教教士正络绎于途，努力游说冰岛人皈依之时，冰岛人就群集国会，辩论是否舍弃固有的古老国教，事件最后由国会议长一人迅速定夺，毅然接受天主教为新的国教。据历史记载，当时还没有基督信仰的冰岛国会议长坐在一张兽皮毯上默想了一日一夜，就决定采基督为国教。他个人随即皈依，并把他原来信仰的诸神偶像通通抛进那条由此得名的「诸神瀑布」中。请想想这样的举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冰岛由此跟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奠定了往后一千年的基督文明格局，到 16 世纪宗教革命时也共同进退。在中国，公元 1000 那一年，是宋真宗咸平三年，那年值得记载的大事是，真宗下诏：

『去岁天下举人数踰万人，考覈核之际，谬滥居多。』但不料咸平三年那一年的科举更破了纪录，共录取进 409 人，诸科 1,129 人，总计多达 1,638 人；另外，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杭廷顿在同是 1924 年出版的第 3 版《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里说，就文明发展方面：

『信奉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 的地方要不是先进就是非常先进 .....信

奉罗马天主教的地方则从极先进到极落后俱有；而希腊基督教则发展高低不等；同样，信奉佛教的地方其发展可高至日本，低至西藏；回教国家的发展则从来不达中度之上，甚而极低。』

这模式看来到今天仍大致适用。如果说基督信仰或者说新教也是北欧达致国富民强的重要药方之一，则要问，为甚么当年北欧诸国领导可以毅然采纳天主教？到十六世纪宗教革命时又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继续拥护罗马教廷呢？也就是说，此药方即使有，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招自来的。甚至，若是死也不要，你弯腰行礼奉上亦属枉然，譬如中国。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帝国，就是经过天主教士、新教教士施尽浑身解数，游说了几百年，还是无动于衷，因为这是「有违祖训」的。正如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说，他的师傅陈宝琛曾阻挠他安装电话，说「听说皇上要安装电话，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 .....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连寡人也被劝阻，众人就可想而知了。

黑死病造福欧洲

但我会在此加个注脚，就是于 **14** 世纪至 **18** 世纪初令欧洲人口减少了几成的黑死病，也令包括北欧人的欧洲人体质方面日趋优良，免于人口压力，甚至面临人力不足，也让幸存者摊分了死者的财富，以及令欧洲人继续保持宗教热情。这些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欧洲黑死病和中国荒年所造成的淘汰效果，看来大不一样。虽然有人为黑死病没有蔓延至中国而庆幸不已，但从整体发展和长远而言，如果黑死病也曾经蹂躏中国几个世纪，中国今天的发展可能也大不一样。

(原载于 2002 年 5 月《开放杂志》)

中国好讲命理反趋衰落

◎ 钟祖康

幼时由于家庭环境影响，曾对掌相风水命理颇有兴趣，也略有涉猎，几乎觉得命运是理所当然的。渐长，民智渐开，学会了「宿命」、「创造命运」一类的词汇，时时思考掌相风水命理是甚么一回事，但问题太玄，人人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更玄幻的「信则有，不信则无」，连许多饱学之士也言之凿凿。我却想从这个起码发酵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大酱缸中突围而出，相当吃力，浪费了不少时间。

未能以命理学避过灾劫

直到有一天，在思考了这问题约 20 年后，我突然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既然中国人搞掌相风水命理最大目的是趋吉避凶，洪福齐天，而且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迷信掌相风水命理，那么，按理中国应当已进化为人间乐园了才是，却为甚么中国反而在这两千多年来反复沉沦为人间炼狱呢？当我读到鲁迅说的，「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我就想，中国人为甚么不能应用他们精湛的阴阳五行之术，避过这些灾劫呢？

自此，我不再相信命理之术，我认为这种活动，主要是中国人生活艰难下、加上道德水平较低的情况的不择手段谋生术而已。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也没有能力进一步证明，命理之术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没有帮助。但我认为，即使有一小撮的中国人真的藉命理之术趋吉避凶，扭转乾坤，呼风唤雨，做人上之人，做全国或全球十大首富，惟监于绝大部份中国人仍然相当悲惨，我就觉得，这种方术即使真有其事，也是极其自私，决非正道，也就不屑一顾了。有人或会安慰我说，中国可能会有很璀璨的未来呢！

但我认为，中国人 -----特别是妇女-----已经受大苦大难两千多年，而且到今天还看不见苦难的尽头，命理之术对中国人之胡搞，到底是应到此为止了。我也毫不怀疑，有其人必有其神，以中国人的贪婪本性，按理是主宰中国人命数的神灵 (或邪灵)也是可以巴结贿赂的，就如非常灵验的算命先生都是有钱人才看得起，中国内地一些据说灵验的寺庙也是「无钱莫进」，连撞钟也要收费那样。这一来，

岂不是说又是一小撮富人的玩意？正如前说，这也决非中国人的出路。

命理预言「自我应验」

有曰：「此言虽荒唐然极准，每见生女者，不发财；生男者，必发财，不解何故。」基本上，当命理之术发展到相当规模，民众痴迷到相当程度，就会真的像这句话说的：尽管「不解何故」，却又「虽荒唐然极准」的。那为甚么「每见生女者，不发财，生男者，必发财」？诚然，男子力气较大，在实际生产和械斗活动上较有利。但洋人的男女不是也有体力上的差别吗？关键是，中国人用以加强妇女从属地位的「缠足国粹」把起码半数妇女变成残废人仕，令男女在生产和械斗活动上的能力差异扩大了，而且中国社会开化较迟，依然较重强权和械斗而非讲道理。当人人都贱视女性，都笃信妇女要绝对服从男性，以种种卡压使其较难得到经济独立，加上只有男丁才享有产业继承权和祖先祭祀权，女儿很自然变成蚀本货。而且中国统治者一向对民众生计特别是退休后生活任其自生自灭，并配合男丁专用的产业继承权和祖先祭祀权，父母都只会养儿防老而不是养女防老。在整个社会已合力预设了所有机关以确保「女不如男」之后，人们自然视女儿为瘟疫，甚至是天谴，生女难免会导致整个家族情绪低落，愁眉不展，进而家无宁日，再进而为了索男而不断生下去，完全不顾家庭的负荷能力，又或因为正室屡生女儿而纳妾，徒增家庭开支，也益令家无宁日。

当众人认定妇女先天就是次等的，都是「无才便是德」，从一开始就剥夺其发展机会，那么妇女结果也几乎必然如众人预期那样，个个确是蠢物。这个道理，洋人学者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发现，并名之为〝**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中文可称之为「自我应验的预言」，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期望塑造现实」。总的来说，中国妇女的「命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推而广之，洋人社会对那些残障或外表有明显缺陷的人都是无限同情，并设法助其过有尊严的生活，简直是令这些残障或外表有明显缺陷的洋人比起中国的正常人还活得更快乐和有尊严。这又是有缺陷的洋人，跟有缺陷的中国人的不同「命理」。

机会均等可左右「命理」

隔了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接触到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洋人之后，我发现许多洋人从中国的面相手相而言，按理都是命运堪虞的，但他们都活得远比中国人幸福。年前我在挪威探望一位年近八旬颇受敬重的前政要，发现他的手掌几乎比泥工的

手掌还粗硬，严重违反了中国福相的一大要求 -----即「掌软如绵」，我当下就想，若在中国人的社会，这样的人大抵是不会有人给他机会的。我为此沉思不已，自然追寻到当中的一个祸源：孔圣人说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后来我陆续发现类似严重违反中国相学原理的情况在洋人当中相当普遍，我从而断定，中国命理相学整体而言，有相当程度都是「自我应验预言」作怪。也许有些江湖术士也曾经有类似发现而不得不另搞一套西洋相面术出来以自圆其说，但一般相士当然对甚么「自我应验预言」理论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为了生活也会设法隐瞒。至于那可算是中国阴阳五行术之极致，许多中国人说得神乎其神的《推背图》，依我看，除了是预言自我应验之外，还加上无数版本穿凿附会其中，特别是那些有心想做皇帝的人。

发扬中国人自私本性

命理、风水之术的另一个害处是，它是极度自私的产物，所以极易吸引「各家自扫门前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中国人。正如前说，所谓「命理」，跟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分不开的，个人的「命运」其实往往就是由政府的政策所决定。譬如一个清洁工若生活在中国或香港这样讲求「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华人社会，他的「命理」自然是很差的了，但要是他是居于讲求人人平等的挪威，他的「命理」就会比中国或香港不少中产阶级还要好。所以，命理、风水之术很容易令人误以为个人的命运是可以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甚至可以独立于个人所身处的时代洪流。所以，笃信命理的人大都对政治社会改革不感兴趣，因为他会相信只要自己的命相好、祖先的风水好就可解决一切问题。迷信风水的人都喜欢为死去的家人在苍翠的山头修建巨墓，他们只会想到自己的风水，不会想到巨墓对生态、景色的破坏和对土地的浪费。过去中国人更因沉迷谶纬之学而奉行厚葬，却不理会这对树木和其他资源的惊人糟塌。这些对修墓人自己或其家人也许是好风水，但对整个社会就是资源破坏。又如中国人只会想到自己必要有男丁送终，否则就不吉利，因而拼命繁殖，甚至为了壮阳强化生殖力而祸连犀牛，但中国其实已经人口爆炸了，而且是有量无质。命理、风水之术由于中国人的自私自利而得以大行其道，同时也令中国人的自私心更加发达。

沉溺命理只能畸形崛起

传统中国人花了人生许多宝贵光阴为相学命理之术着书立说，将人的命运用一条

条定理写出来，甚至谱成可以琅琅上口的口诀，深入民心。譬如着名的《面相醒世歌》，里面所载的都是很典型的中国命数「定理」。且看：『牙齐衣食能丰享，滕蛇人口必要饿到硬嘟嘟；寿长耳大兼神壮，至怕脚跟唔(不)到地必定少年亡」』、『指甲光明正得儿女易养，掌中明润定必贵人长，骨硬艰辛，荣耀软掌』、『鼻内空囊斜目看，此人好滑必要提防』、『妇人第一要益子将夫旺，背圆掌厚一世好风光，口小鼻圆双孔吼不昂，能生贵子可旺才郎』、『肥婆腰窄乃系无儿相，刑夫眉大额头光，两颧黑墨屎会有双夫丧，颧高眼凸就要克够三个才郎』、『面滑身粗系淫贱相，倘若不为奴婢亦要当娼；』、『半掌一纹为叫断掌，此人必要过房养育，才保得寿元长』。当人人都信有其事，社会上那些不「牙齐」、「滕蛇人口」、不「耳大」、走路「脚跟唔 (不)到地」、不「掌中明润」、不「软掌」和「鼻内空囊斜目」的人，那些不「口小鼻圆」、「双孔吼 (必)昂」、「肥婆腰窄」、「眉大额头光」、「两颧黑墨屎」、「颧高眼凸」、「面滑身粗」的妇女，对于这些「败相」，传统中国社会怎会给予机会，肯予栽培呢？有着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种「败相」特征的中国人不仅会因被冷落而怀才不遇，长此以往，在不受宠爱、事事不如意，失魂落魄，两餐不继的艰难生活下，再加上这些预言的心理阴影，很难不早生华发，寿命比常人短，那样就连相士夸下海口说的「主凶亡」、「少年亡」、「买定棺材」等都「不解何故」的一一应验了。

中国人一向人认为极善于用人的曾国藩 (1811-1872)就留下一本《冰鉴》，讲述他用于识人用人的相人之术。譬如：『背宜圆厚，腹宜突坦，手宜温软，曲若弯弓，足宜丰满，下宜藏蛋 .....五短多贵，两大不扬，负重高官，鼠行好利，此为定格。他如手长于身，身过于体，配以佳骨，定主封侯；罗纹满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即鼎甲矣。』任何人不合曾国藩心目中的好相，会获得他的青睐吗？这可与中国共产党以个人的阶级成份将人分类、为他人制造宿命论互相辉映。又如那部更加露骨的《择交心法》，说甚么『面上无肉者不可交』、『准头无肉者不可交』、『脑后见腮者不可交』、『唇掀露龈者不可交』、『身材过矮者不可交』、『面色过黑者不可交』、『面色过蓝者不可交』、『面色过赤者不可交』，公然鼓吹排斥有某些生理特征的人仕，简直是直接给他人制造噩运了，在文明社会是要送官究治的。当然，这些面相特征有时会与个人的长时间的成长过程、当前健康或营养状况有关，也就是多少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富有人家就如高级领导那样，自然会比较珠圆玉润，满脸红光。当人们都相信这些自然生理现象都是命运的指标，就会对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和悲惨的个人命运不敢苛求。

中国科学院 2005 年公布的《中国科普现状调查》发现，在中国，两人中有一人

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五人中有一人迷信周公解梦。中国人若不能明白命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恐怕还是很难正常崛起的。

〈原载于 **2006 年 5 月**《开放杂志》〉

记台湾行

◎ 钟祖康

台湾始终是常在我心的地方，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去了，终于在复活节前后和太太去了一趟。

也是入住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南国大饭店〈现已改装为新驿旅店 -----作者注)，这家有点破落的饭店于我是有特别感觉的。三年前我就和当时另一位我很喜欢的女子在这里呆过，那种狂喜的感觉梦梦幻幻的犹在目前。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人不习惯失去，活不下去的。

痛苦的失败经验告诉我，不能掌握现在的人每多下场可悲，于是我紧紧握住内子小小的手，在台北的街头，倾情感受这个我觉得最有生气最有希望而又最被华人诬蔑的华人城市。

迈向闲适社会

台北的茶馆特别是咖啡店很明显比三年前多了，而且又添妩媚。内子是欧洲人，嗜旅游，连台湾在内已去过四十多个国家，她对台北的茶馆和咖啡店之多感到震惊，说这是她去过那么多地方所没有见过的。而更重要的是，她和我都很感受得到茶馆和咖啡店里的闲适，里面的人多的是在看书而不是马经或垃圾漫画，我觉得这种混合了知识的闲适是高度文明的一个标记。从这一点看，台湾已经把香港远远抛离，头也不回的绝尘而去了。在那边我和内子几乎天天都去 **Starbucks** 喝咖啡，去享受那里的闲适和服务人员自然流露的和颜悦色，这些我们在香港的 **Starbucks** 是感受不到的，自然也没有兴致去了。橘逾淮为枳，果然。

书市繁荣令人失控

内子已一再警告，不可再多买书，否则后果自负。我也自以为已练就坐拥书城而不乱的境界，谁知到了那边还是失控，买了几十本书，苦了自己，也苦了她，而且绝大部份都是他不懂的中文书，那就简直是哑苦了。期间我为了追寻孔尚任的《小忽雷》，踏破铁鞋，谁知十问九不知有《小忽雷》此书。干吗我对《小忽雷》有那么大的兴趣呢？皆因我看《桃花扇》时读过梁启超的评论：

『依我个人的评判，《小忽雷》词曲之美，实比《桃花扇》还胜一筹，他的好处在不事雕琢，纯任自然，无一饾饤之句，无一强压之韵 .....令人色授魂与。』

最诱人的是他引了《小忽雷》三十二出秋宫拨怨一段：

『.....你看，玉墀下多陨叶；长门内少明月，苔茵上没些热，罗袜里湿半截，长夜滴漏不竭，冷萤火明复灭，吓得我发凛凛似鬼拽，心跃起像虫啮，一阵阵暗风起，一点点细雨撇，那奸官正饶舌，怕君王没分别，俺生死关节，只争今夜。这便是做宫人伏侍君王的活罪业。』

不坏吧。虽然我对中国并无好感，但中国书，特别是中国古书是不可不读的，否则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荒唐，和不能用最传神的中国话来形容他们的荒唐。反抗英国人的美国人也不会那么笨，不读英文书的。

我跑遍了台北的书店，才得知明文书局曾印行这书，但都绝版了。我打电话去明文书局，原来这书他们只剩下一本作存档用，职员说要请示老板，岂料老板愿意割爱。我载欣载奔跑到书局，那老板是位已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出过许多很冷门的古书，连阮大铖的《燕子笺》和《春灯谜》等书也有，存货也只有几本。一如其他台湾人，书店的人都很热情，我带着他们的好书和好意满载而归。

水湳洞别有洞天

在《远见》杂志记者小马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去了她妹妹和妹夫开在台北县东北角水湳洞的小鱼咖啡。这个曾经是台湾盛产金、铜、煤的繁华地，单是采矿工人也曾有几千的的瑞芳小镇今天只剩下两百居民左右，有一股萧瑟之气。但那么少人也挡不住台湾人的咖啡痴情，室雅何须大，小鱼咖啡就这样靠山临河的旁若无人，完全自我。原来他们两口子以前是在城市里做白领的，后来感到厌倦就谢绝尘嚣，到这个小镇开咖啡店，粗茶淡饭度日。他们看上去才三十多岁，若已感受到「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很有福气的。

到黄昏我们走上当地台北县瑞芳镇濂洞国民小学。以香港的标准而言，这小学算是很大了，但小马说这小学的规模在那里普通而已。走到小学东面角落的崖角，居高临下，放目是几乎 180 度全视野的太平洋，天苍苍，野茫茫，我梦想有天可以寄居于此。

内子先回香港，我一个人多留几天。我去找民进党一些人聊聊，席间谈到为甚么每次台湾举行选举，香港的民主党例必列队而往观战，却在香港搞得越来越窝囊，到底香港民主党去台湾观选战有甚么得益？有甚么意义？我们忍不住相顾失笑。

台南满城鬼气

我去台南，参观了城隍庙、东岳殿、孔子庙。城隍庙确实不同凡响，「尔来了」匾额高悬，正如该庙的小册子上的解说，「彷佛诉说着『你来了，又有几个能逃』」，气势慑人。那二十四司造型传神，尤以当中专职「下情上达，把人间善恶是非迅速回报城隍爷」的速报司，两眼圆睁，面目狰狞，一看我就想起香港特首董建华身边的宠臣路祥安。还有那个 2 米 7 乘 1 米 06 的大算盘，算盘的框边刻有一副对联:「善恶权由人自作，是非算定法难容」。该庙的小册子解释说，「大算盘则是城隍庙不可或缺的饰物，象征主神计算人间善恶是非 .....城隍出巡绕境时，大算盘也随着同行。」这个意念太奇绝太吓人了。

再去附近的东岳殿，那里的鬼气更有动感。整天都有人在超渡亡魂。起初我以为他们在超渡新死的家人，但看他们不太悲伤又不像。原来他们来超渡亡魂的大都不是因为家里刚有人死掉，而主要是自己或家人最近觉得事事不如意，恰恰又有以前死去的亲人报梦说在阴间有所匮乏，又或通过灵媒知道已故亲人在阴间有所匮乏，以致他们在干扰在世家人的生活，他们就会来这里做法事超渡亡魂，奉献大量食物，焚烧我亲眼看见的有过百斤的冥镪，他们说每次超渡的收费从 1 万到 4 万台币不等。

总觉得整个台南市弥漫着一片阴阳鬼气，幸好还有孔子庙，才感觉到还有一些不问鬼神的力量与之抗衡，尽管我对过份世俗也沉迷于秩序的孔子并无好感。

孔子庙建于雍正四年 (1726 年)，大成殿内有清代至今的皇帝或领导颁的御匾，康熙有「万世师表」、雍正有「生民未有」、乾隆有「与天地参」、嘉庆有「圣集大成」、道光有「圣协时中」、咸丰有「德齐帱载」、同治有「圣神天纵」、光绪有「斯文在兹」，蒋中正有「有教无类」、严家淦有「万世师表」、蒋经国有「道贯古今」、李登辉有「德配天地」，陈水扁有「中和位育」。一派皇恩浩荡，都是中国儒家官化的见证。

泷乃汤名不虚传

临走前我去了北投的温泉。我叫朋友介绍一些便宜、优质和正派的，结果我胡乱挑了名字怪怪的泷乃汤。去了才知进了宝山，但情况也颇为尴尬，原因是从来没有去过温泉的我竟然找上这个温度达摄氏 68 度的温泉，热得我无法行下水礼，呆在池边，千夫所视，进退失据。幸而那里的老前辈不吝赐教，我几乎扰嚷了两个钟头后才成功把全身泡在热汤里，熬了 20 秒就像火箭发射一样脱水而出，有垂死之感，但很快就觉得舒畅无比，空前痛快。这个温泉建于 1896 年日治时代，水质属酸性青磺泉，对皮肤病或关节病有巨大疗效。那天池上一位台湾朋友说他家在美国，每年回来一次就是为了到那里泡一泡保健。平民化是泷乃汤一贯作风，没有时限，大他收费才 70 台币。

在此香港的发展自回归后日走下坡之际，台湾的发展是不断向上的。只要你到过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三地，只要你是没有严重精神毛病，你必会同意台湾的发展是最健全、最可贵，最需要受到保护的濒临绝种华人社区。

〈原载于 2001 年 6 月《开放杂志》〉

历史悠久不是福

◎ 钟祖康

中国人每以为国家是越大越好，也多认为文明历史是越长越妙。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国家大虽可满足一下以四肢发达骄人的虚荣心，但事实是，国家小每每更合于管理，人民也通常更富裕更自由。

至于文明历史是否越长越好呢？细看人类历史的演化，文明历史长其实也很容易变成无法逆转的负累。

放目当今之世，在过去近万年间灿烂过的古文明中，其实就只有古希腊文明借基督教文明得以浴火重生而卒成大业，成为现代文明之师，其他的所谓古文明要不是灰飞烟灭，就像中东文明或中国文明那样苟延残喘，或仍在迷恋着「蜥蜴的残梦」。今天中国人都爱逃难到希腊文明底下的基督教民主自由国家而不是儒家思想的新加坡或社会主义的北韩，伊斯兰世界的难民也几乎非基督教民主国家不去，而不是投靠按理最适合他们的伊斯兰邻邦。

开发越早越易犯错

为甚么文化或文明发展得早不一定有利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在现代科学来临之前，大都只是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世界之中求索，就如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那样，死是应该，不死只是意外。得以幸存也是五痨七伤，即使地大物博，也只会暴殄天物，拖出个「五千年吃人文明」来。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发展得越早，活动越频繁，犯错的机会就越大。近六千年前位于伊拉克的苏美尔人(**Sumerians**)就发明书写文字，但今天伊拉克的识字率比中国还低，只有五成多左右。美国之所以能在两百年间就称霸全球，原因之一就是立国够迟，有机会避开了前人所犯的许多致命错误。又如从澳洲、加拿大等年轻国家的成功可见，国家要兴盛，并不一定时刻要有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作后盾的，只要能理性善用前人的经验、科学知识并让人的潜力在自由的环境下奔驰，国富民强也是有捷径可循的。而且，也如中东文明和中国文明那样，太古老太「博大精深」就很容易积习难返，以致比任何其他年轻国家都更难适应现代文明。

由于在原始条件下炎热气候较寒冷气候容易克服，早期的人类文明多先出现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事实上，基因研究已清楚显示，现代人类就是在过去十万年间从非洲走出来，散居到世界各地。他们习惯了热带的气候，自然也会先选择较暖和的地区定居。中东文明的肥沃月湾 (Fertile Crescent)、古印度文明的恒河流域、古希腊文明的爱琴海，中国文明的黄土高原 (当时黄土高原没有现在的寒凉)，都清一色是热带、亚热带或气候温和之地。所有这些地带不像非洲那么热，也没有高纬度地区那么冷，而且土地肥沃，初民不用太刻苦就可以生存下来。但这些有利条件也正正隐藏着大灾大难，甚而是亡国灭种之祸。

温热带易令繁殖失控

首先，生存环境容易刺激繁殖。对于节育，初民既无动机也没有所需的技术，一切率性而为，所以，这些生存环境「得天独厚」的古文明多会人口过剩，并由此衍生出种种因人口过剩而来的问题，如贫穷、生态破坏和为争夺资源而冲突等。其次，自然环境若易于利用，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初民不知生态保育，每每做出古人说的「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事来。中东的肥沃月湾和中国的黄土高原(如山西陕西一带)从原来绿洲沃土的文明摇篮变成今天的山穷水尽寸草不生，进而演为「越穷越耕，越耕越穷」的恶性循环，一大原因就是天然资源垂手可得，太易滥用而被采竭。这一点我在这两年多来在挪威等寒带地区的游历中殊有领会。为甚么挪威的环境保育做得那么好，誉冠全球呢？我发现，原来这里全国都是石头或大石山，全国可耕地只有百分之三，民众多从事较适合当地地势也利于环境保育的畜牧，并同时大量使用石头而不是消耗林木的砖头于建筑。挪威几乎所有耕地都被一道一道用石头堆成的石墙隔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从几公斤到近百公斤重的石头是前人赤手从田里一块一块捡回来的！彷佛造物主为了防止愚昧的初民滥用资源，还要在数量极少的平地上天女散花的洒满大石头，另加每年一半时间冰封时的「强迫性休耕」。要破坏这里仅有的土壤确不容易；资源所限，要像儒家那样多子多孙也很难。现在挪威绝大部份原本光秃秃的大石山在飞鸟等生态使者的协助下，慢慢长出青苔并累积为植被，再长出漫山大树来。这个从岩石进化为森林的过程，跟中国的从森林退化为沙漠岂不是刚刚相反？

我有一位英国朋友曾踏单车连续游历世界八年，他见多识广，特别是对于位处热带的国家。我们曾多次探讨一个课题，就是为甚么寒带的文明发展一般优于热带，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他说在热带国家，天气太热令人难以思考，资源太盛也令人无须思考〈指在生态末被破坏前〉。

那些气温动辄达摄氏 **40** 多 **50** 度的地方，除非人人都在冷气间从事户内工作，否则本来就是不宜人居。人都晒成木头人了，还怎可以思考呢？但这些火炉一样的地方却反而大都人口过剩。要打破像澳洲、香港、夏威夷之类亚热带环境造成的窒碍思考的内部恶性 (文化)循环，外来特别是来自寒带地方较清醒的脑袋非常重要，在空调设备普及之前更是如此。弱于思考和反思必难逃衰落。看看欧洲和北美人类对其祖先及对其现政府的批判和反思，看看中东或中国等地有没有可能容得下 **Michael Moore**、**NoamChomsky** 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可明白为甚么不同文明之高低悬殊。

北欧维京人要不是在那冰天雪地，恐怕就不能够活动了几千年仍然能够绵延至今并取希腊文明之长大放异彩了？

罗马帝国几乎走上中国歪途

希腊文明和其他主要古文明的一个明显分别就是，它是唯一一个不断北进移往偏寒地带发展的文明，这与它能最终排众而出甚有关连，因为在偏寒地带，人较容易思考，人较清醒，也不会那么沉迷于睡觉，还需要较多规划才能生存，加上开发较难，地力较难被耗尽，人口繁殖较难，对自然资源破坏较少，不容易形成在食指浩繁环境下迫出唯贪独得兼疑神疑鬼的反社会行为。总之，寒带地区会令初民犯错的机会较少，给往后的现代化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过去万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可见，一个文明能否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不是有过多少伟大成就，而是犯过多少难以逆转的大错。最后，偏寒地带在社会整体发展较健全和人力紧张下，再经中国传来的黑死病令人力更趋紧张下而得以率先走上工业革命，饶有意味的是，工业革命也只是发生于寒冷的英国和荷兰而不是炎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然而，由于起步早，希腊文明在黑暗摸索中也几乎跟中国文明犯上类似的错误，那就是罗马帝国。跟中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是奉行扩张主义，好大喜功，四处讨伐，对领土贪得无厌；也是极不宽容，迫害宗教；也是穷奢极侈，生活靡烂；也是大量使用有毒金属，特别用铅金属于饮食、陶瓷器皿、化装和链金术。罗马帝国最后因多次瘟疫和上层社会大概因铅中毒而造成大量死胎、流产和不育以致人口锐减，而统治阶层的智力也相信因铅中毒而日衰。罗马帝国该死而死，而且也没有留下过剩人口，并且最终为子民解决了灵性需要 **-----**皈依基督，这为欧洲往后两千年的反复向上发展并迎接现代文明奠下重要基础。

初民由于没有科技之助，而多择温热带而居，并由此发展出文明，但也多同时被温热带的有利因素所迷，不知节制而走向衰败或死亡，说起来是颇为吊诡的。今天许多学者对古文明陨落的研究显示，初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特别是伐林，是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戴蒙德 (Jared Diamond，1937-)教授在其《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之途》(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等作品中已有详细论述。

〈原载于 2006 年 1 月《开放杂志》〉

中国人凡经之地寸绿不留

◎ 钟祖康

我在《历史悠久不是福》一文中，阐释了古老文明适应现代世界的困难，和寒带文明较温热带文明发展优胜的原因，不过，这并不足以充份解释何以中国文明长期反复下堕，可以胡天胡帝千载。原来，中国几千年来在黑暗摸索中还犯了几个万劫不复的大错，最严重的可能是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一大残害，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资源。

「无后为大」迫出食人传统

中国自汉代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说，就是孟　r 裸的搞思想管制，行极权统治。将全国人的思想定于一尊已经够糟，更糟的是，是定于一种以唯道德主义、形式主义、性别歧视、人伦差别、超实用主义和反宗教精神为本、以繁殖和愚孝为人生至高目标的教条。若中国当时挑的是墨家，中国将大不同矣，甚或可与西方的基督精神互相辉映。结果，自汉代始国人真的听从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指令，将繁殖后代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更坏的是，这个「无后」仅指「无子」，并不包括女性。为了「有后」，加上求子，再加上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即奉行小政府、大家庭主义，对民众生计任其自生自灭令「养儿防老」。中国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灾荒和战争造成的人口减杀也无法控制中国的人口，以致于连相对寒凉的华北地带也出现严重人口过剩，需要不断扩张南进掠夺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过去我曾悬想，若几百年前黑死病也在中国大爆发，当会像造福欧洲一样的造福中国，但现在认识到儒家思想衍生的繁殖能力，相信黑死病在中国控制人口的成绩不消数代人就会化为乌有。

中国初民在人口压力下对黄土高原的生态摧残，令黄河水患失控，确保了黄河流域一带的贫穷。中国社会科学先驱潘光旦教授在八十年前说的话今天似更适用，「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灾荒的反选择影响；而中国之所以成为『灾荒的国家』是因为西北的旱化，而西北的旱化，又局部因为先民斲丧与蹂躏树木的行为；那末 ……止旱须有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但问题是，中国人的质量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还有能力扭转滥伐林木造成的旱涝相夹大势吗？自潘光旦发出这呼吁的八十年来，中国西部的森林覆盖率又再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下降至现在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你去《四库全书》和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数据库搜寻一下出现了多少次「屡禁不止」这个成语，再看看《四库全书》中出现多少

次灾荒中「人相食」、「易子而食」、「男女相食」、「父子相食」、「母子相食」、「父子夫妇相食」、「父子兄弟相食」的记载，就明白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属于一个甚么档次的文明。

鸦片战争来得太晚

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来华的外国人也对中国人对生态的疯狂摧残感到震惊。于一八五九年抵华后游历中国五十年，以中国第一艘蒸汽船横渡长江三峡的英国人 **Archibald J. Little** 说，「中国人永远像蝗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美国矿业工程教授 **Lynwood Garrison** 一九〇一年撰文指出中国的伐林问题时说，「像中国人这样一个实际的民族，居然不早就认识到森林文化的种种好处，实属反常。」知名地质学家 **Baron von Richthofen**（一八三三到一九零五）说，种种迹像显示，山西等北方省份古时繁荣丰饶得多，衰落的原因「除了政治之外，就是因伐林造成的气候恶化。」于一九二零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 **Walter H Mallory** 在其一九二六年出版的 **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中说，「中国前代的伐林行为，比任何其它大国都要来得彻底。任意砍伐的行为，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国西北地带日渐干旱，并使现在尚较肥沃之地也会因同样原因越来越像中亚细亚地区那样。」

而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莫如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美国学者罗德民教授（**W.C. Lowdermilk**），他于一九二零年代初来华，到一九四五年才返回美国。他说，自某天突然领悟到黄河水患是由于水中的黄泥后，就矢志要找出这些黄泥的源头以期杜绝。他花了三年时间在山西的雨季实地考察，终于确凿找出这些黄泥是沿岸农民砍伐林木造田后所致，并在当地发现一些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灌溉水道也同样因淤泥阻塞而废弃。研究更显示，当地寺庙周围受到保护绿树成荫的森林，就是四周濯濯牛山的原貌！近年的化石花粉研究也进一步印证，这些不毛之地过去曾为森林所覆盖。

可是，中国这样的严重水土流失的情况，洋人那么好奇，也到较晚才知道。据自然科学史学者罗桂环教授分析，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在华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不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代价？那么，从抢救中国的生态着眼，鸦片战争看来是来得太晚了。中国实在没有「不假外求」的能力。

胡人入侵改善中国生态

黄河自中国人摧毁了黄土高原生态后，主要出现两段平静期，但都是外国人的功劳。一是东汉后的约五百年，据已故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的研究，是因为这段时期大量异族如匈奴丶羌等进驻了黄河中上游一带，专事马牛羊等牲畜牧业，令该地带暂时免于汉人不断伐林造田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从而令黄河安流数百年。此说甚有洞见。但我认为还有别的重要原因，就是胡人没有汉人那样耽于厚葬，较少为了厚葬而破坏林木。儒家思想极重愚孝丶盲孝，并压抑正规宗教思想，因而极力鼓吹厚葬（甚至是薄养厚葬），再经董仲舒等儒士引入「天人合一」的谶纬之学，厚葬之风从此失控。厚葬对生态之破坏，对社会生产力之虚耗，简直是惊天地丶泣鬼神。儒家厚葬传统对中国林木的摧残由于太过荒唐，许多人要不是刻意轻描谈写，就是不会相信。就如一九七二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轪侯利苍之妻的棺椁，耗费原木不少于两百立方米！而且都是最珍贵的楠木，并且是可造出一吨多重木头的大古木。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一些研究人员就这样慨叹：「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去做船，日本人去搞建筑，美国人去做家俱丶艺术品，而中国人却去做棺材。」若以造一吨纸需三立方米木材算，利苍夫人棺椁所用掉的木材足够制成六十多吨纸！若以造一吨纸需要二十棵普通体积的大树计，这就等于一千两百多棵大树了！

厚葬除了导致伐林，也毁了大量良田来筑巨坟，从而迫使农民益发伐林造田。

虽然许多农业专家早就指出，中国西北地势欠平，且雨水稀少，气温偏低，宜牧不宜农，或起码也应农牧并行，但国人却从不因地制宜，一面倒的发展最容易破坏生态的农业，彷佛不贯彻「以农立国」就「有违祖训」，对不起老祖宗那样。中国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颁令土地须合理利用，指定坡度十五到二十度的用作牧场；西北等高寒地区发展畜牧和各大河上游两岸以林牧为主等等。但此规定此后似也不了了之。

「用夏变夷」代价惨重

中国人对畜牧业的抗拒，多半也源于国人在大汉主义下架起的夷夏之防（力主「用夏变夷」的儒家对此自然也有责任），以致夷人的生活特色如畜牧业和乳制品也统统不要。诚如潘光旦教授在其〈检讨一下我们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中胪列了汉人的以我为主丶不可一世的心态：「我们自称为诸『夏』，用古文字写出来，『像

人形』，而其它邻近民族在类别上就要低于人了，有的近乎虫类，例如闽和蛮；有的近乎犬类，例如狄，例如玁狁；有的近乎豸类，例如貉与貊；有的近乎羊类，例如羌和羯等等 ......」。

但这种夷夏之防结果又是害了自己。消耗无数林木造砖以修建万里长城；过度发展农业滥伐林木令中国旱化沙漠化；不发展畜牧业令中国的战马不敷应用和骑术不精，以致「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汉兵）以步追之。」汉人能驱逐胡人，也只是一时，而且是惨胜。这不就是国人两千年后在洋人船坚炮利下土崩瓦解的前奏？至于抵制乳制品，则令国人体质虚弱，而未能善用羊毛羊皮，也使国人要消耗更多的林木取暖。黄河水患自胡人被逐后又故态复萌，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工程师 **Oliver Todd** 利用现代工程知识奋斗十年才受到控制。

〈原载于 **2006** 年 **2** 月《开放杂志》〉

以十亿奴隶血汗搅乱世界

◎ 钟祖康

●中国经济发展不重内需，以十亿奴隶劳动大军充作世界血汗工厂，搞得廉价货倾销国外，全球讲人权、讲工人权益、工业环保的君子家焦头烂额。

●6 月 29 日广东河源市 300 名来自重庆的民工被拖欠工资讨薪时，遭到暴力追杀， 1 人死亡，6 人重伤住院。(大纪元)

我从来都说，中国特别是自独专儒家厉行思想阉割极权统治以来，其发展日趋乖张两极，凡事不是过犹就是不及，尽管嘴巴上还在吟哦着甚么中庸之道。中国于清朝时还对国际贸易歇斯底里的抗拒。但今天，却完全一面倒的仰赖国际贸易，彷佛没有出口就活不下去的样子，全国经济全靠出口和外来投资带动，全国人民只顾服侍较花得起钱的外国人，而对较寒酸的同胞则不感兴趣。这情况跟过去中国的友谊商店只做洋人生意，到今天北京故宫一些商店表明「只接待外宾」，一些餐厅、商场甚至公然挂出「国人免进」的牌子，其「财迷心窍」兼「人必自侮」的精神是共通的。

尽管中国经济起飞，但其内部需求之疲弱，与其他同样崛起中的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越南等等比较，都是令人震惊的。当中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尤其具有对照参考意义。

过去几年，已有无数论者，当中甚至包括中共的同路人，警示中国内需过低。中国当局嘴巴上也承认中国内需极度不足，去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坚持扩大内需」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电台就把内需不足形容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内需严重不足窒碍发展

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原因有好几方面。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虽然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号称超过 10%，但全国居然还有数以亿计穷人每天仅能消费一至两美元之间。其实，许多人间乐土如加拿大、澳洲和北欧国家的年增长率不过是 2 到 3 个%之间，但由于全国资源分配政策健全，并奉行均富、人道的社会政策，经济增长虽不多，却可惠及全国人民，反观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即使再高，对于

许多平民百姓，也是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中国经济起飞和以奴工廉价产品倾销海外得来的超巨额财富，只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再加上据估计中国目前每年高达约 4 千亿元至近 7 千亿元人民币的贪污金额，还有合法依法的浪费和大吃大喝，民脂民膏，搜刮殆尽，中国一般大众就难免要将就一下。而另一方面，通过剥削奴工或贪污所得的巨大财富，则源源流出国外，或一去不回头的流往澳门葡京赌场。

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大国，却全国自建国以来没有一个独立工会，中国奴工的工人权利荡然，工资过低，即使节衣缩食，也不会有太多余钱消费。其三，政府对民众的补利照顾和退休保障极度不足，以致民众不敢消费，过度储蓄。其四，一些薄有积蓄或开始步入小康水平的民众由于急于摆脱尚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和压迫性的工作生涯，妄图从备受操纵的股票市场或类似赌场中孤注一掷以求一劳永逸，但结果每是遭遇五鬼运财，血汗钱弹指间又回流到豪强巨富手中。

人权荡然是内需不足的根源

不过，以上的原因往往只是问题的表象。深一层的原因还要归结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面去。当一个政府的施政可以完全不理民众的反应，可以草菅人命而绝无被弹劾或下台的后顾之忧，再加上执政者毫无宗教伦理道德之制约，就很难期望这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关怀民众的福祉，会提升他们等同于奴隶地位的消费力，和设法满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一个稍讲人权的地方，是绝无可能容许统治者像中共当局那样做的。印度的人权与自由虽不及欧美的先进国家，但相对于中国还是自由得多，也讲人权得多的民主国家，因此其管治断断不可能像中国领导那样胡天胡地，加上印度人有远高于中国人的宗教修养，其领导人即使暴虐百姓也是有底线的。印度的经济起飞首先着力于发展国内民族工业、刺激和满足国内消费，目前印度的国内个人消费已超过 GDP 的 60%，而年来崛起成绩亮丽的巴西更厉害，其 GDP 近九成来自国内个人消费，只约有一成来自出口收益，而中国的国内个人消费总额还在 GDP 的 40%左右挣扎。中国社科院去年年底对中国境内 28 个省区市城乡的 7140 多个住户作问卷调查，发现中国的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已经达到了 0.496，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而印度目前的坚尼系数还只是 0.33 左右。当然，有人说印度大城市的市容比上海、北京等差得远呢。但这样的比较，往往忽视了中国是一个连行动自由也没有的极权国家，乞丐并不可以随意四处营生。要言之，中国社会是个讲求门面、面子、

报喜不报忧、隐瞒社会黑暗面的社会，是个典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文化，这方面印度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提升民众消费力有力无心

单从中国每年贪污款额已高达数千亿，就可推断统治者也并非没有资源去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只是极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特别是当官商勾结并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统治阶层就更想永久坐食分肥。若统治阶层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志，提升普罗大众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是不可能由一帮贪官和奸商撑得起来的。就如印度一样，中国地大人多，本身就有一个极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全国可善用分工，互补有无，国内市场就已极具国际贸易的功能。但中国却似乎不把这个内需市场放在眼内，也看来对服务自己的穷同胞没有多大兴趣。

当中国许多农民和奴工还停留在食不果腹、甚至是衣不蔽体的赤贫状态，中国却要做世界工厂，把精力资源都用来服务其他全世界人，很难不令人有「宁予外族，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恶心。而从外国人赚来的钱，却绝大部份由一小撮官、商掌控。人均收入虽然节节上升，却形同画饼，譬如你一年收入 20 万，李嘉诚一年收入 200 亿，那么你们两人的人均收入就起码有 100 亿了，在中国这样贫富两极的地方，人均收入往往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

将极权统治转化为经济力量

中国由于不重视内需，将改革开放释放出来、足以翻江倒海的生产力大都用作服务外国市场，并利用全国近十亿奴隶一样的劳动大军、和利用在生产上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环保开支以及对产品安全的低要求，成功把对国民的奴役、对环保的破坏和对他人健康、性命规如草芥的指导精神转化为无坚不摧的中国廉价货，倾销国外，搞得全球讲人权自由讲工人权益讲工业环保的君子国家焦头烂额，然后再以肿胀了的经济威力「以商围政」，迫使全球的文明国家向中国的邪恶价值观就范。这是不折不扣的「不义而富且贵」，中国再拿着由此得来数额惊人的黑心钱到国外四出并购。

如此卑鄙龌龊的崛起，即使不助长其军事扩张，也肯定不可能是和平的。由于出口持续暴增，许多虚荣的中国人已为国内生产总值抛离印度而沾沾自喜，更为国内生产总值料快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而感到终于「超英赶美」，

尽管相对于德国而言，中国人的文明建设、心智水平还是处于孩童阶段。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领教到，小孩子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的武器，是非常危险的事。

最该进口的却没有进口

相比之下，印度同样崛起，由于致力于发展国内消费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廉价甚至劣货淹灌天下，也没有仗其经济力量迫使其他国家认同印度的价值观，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伤害就小得多，印度虽不似中共天天喊着和平崛起，却在行动上做到和平崛起，这是令人敬重的。印度的「不和平」，只在其与巴基斯坦的恩怨。

中国陷溺于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而轻视内需，是中国经济起飞中大病之一。但这也许还不是中国误用国际贸易的最严重之处，中国对国际贸易最严重的误用，看来是中国人一直没有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它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清朝，中国人只想向洋人买鸦片，或再加些刀枪火炮之类「奇技淫巧」，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只有兴趣通过国际贸易购买洋人的一些实用器物或商业服务。对于有关洋人文明价值体系灵魂所在的产品和劳务，中国官、民依然大都谢绝，而这才是中国人一直最需要的，也是洋人不单道德，甚至连「奇技淫巧」也压倒中国的背后精神所系。中国人若在国际贸易中只管贪图外国人口袋里的钱，和买一些不是最该买的东西，最终也只能做财大气粗的无尾猿，难以进化为文明人的。

〈原载于 2007 年 8 月《开放杂志》〉

中国徒得西学之皮毛

◎ 钟祖康

从中国几百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到，要帮助中国是极其困难的，但要残害中国却是非常容易，因为中国人看来有一种极其顽强的民族性，就是凡事具有惊人的「化神奇为腐朽」、披金拣沙、点金成铁、入宝山捡破烂的本事。譬如说，你叫中国人保护自然环境、尊重人权、贯彻宗教自由、推行民主政治、讲公德、诚实等等美德，真是比登天还难，而且倡议者还随时会有杀身之祸，尽管这些美德足以把中国变成人间天堂；但相反，你要是叫中国人滥伐树木、污染河流、贩卖假货、弄虚作假、言不由衷、贪赃枉法、寡廉鲜耻、奴役人民 ......真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因这正正就是它的本能，尽管这些恶行足以把中国变成人间地狱。

虽然中国人已经倾力对外人隐瞒，但其厌恶美德、沉迷恶习的民族性，还是引起洋人的关注。几百年来无数洋传教士不借苦学，异常困难而且当时在国际间毫无用处的汉语、甚至刻意下苦功钻研绝非传教士份内事的自然科学，以投其所好，令目中无人但又肤浅和讲求实利的中国人，因称奇道妙而进窥西方文化之伟大。

着名的十九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1839-1899)就是无数苦心孤诣、一心将沉沦的中国人挽回正途的洋人之一。花之安独特之处是，他不但比绝大部份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而且多以 (文言)汉语写作，写了多本中文书，实行「文字传教」，以优秀的中文向中国人讲解基督的大义，和对比西方基督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之一优一劣。其中于 1884 年出版的《自西徂东》一书，就是一本比较中国文明和基督文明的经典巨着。此书当时甚受关注，从 1888 年到 1911 年间多次再版，共发行了 54,000 册，是上海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花之安在书中情词恳切，苦谏中国人改邪归正，摆脱儒家文明对中国之祸害，迎接基督 (新教)，字字振聋发聩，正如作者开宗明义说：「多直言不讳」，「绝无浮谈」，以「警醒中国之人」。在此谨略举其对中国之谨论数端，以见洋人对中国了解之深，关爱之切。中国人在这等聪慧洋人眼中，是完全无所遁形的。

中国人好奢好假致穷

花之安首论在中国铺天盖地的穷民：

『以观中国，其穷之流为乞丐者，或则引类呼群，或则扶老携幼，或则匍匐街边，

频呼施舍，或则号泣路上，屡唤救饥，甚或手持蛇蝎、故作惊人，脂粉面涂，将男扮女，种种丑态，不堪言状。夫以都城省会竟有此辈，奚以示四远之观瞻，岂不贻外邻之讪笑乎？』

今天的巍巍神州，奥运强国，世界工厂，不仍然是这副德性与尊容？花之安再从中国之穷了解中国满天的神佛和术数：

『况夫民之穷，更有非此可济者，即如中国秀士之穷者亦属不少。盖游戏文章既贱以售钱，故往往流为风水、星相、命卜，以猎令市廛，终日营营役役，要能精心读书储为他日国家之大用？』

但中国何以穷得那么厉害，花之安认为：

『说者竟以中国多穷民，诿之于地穷，谓中国不及西国地土之富，不知此乃愚人之见。中国土地实能富于西国，盖中华地土膏腴，万物易于生长 .....若西国则土地寒冷，生物艰难，而究之西国竟能致富，然则中西国政之善不善，必有能辨之者矣 .....夫中国致穷之故.....一由于好奢……一由于好假，常费财以作虚假之事，如世上之酬神醮演戏及打斋礼斗，与夫一切虚假之事，皆费钱财，此致穷之道也。至于游手好闲之辈，中国不胜其数，焉得而不穷哉？而且为商者，货物多售以伪，逞奸诈而忘信义，所以货物难以流通。然则中国人之致穷，岂非缘无仁义礼智信耶？』

中国刑罚惨难言状

对于惨绝人寰的中国刑罚，花之安说：

『审讯强用拷打，逼人招认，如拧耳 .....夹棍、火烙.....故常有杖不数巡而毙于堂下 .....而彼良民生平未惯受此痛楚，神魂飞越 .....不得已勉强招认，官府亦以为既已俯首无辞，断非冤狱，良足悲矣。国家.....虽屡诏文官及佐贰武官，不得轻用酷刑，惟垣视为具文 .....真是视民命如草菅矣 .....或曰：华人性情狡诈，不用严刑则不招认，亦无畏惧，不同西人赋性忠直，且知廉耻，可以用轻刑也。愚曰：西人强壮好动，比较华人柔弱好静更为难治，然而西人可用轻刑，而华人不可，其故安在？盖泰西以耶稣圣教化民，故人皆以礼义廉耻为尚，而岂敢肆然犯法乎？ .....虽下民犯罪，义当用刑，而必以仁爱行之 ......。』

花之安不仅批评中国的疯狂刑罚，也极富慈悲之心，鞭挞非人的中国式牢狱：

『今查中国办理狱囚，甚为酷虐，其弊不可胜言 .....罪名无论大小，概行滥禁，甚且有因些微眚薄愆亦被日久羁留.....更即监牢而论，高墙密禁，风气不通，窟室严扃，目光无睹，固已惨难言状，且地势潮湿，多聚蚊虫，土内藏骸，时形秽气 .....(犯人)蓄发垢颜，身衣无从浣濯，以至污恶渐积，疠疫繁生，竟不免有奄奄一息者。况狱官、禁卒，刻薄囚犯，尤为可恶 .....糗粮减削，粗粝亦属残餐 ......蔬菜无非腐烂，饴粥常和以溲水，茶汤动和以冷泉 .....吁！虐待如是，其不死于狱中者几稀矣。然犹不特此也。最可虑者，牢头索诈不遂而凌虐肆行，或仇家贿赂而奸谋陷害 .....与夫衙派无钱、孝敬不到者，同出一辙 .....即或事情明白，幸而释放，而亦才艺胥捐，谋生无术，势必至再蹈前非，复被拘禁 .....。』

中国人「视物为重，视人为轻」

对于中国人之好战与内斗，花之安说：

『盗贼内讧，豪族械斗，中国较多于外国，无一年无之，皆有在上之人不善于调处，或因勒索民财，以至逼民生变.....方今泰西诸国，战争之事虽不能尽免，然其法律严明，不尚诡谲。即一旦猝尔兴师，非比如野兽之徒相扑噬，必先喻之以理 .....从未有如白起之坑赵卒、项羽之戮秦兵，动至伤残数十万者也。』

对于有人谴责西方以殖民主义侵凌中国，花之安也不亢不卑的指出许多中国领土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

『议者动以英国占香港、西洋占澳门，以为贪人之地。岂知欲辟土地，中国亦有明证，试思台湾、西藏与及新疆等处，自古原属外邦，即台湾而论，明朝始有华人来往，而仍未入中国版图 ......。』

作者力斥中国统治者草菅人命之余，也留意到中国人一般也惯于虐杀动物。

『或斗鸡走狗，借为快乐之场；或捕蟋蟀、把鹌鹑，借作求财之具 .....甚有去鸟则玻卵及巢，渔鱼而靡遗种类，所得无多，所害甚大 .....至于市贾屠家，贩卖牲畜，更为酷烈，或缚四足而肩挑，或系一颈而手曳，且大声恫喝，任意鞭笞。

烹煮之时，百般挫折，迟迟其死，致令哀号之声，惊动天地 ......若乃奢侈之徒，口腹是贪，常因一脔之甘，多杀众牲之命，如熊掌、猩舌之类，惨不胜言，遑问其他哉？』

对于中国人压迫妇女不遗余力的陋习，作者一语道破：

『乃中国风俗性情，视物为重，视人为轻，所畜牛羊犬豖，或生有子则不肯轻弃，至于生女反忍溺之，缘其利欲熏心，故倒行逆施至如此耳 .....试思人谁无母.....子女成长，即是人之母，以此推之，则子女之不可戕害，较然可睹矣。』

中国人之极端狡诈，当然逃不过作者的巨眼。

『总之钱财到手，理曲亦属无妨 .....其诡诈实多端矣.....士犹如此，农愈可知 .....更有商人贾客，借贸易为生涯，常思垄断 .....每尚诈虞......更以广东医生而论，与人治病，先怀谋利之心，有等病本轻，而诡言难治.....遇人延诊则假装忙样，纵清闲无事亦必迟之又久 .....其立志甚为卑鄙.....至于街头卖药，尤为医等之下流.....一味诈诬.....至若百工技艺，按日计工，似无术可施其伪，而不知诈伪之心尤为出人意外.....世更有等立心叵测之徒、行为阴险之辈，令人不及知其诈伪 .....当其初，交相酬酢，亦似甚为谦恭，而一入其笼络，必至受其陷害而不知 .....由是上下相蒙，国事必至偾坏而不可复救。今试问中国在朝之臣僚，忠诚无伪者几人乎？在野之士庶，诚笃无诈者又几人乎？』

可见，花之安提到的种种中国病症，及其所发出的疑问，即使用于今天的中国大陆，绝大部份还是适用的。

中国人学西法走邪学歪

但何以西方国家发展蒸蒸日上，而中国却变成道德沦丧、贫富两极、万马齐瘖的人间地狱呢？为甚么虽然中国原本许多条件比西方优胜，却无法推行西方的善法呢？花之安苦思冥想，还是将之归结为宗教因素。

『虽国家录取人员，固喜其有才能学问，但居心之真伪，君上要得而见之？唯能虔心事上帝之人，必依理而行，无面从脂韦之态，而任职定无负国家矣。』

他以中国搞得一塌糊涂的税制为例，

『今试言其(税)法之最善，如英、美、德三国，彼皆从耶稣教之国也。虽耶稣非膺关津之任，非操税厂之权，似于关税毫不相干，而沐其化者，无论官绅、士庶咸知务义，而无假公济私之心 .....泰西人士，间亦有驰骛乎外假之缘，而偶为诈伪者，但较之中国，不至如是之甚 .....良以上帝之心为心，而不至失其真也。』

作者叹息：

『中国人亦有明自而警悟 ……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 .....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树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 .....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致此乎？』

按此，从晚清的「西学为用」到中共的「科技兴国」，西学之皮毛而已。

〈原载于 2006 年 8 月《开放杂志》〉

◎ 钟祖康

过去二十年间，我每次搬房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堆积如山的藏书，每次都要劳师动众，祸连朋友，而且也要费时重新整理，当然更要在寸金尺土的斗室中继续为这些藏书像神主牌一样的辟室供奉。幸而我比许多人都更早醒觉到，无止境的买书和藏书只可能是富贵人家的嗜好，并认识到这会严重危害到个人的财政、居住环境以至行动自由，是快乐人生中的极大负累。

于是我于 1997 年又一次搬房子时，痛下决心戒除买书瘾和藏书瘾，极其沉痛地从数千本藏书中挑出最重要的两三百本，其他的都放弃了。但是，书瘾果然像毒瘾一样，不出两三年，我的藏书又填满斗室了。终于，2003 年，我要移居挪威了，我觉得书本给我的负累要到此为止了。我再一次从数千本藏书中挑出最重要的两百本左右随身。这两年来，在挪威我买的书不超过 50 本(当中几乎一半是关于学习挪威语的，其他也绝大多数是极其廉宜的旧书)，虽然这两年来我身边的藏书是过去廿年来最少的，好友也为我在异乡的精神生活担心，但其实这些日子我在精神上毫无匮乏之苦，反而恰恰相反，由于越来越多新书或旧书可以在网上浏览，这两年来我所能阅读到的书籍和资讯却是平生以来最多的。

百万图书全日侍候

截至 2005 年 9 月，我随时可以阅读的中、英文书约有 1 百万本。有关书籍分布如下，英文书:Netlibrary(www.netlibrary.com)6 万本，Questia(www.questia.com)6 万本，Ebrary(www.ebrary.com)2 万多本，十八世纪经典古籍线上资料库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www.galenet.com/servlet/ECC) 十五万本，早期英语文献线上资料库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wwwlib.umi.com/eebo)12 万本，Amazon(www.amazon.com)30 万本，Google Print(http://print.google.com) 数万本(扣除似与亚马逊重复部份)，另加网上免费的约 5 万本等等。中文书：超星图书 (www.ssreader.com)25 万本(总数有近 60 万本)，《四库全书》8 万卷另加网上免费的约 5 千本等等。现在我要看的书九成以上都有了，连孙隆基的新作《中国人民族性》(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也可以在网上局部浏览。最近要斥资买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是例外。现在我用于买书的开支是十五年前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可随时动用的书籍却是那时的数以千倍。

我连过去丢弃的书都大都没有看完，一些我买了十多年的书还只是翻了几页，我哪里需要拥有 1 百万本书呢？的确，若这 1 百万本书是传统的印刷本，即使我有财力将之私藏也多是病态恋物癖所致。但是现在的网上电子书库，特别是英语的，都可作全文搜寻，不单是搜寻该书的全文，也可以一次搜寻整个书库的全文。我第一次全文搜寻几万本书时的快感，就如我第一次全文搜寻 Dow Jones Interactive 几千万笔资料那样，刻骨铭心。我觉得，全文搜寻书籍，特别是整个书库的全文搜寻，是人类学习的飞跃。这极有助于我们重温过去读过却已印象模糊的知识，和以火速找到我们学习上所需的书籍资料。英国的词典编纂巨人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名言：Knowledge is of two kinds.We know a SubjectourSelvesor we know we can find information upon it. 〈「知识有两种。要么我们认识某课题，要么我们懂得怎样可以找到关于某课题的资料。」〉在这个讲求全文搜寻的互联网资讯革命年代，这句话得到了最透彻的演绎。我也已把我对这些激动人心的资料库的研究，写成《网上搜证实典：附全球 26 名校网上资料库效能测试报告》一书，譬如我示范怎样用博学堂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网络版搜寻，找到雍正皇帝及其他清史家说的「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和示范怎样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 Declassified DocumentsReference System 搜寻，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记录中共在 1950 年代初向香港倾销鸦片的机密文件。

垃圾文献也应数码化

当然，有人会质疑，是否所有的文献都值得数位化呢？备受敬重的历史学权威葛剑雄教授（1945-)在博学堂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制成光盘时，就强力反对，他说「《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是作了不少删改的，错讹之处也不少，其中的不少书当时就没有采用更好的版本，到今天可以说其中的大部分书已经不是最好的版本。」葛教授在另外一篇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更仗义声讨《四库全书》：

『在将《四库全书》赞扬为「伟大的文化工程」时，我们不应该无视成千上万种

不符合乾隆皇帝思想的书籍被毁于一旦的事实，更不应该忘记无数惨死在文字狱中的冤魂和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的可怜的知识分子。』

在名流、学者争嚷「因拥有代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四库全书》而深感自豪」之际，葛教授振聋发聩，令人仰视，但我认为，将粗制滥造的《四库全书》数位化还是意义巨大的，正如葛教授其么也说他在《四库全书》光盘全文搜寻么，才知道「历史」一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得比他所知的早。我的角度是，《四库全书》无论怎样粗制滥造，已是历史的一部份〈反正「粗制滥造」也符合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不论好坏，也是不妨保存、研究的。垃圾一旦成为历史，不但随时有收藏拍卖的价值，也可供研究。就如超星图书库里面的 60 万册数位化中文书其实绝大部份都是没有思想学术自由下的垃圾，同样，已经数码化的自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里面所载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以草菅人命的废话谎话，甚至国内交口称誉的「中国期刊网」也可局部作如是观，但我觉得它们都极有数码化以供永远保存并全文搜寻的价值。大家只要明白我们研读中文资料 -----特别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中文资料 -----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长知识、智慧或磨练思辨，而是想了解五分之一人类得以胡混千年并恶性繁殖的因由，则我们对于处理中文资料自会有一些不同的准则，对于阅读僵化的汉语古籍也会有较大的动力。

千万篇学术论文按之即来

但单单看书并不足够，书本上的资讯一般较旧，而且一些着作从来都不会结集成书，还有全球主要大学的博硕士论文。所以我也需要学术论文和新闻的资料库。基本上，英语学术论文我主要依赖 Proquest(http://proquest.umi.com/pqdw-eb)、综合学科全文资料库 Academic SearchPremier(http://Search.epnet.com)、EXpanded Academic ASAP(http://galenet.gale.com)、JSTOR(http://www.jstor.org/)、剑桥电子期刊全文资料库 Cambridge JournalsOnline(www.jour-nals.cambridge.org) 和 Sciencedirect(www.sciencedirect.com) 等上面约两万种学刊通常自创刊以来的几千万篇全文论文，和自 1861 年以来全球主要大学的两百万篇博硕士论文全文。中文的学术或半学术论文则多靠有近 7,000 种期刊、1,200 百万篇论文的「中国期刊网」 (www.cnki.net)。至于新闻，则主要依赖包括中港台三百多个传媒全文新闻的慧科新闻 (http://wise-news.wisers.net/)、和网罗全球以英语为主的 8 千多个传媒(也有若干学刊)、资料近两亿笔的超级全文新闻库

Factiva(www.factiva.com) 。若要几十年前的旧新闻，则用 Proquest 就《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八份美国主要报刊自创刊以来的全文网上版 (http://proquest.umi.com) 。另外，英国自 1785 年以来的《泰晤士报》已数位化，台湾的《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台湾时报》，和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也大抵如是。

可见，从资讯流通的角度看，互联网狂热决不是一场过眼云烟的狂梦。除了电邮的普及，这里所说的印刷文献数码化在互联网泡沫爆破么依然挺进。亚马逊在网上摆卖 3 百万种书固然值得我们致敬，但其更伟大的贡献可能是，居然能细说服出版商将卅万本书的全文放在站台上让客户作全文搜寻。虽说用户只能免费浏览当中的一部份，但只要稍用心思，这卅万本书固然可作全文搜寻，其绝大部份内文也是可以浏览甚至是存档的。当然「善用」网上资源也有高下，有人觉得亚马逊看来设计简陋的搜寻器一无是处，或者只用来查核学生的作业有没有抄袭书本，但你也可以将之善用为有卅万藏书的私人图书馆。这也正是互联网当中一个可爱之处，就是你不一定要很有「财」才可以善用现有资源，有「才」也可以的，这比较公平。我最服膺香港首富李嘉诚的「知识改变命运」之说，可是知识本身也往往是昂贵得令人却步。要是你真的把我在本文介绍的网上资料库一一订用，一年怎样也要花上百万港元，而这批资料库还大概只占同类产品中的三四成而已。

欧洲和中国未能善用互联网

亚马逊在 2003 年 10 月推出 Search Inside the Book ，容许客户搜寻约 10 万本书的全文以图刺激销量么，Google 随即于同年 12 月悄悄推出 GooglePrint，但最初构想也只是让用户浏览书本的摘要 (excerpt)，么来亚马逊的 Search Inside the Book 越做越旺，在推出第一年亚马逊的销售额上升了近三成，于是出版商更加愿意将书本全文放到亚马逊站台让人搜寻。大抵，在亚马逊成功经验的刺激下，去年 12 月 Google 高姿态公布会于未来六年将史丹福、哈佛和牛津几家大学的图书馆的 1 千 5 百万册图书全文数位化并放到搜寻器上，消息令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文化界风声鹤唳。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让纳内 Jean-Noel Jeanneney 的策动下，欧洲多国初步同意共同创建一个以欧洲语文为本位的搜寻器及类于 GooglePrint 的数位图书馆，以抗衡他们所说的由 Google 推动的英语或美国文化霸权。

英语世界的互联网在雄心万丈的美国人的推动下，天天风起云涌，长期躲进小楼

的欧洲文化守护者所知道的似乎就只有 **Google**，但是已经仓皇失措；在中国大陆，政府则死力封锁互联网上有关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自由人权言论思想。欧洲继续因自负而付出代价，和中国继续因禁绝言论自由而糟蹋了纸张、印刷术到互联网等用以提升文明的工具，竟自作孽，可以怨谁？

〈原载于 **2005 年 10 月**《开放杂志》〉

北欧：大政府的示范教材

◎ 钟祖康

刚过去的圣诞节，我取道丹麦，去内子的来源地 —挪威—游玩了一个多月，和她家人过白色圣诞，也顺道研究一下传诵天下的北欧模式。

北欧国家〈即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跟香港是两个南辕北辙的世界。北欧的政府都是超级大政府，公共开支占 GDP 可高达 55%左右，而香港的公共开支占 GDP 于 2002 年时约为 23%(到 2007 年再降至以 20%为上限)，是超级小政府，即使加上原应要负担的约占几个百分点的国防军费支出，依然是低得惊人。北欧国家的每周工时是全球最短，平均约为 37 到 38 小时，超时工作一律有超时补薪；而香港则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地方之一，每周开工五、六十个小时是极等闲事，多至七、八十个小时亦非罕见〈也绝大多数没有超时补薪〉，但是北欧国家的国民年平均所得却还比香港高得多。

虽然香港约近 20 万港元的国民年平均所得听起来也很可观，但对许多香港人都没有多大意义，原因是香港是发达地区之中贫富最为悬殊者，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高达 0.55 左右，相反，北欧则是全球国家中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地方，坚尼系数约只有 0.25 左右。归根结底，北欧人不会饱死，也不会饿死；香港人则固然有人饱死，假若有天当局好像「不准行乞」那样，下令「不准从垃圾桶觅食充饥」，剥夺市民到街边垃圾桶找垃圾吃的权利的话，还准会有人饿死的。

丹麦的薪俸税为五个北欧国家中最高，个人薪俸税〈当中包括所有社会保障供款〉，最高近 70%，一位丹麦朋友对我说，这个制度所以仍能运作，逃税并未严重到政府要改弦易辙，她相信是因为国民大都有「强者应当扶助弱者」的人道信念。

平等意识高涨

的确，北欧人的平等意识是要大书一笔的。你看看他们多喜欢领养亚洲黄种人就可知一二，后来我更发现，原来他们许多都对黑人有相当好感，而且并非属于口惠的层次，除了偶有出现的通婚之外，更常见的是领养黑人儿童，尽管黑人儿童一般并不容易领养得到。这些在一般白人社会当中已是少见，在汉人社会中更是不可思议。尽管中国人不停吹嘘中华文化如何伟大，如何憧憬天下大同，但真相

是，许多都是些弄虚作假的圆机活法。大家可以想想，不要说跟黑人结婚，就算是领养个黑人孩子，你的父母、亲戚会有甚么反应。

高位者无高薪厚禄

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支撑如此庞大的福利开支，不单是因为直接税率高，也是因为居高位者愿意不拿高薪厚禄，这点在公务员架构中最为明显。譬如在挪威，其公务员之首〈即总理〉，月薪大概只有 **6** 万多克郎〈即等于 **6** 万多港币)，《注 **1**》而且没有房屋津贴，缴税后更少至 **4** 万克郎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务员大约月薪有 **15,000** 克郎左右，缴税后就约有 **11,000** 克郎，最高与最低职位的税后收入相距仅 **4** 倍左右！在北欧国家，从来没人像香港华人或新加坡华人提出甚么「高薪养廉」的高论，也没有人扬言公务员队伍会因薪酬不够高而人才流失。若以除税后的工资比较，那里领导人的薪金约是年薪 **340** 万香港特首的六分之一，是年薪 **900** 万金融局局长任志刚的十六分之一！又如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现在年薪是 **410** 万港元，另加他因董建华推行「高官问责制」而得以提前每月领取的 **7** 万港元长俸，另加免费入住白加道 **15** 号占地面积逾 **32,000** 平方尺、月租估值起码逾 **30** 万港元的「政务司长公馆」，另加获免费提供的公馆每月逾万港元的电费，再另加公馆内获免费供应的 **8** 个工人！但在北欧这边，自 **1996** 年上任以来表现出色的瑞典总理兼现任欧盟轮任主席培尔松 **(GoeranPersson，1949-)**每天早上还会亲手熨好当天要穿的衣服，他说，「我每天都会熨一件自己洗好的衬衫，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没甚么好奇怪的」。我跟挪威人论及此事，他们的回应是**"verynormal"**(非常正常)，这就是北欧社会很典型的平等精神。你若去问一问曾荫权那样家仆成群会汗颜否，他准会插科打诨地说，这会有助减轻香港的失业率！尽管工资是由香港人支付的。

北欧国家的公务员没有因为没有年薪百万就敷衍塞责，仍然可以把他们的地方建设成全球最出色的地方。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北欧 **5** 国多年来一直高踞头几名，目前挪威更名列榜首，而香港却只是屈居于头 **20** 名之外。

不要说北欧在经济、民生、政治和文化等等方面的整体发展上抛离香港，就是从一些很简单的施政上已看出官员的表现跟工资高低没有必然关系。譬如挪威就绝对没有出现香港那种空玻璃瓶、空胶瓶和空铝罐胡乱弃置的环保灾难，即使在当地街边的垃圾桶也不容易找到一个，这当然与他们的公德心好有关，也因为所有这些空瓶或空罐都有不菲的按金。

譬如一铝罐或小型胶瓶汽水若卖 6 克郎，罐子或瓶子的按金一般就是 2 克郎，卖 15 克郎左右的大型胶瓶汽水的空瓶按金就一般是 4 克郎。所以民众绝大部分都会自行把空罐或空瓶储起来，去超级市场时就大批拿去兑现。通常超级市场都有一座回收机，顾客把空罐或空瓶一个个的塞进去，拿回收条，这张收条就是再购物时的现金代用券，也可取回现金。这部回收空瓶空罐的环保机，原来就是挪威人发明的。为了让空瓶能多次重用，那些胶瓶一般比香港的坚固、耐用得多，当地越来越多饮品改用胶瓶盛载，店里的汽水多的是装在外表陈旧的瓶子里，原来「旧瓶新酒」可以是个很环保的意念。

香港的官员、议员年薪百万〈港元〉，年年以公费出外考察，为甚么没有把人家这些从盘古时代就采用的智慧解决方案移植香港，任由空罐空瓶淹城，严重作贱自然资源呢？当然，街边一旦少了空铝罐也许会使以拾铝罐养命的长者再无法自食其力生存下去，这也许是官府大人为免香港走上福利社会的难言之隐吧。

放眼全球，香港特首与高官人工之高，仅次于另一个独裁国家新加坡。看来正正是因为政府无须向民众负责，政府才以这样无法无天，比殖民地年代搜刮得更猖狂。香港公务员架构的问题决不是冗员太多〈通常是「没有拉帮结派者」会被归类为「冗员」〉，而是人工太高，特别是高层的。香港的问题不是政府开支占 GDP 太大，而是政府开支中竟有近 7 成用于公务员薪酬，这跟香港的大学约将 7 成的开支用于员工薪金一样荒谬。有时薪酬过高反而会降低员工表现，因为他们太怕失去工作，以致为保权位，不择手段，荒废正事。而香港政府给香港的大学教授发给他们在其他劳动市场难以得到的薪酬 (香港的正教授月薪近 13 万港元，尚有其他大量福利)，这种跟香港平民一般只有月薪数千港元的生活水平完全脱节的薪酬，除了令香港教授的生活容易趋于靡烂，在社会问题研究时难以想象普罗大众的困苦，更坏的是，他们为了保住这超高的薪酬，而大都洁身自爱，不敢投身跟政府对着干的民权抗争运动。所以，他们的高薪酬也是变相的掩口费。

确保人人有尊严生活

北欧人不喜欢挥霍性消费。月薪缴税后若还有 3 万克郎(挪威币)，已经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而税后 1 万克郎在那里算是较低的人工，但同样可以过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在那里，有全民医疗保险，有全民老年退休保障，有远高于糊口式接济的失业援助，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一律不收学费。在挪威，失业人士可以领得相等于其在职收入约 6 成的失业救济；一旦有了孩子，母亲起码有为期 10

个月的全薪产假，或 12 个月的 8 折支薪产假。另外每个孩子每月有 3,000 克郎的补贴(除非使用政府的托儿所服务)；一对夫妇退休后若同时领养老金，每人起码每年有 8 万克郎。跟许多的中国人政府刚相反，北欧政府实在对国民是体贴入微的，他们才是中国统治者最爱讲的「爱民如子!」尽管他们绝对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口号和道德训诲。若你去问那些北欧人是否真的接受那样高的税率，很典型的答复是:「政府真的很照顾我们，税是没有白缴的。」

一个介绍北欧模式的瑞典网站这样说，「北欧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民众大都没有因为 50%的税率而打击工作意愿.....人还是渴求工作多于失业的 .....生产力仍较许多地方高，社会保障并没有降低生产力.....在这种高税率制度下，北欧几乎没有美国贫民区那样的贫穷或温饱问题，没有无家可归的问题，只有极低的犯罪率，和人人不问贫富均享教育和医疗服务。」北欧国家已经以行动而不是口号来证实了这个评语。

我身在北欧，没有办法不把那里的超级大政府跟香港的超级小政府比较，为甚么超级大政府带来了如此人间乐土，而超级小政府却送来了投机倒把、自私自利和满城愁云惨雾？我想到多年来香港官员、商界，甚至传媒全力以赴的推崇小政府，一面倒的诋毁大政府，甚至有人说贫穷是推动个人努力必不可少的元素。每念及此，大呕不止。

〈原载于 2002 年 4 月 5 日 179 期香港《资本杂志》〉

《注》1 港元的币值，已从 2002 年 4 月的 1 港元约兑 1.07 克郎，跌至 2007 年 4 月的 1 港元约兑 0.70 克郎。

附录：北欧人最诚实

也许，在一个接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政府底下，诚实这个美德特别重要。《读者文摘》去年测试了 35 个国家民众的诚实程度，方法是在每个国家挑几个地区，然后故意在每个地区掉下 10 个内有相当于 50 美元的当地货币的钱包，并附有物主的通讯资料。结果，北欧国家表现最突出，挪威和丹麦是仅有的两个把全部钱包交回的地方，而芬兰和瑞典的钱包交回率也有 80%和 70%。反观香港，10 个钱包中只有 3 个交回，诚实度之低，在三十多个国家中列于倒数第 2，仅在墨西哥之上《见表 1》。

记得我的北欧朋友说，在那里不是随便可以遗失财物的。我在丹麦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就对丹麦人的诚实感到吃惊。他说曾两次在哥本哈根的游乐场游玩后掉了钱包，两次回去都可以到工作人员那里领回。他说，他的孩子正在幼稚园上学，老师常常教他们不可以拿别人东西，孩子都很诚实，有时还会指正企图越轨的父母。其实，香港学校的老师也有这样教导孩子的，在许多学校的走廊、课室还悬挂大量随时会让那些北欧国家自愧不如的道德箴言，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讲一套做一套」，加上整个香港社会上的达官贵人、特首高官都在忙于弄虚作假、指鹿为马、坑蒙混骗，就很难期望蚁民以德报怨了。

奴隶主和奴隶的民主

◎ 钟祖康

当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人权自由远远落后于香港的地方如台湾、南韩、南非等地——已民主起飞，普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时，香港的民主派还只是停留在以极屈辱的条件下争夺立法机关半数的议席 ......这样羞家的事若发生在法国，肯定已有人要上断头台，在美国也起码会有独立革命 ......

我在近二十年前开始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曾经相当热衷，在八九年六四屠杀后尤甚，我一度以为香港人已经摆脱了一点中国锤炼了千年的奴才遗毒。但不用十年，我已颇肯定，香港人仍是以奴才占绝大多数，发展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当年积极协作前港督杨慕琦推动民主政改，但为华人冷待的的辅政司麦道轲（**David MacDougall**）于四十年后回顾说，「若一群人不想自治，而你偏要去推动他们自治，当中的困难，是不容低估的。」（见曾锐生教授着 **Democracy Shelved** 《被搁置的民主》）

奴隶和奴隶主合作无间

问题不仅是被统治的没有兴趣当家作主，中国统治当局也不想民众当家作主，对一切倡议人民当家作主的言、行赶尽杀绝。最近，在香港以长期推动文化思想知名的马国明反思香港的困局时说「任何保证都不及政治上自决来得实际。政治上的自决正好是非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只有政治自决才可能培养本地的政治人才，才能发展出一套切合本地形势的体制。」在我来说，这只是现代文明人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近于沉闷的常识，决无石破天惊之处，但对一般国人或领导人来说依然是触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条的原始人类大忌。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等超保守传统华人社区发表这样的言论，需要的不是才智，而是相当的道德良知和勇气。

果然，隔了三天香港《文汇报》（七月十四日﹀就以《严重违反常识的奇文》为题，痛击马国明：「作者以此煽动港人追求『政治自决』，已不是一般意义的言论自由问题。某报︵即《明报》）于二〇〇〇年五月四曰发表锺祖康《台湾有权独立》一文，其分裂国家的谬论当时就受到社会广泛抨击。事隔四年，某报又发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决』的文章，令读者感到惊讶。」

到今天，即使是香港的民主人士仍普遍闻政治自决而色变。年前涂谨申访台后为

了避免中共指其支持台独，居然搬出乃父的大一统思想家训来，说幼承庭训，从来反对台湾自决。能够在这个烫手议题上也能诉诸祖训、面面俱圆，不需要辛苦自己的脑袋，实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御用学者刘兆佳的民主缓行论

中国统治者不但死不肯承认无数中国人宁愿被外国殖民政府统治这个事实，也拒绝让其国民自己当家作主，坚持一切必须由党领导。单从香港的例子已经看到，中国统治者必要时会宁愿维持殖民专制统治，也不会让当地中国人发展民主。香港的民主发展其实早已万事俱备，只因中共的箝制。御用学者刘兆佳教授曾经搜索枯肠，据「条件论」找到一个香港现阶段难以全面民主的理由，就是说香港没有政治领袖！但民主制度精髓之一不就是凡夫俗子也可治国吗？而且，要是香港真的缺乏政治领袖，刘教授多年来指导主子压制民主之道，本身不正就是香港培养不出政治领袖的原因之一？这跟香港左派工会一边说要争取工人权益却一边致力建设压制所有人︵包括工人︶权益的政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

要是刘教授以香港人奴性太重为缓行民主的理由，我反而觉得可以商榷。毕竟中国统治者之所以那么容易箝制民众，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国人普遍奴性深重。一个巴掌拍不响，奴隶与奴隶主关系之形成，通常是要双方合力才能完事的。香港民主（更不要说中国民主）堕落到今天这个田地，无论是做奴隶主的（如党中央、董建华或是扬言「长毛」梁国雄当选就会移民的胡应湘之流），还是做奴隶的（包括笔者自己），都有责任。但我认为在香港议会内胡混廿载的民主派人士责任尤大。就如鲁迅说的那样，「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

民主派交白卷面无愧色

当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人权自由远远落后于香港的地方如台湾、南韩、南非等地在过去十至二十年间已一一民主起飞，普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时，香港的民主派还只是停留在以极屈辱的条件下争夺立法机关半数的议席，而且也是明知是如水中捞月，甚至即使争取得到，立法会的权力也如木乃伊一样的被重重捆绑，而且当选后还要宣誓拥护那份没有奴隶参与制订的奴隶契约基本法。这样羞家的事若发生在法国，肯定已有人要上断头台，在美国也起码会有独立革命，在南韩会有人掷汽油弹和自焚，在日本会有人自行剖腹自尽，唯独在香港，一众其实比司马

迁更屈辱的所谓民主人士（却没有受宫刑的司马迁的成就），特别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居然仍可以继续面无愧色、一派舍我其谁的声称扞卫香港民主，又再慷慨激昂的参与立法会选举，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这令最单纯的人也不得不怀疑，究竟这批民主派真的有甚么像南非曼德拉或台湾民进党那样的民主鸿图大计，还是只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让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眼里只有每年逾两百万（港元）的议员薪津。这样巨额的议员薪津，就如香港特首的薪酬一样，放诸全球都是一流的。单单一个议员四年下来的薪津已达八百万，真个是拿来与董建华单打独斗也足以鏖战几百个回合。莫说两百万，若是有心有力，在香港二十万一年已经足以让你心无旁骛的作「搞事份子」了。但连任又连任，四年又四年，八百万又八百万，香港的民主进程因他们推进了几寸？据我所知，议员还是首先修身齐家的多。

任人宰割的顺民难言民主

所以，监古知今，到现在我还看不到香港有哪一个立法会的所谓民主斗士真的是不可或缺的。我也不敢对他们再抱甚么期望。不过，理解政棍的心理不难，难以理解的是居然有那么多已经被生活压得半死、已在轮候跳楼，和已被政府和立法会议员愚弄半生的蚁民居然也像那些候选人那样，热情如火的投入这样的选举活动，将投票率推至空前的五成五。将票投给保皇党，固然是为虎作伥，奖励无耻，但将票投给长期交白卷的民主派，也是纵容无能。香港的民主派结果只协助了当局布置了美轮美奂的假民主橱窗。若问假民主是否一定比真独裁好？包括殷海光等思想家和民主先驱就不同意，因为假民主会混淆概念、污染语言，难以防范，反而真独裁明刀明枪，容易对症下药。香港立法会选举只是一场炮制假民主的假戏，却有那么多选民跟候选人声嘶力竭地假戏真做，场面实在滑稽。对此，国魂鲁迅也语妙绝伦：「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所以说，香港的广大选民要不是与候选人狼狈为奸，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奇怪却有评论员以「第一世界选民、第三世界选务」来形容这次选举。我以为，这次选举从选民、候选人到选务都十九属第三世界货色︵如果没有第四世界的话︶。难道逆来顺受、无法不守︵包括恶法︶、低首下心、耐性过人的就是优质选民？甚或为虎作伥也是优质选民？通观人类奴隶史，民主从来都不属于这样的顺民？从欧洲、美洲到亚洲的民主国家，有哪一国的人民像香港人那样逆来顺受、奴颜

婢膝的？以香港选民的性格，莫说不会介意二零零七年没有普选，即使到二一零零年也没有普选，他们至多也只会继续很有秩序、很有耐性地上街游行，然后和平散去，而民主派议员则继续以扞卫民主为选举口号，直至永远。

——转自《开放》

长期统一导致今世落后

◎ 钟祖康

中国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教授说，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

圣诞节北上挪威第二大城市伯尔根与妻子的家族欢渡节日，再次感到这个高度富裕、文明和现代化的社会，人伦间的关系明显比华人社会来得成熟，以「发乎情、止乎理」居多；他们手牵手围着圣诞树不分老少都随便唱得出多首传统歌曲，其乐融融，其情感人。

我在摄氏零度左右于屋前的北海垂钓，起码一公斤的鳕鱼（ cod）、青鳕（pollack，挪威语 lyr），几乎垂竿可得，而且只是用金属造的假饵（这里的人钓鱼罕用真饵）。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在阳台垂钓即可。北海除了给挪威带来每天三百万桶时值一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巨量渔产。国人若见此状，必发出「得天独厚」之类惊叹，而不知中东、非洲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发财工具，加上滥采导致油产日减，并未能像挪威、加拿大或美国那样的惠及平民；另外，国人亦无视全球许多渔米之乡包括中国许多地方，由于竭泽而渔和疏于保育，已变成不毛之地。在这心境下，我展读当今演化生物学大家 Jared Diamond 教授（戴蒙教授）的巨著 Guns,Germs and Steel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各社会的命运》），戴蒙教授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为甚么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澳州、非洲，甚至亚洲，而不是欧洲人被他们征服？

戴蒙教授说廿五年前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当地甚孚民望的土著领袖 Yali 问他：「为甚么总是你们白人生产出那么多货物，带来新几内亚，但我们黑人却自己只能炮制出那么少的东西？」的确，正如作者说，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无比艰深。当时他没有答案，却在往后廿多年萦绕于怀，不断追寻，方有所获，他说这本书算是给 Yali 的一个答案。但从笔者看来，戴蒙教授不但回答了 Yali 的问题，也解答了许多中国人的疑惑。诚如当代生物学泰斗威尔森 Edward O Wilson 教授评该书说「对社会议题思考之深、表达之清晰，无出其右。」笔者以为，此书夺得一九九八年普立兹奖，仍未足以说明其份量。

万年前最后冰河期决定人类分野

戴蒙教授称，当前人类发展的不均，关键起点在一万三千年前人类最后的一个冰河纪之后，自那时起，在不同大洲之上的人类发展差异明显增大，有些地方发展出使用文字和金属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则只发展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再等而下之者，还保留着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状态。这个不均的历史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世界的模版，因为使用金属和文字的社会其后征服甚至灭绝了其它社会。而征服者的武器不仅是刀枪，也包括细菌，例如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以六百士兵攻陷阿兹特克帝国（ Aztec），其后再以不足两百士兵轻取印加帝国，靠的就是当地土著没有免疫力的天花。

戴蒙教授深刻研究了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万三千年的发展后，总结出几个左右一个地方或一个大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大因素是，这个大洲上有多少适宜于大量繁殖的野生动、植物。原因是只有发展农牧业，才可以令社会上一批人无须为口奔驰，可以专心发展其它专业、钻研治国之术或专职从军。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动、植物数目其实不多，分布也极不平均，譬如澳州只有一种动物可供畜牧，而当地土著也没有将之驯服。

第二大因素是，鉴于大部份社会的科技、政治制度，以至用作畜牧的动植物，大都来自其它社会，而不是由自己发明或发现，所以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便于器物发明、思想和动植物传播（ diffusion）的条件，非常重要。这一点与我历来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自由传播思想和充份善用发明，往往比发明本身重要，这已从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得到最佳印证。器物、思想、动植物之传播，要视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地理上的主轴是由东而西，还是由南而北等等。若是由东而西，即广大幅员在相同纬度之上，气候接近，则动植物、风俗习惯传播容易，如亚、欧；反之，若主轴是由南而北，即地域横跨多层纬度，气候处处不同，传播艰难，这是非洲特别是美洲难以在洲内快速传播文明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寡。地大、人多意味着会有较多发明，较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和不求改革即被歼灭的压力。

中东肥沃月湾粮区变成沙漠

所以，作者说，中东和中国各样条件其实不坏。在地中海之东的一片平原，土壤极其肥沃，气候温和，迅即成为人类产粮重镇，人称「肥沃月湾」（ Fertile Crescent,即今天的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为中东日后的领

导地位埋下种子。从公元前八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欧亚洲（ Eurasia）西面的发明，几乎都是来自「肥沃月湾」或其周边。一直到公元十五世纪，科技还是主要从伊斯兰世界输入欧洲。但为甚么「肥沃月湾」自十五世纪逐渐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呢？主要原因就是，「肥沃月湾」变得越来越不肥沃。从考古资料可见，原来「肥沃月湾」曾大部份为森林所覆盖，但由于伐林造田、或滥伐木材，而当地的降雨量偏低，和大量羊群觅食，树林来不及再生，卒将「肥沃月湾」变成沙漠，世界文明中心亦随之逐步由「肥沃月湾」一带移往西欧及北欧。作者说，生态破坏与文明衰落、权力转移关系甚大，这也是另一个文明｜马雅文明｜没落的重要原因。今天，许多人每将中东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当作是与天地并生的无妄之灾，是「祸从天降」，其实都是人祸！考古学家更发现，甚至是撒哈拉沙漠，在公元前九千至四千年之时亦非沙漠，而是处处草木、湖泊、野鸟之地！滥伐林木和沙漠化，不正是中国自古而然、于今为烈的大问题？但作者不从这角度去解释中国的没落。他提供了一个令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者更尴尬的答案。

郑和与哥伦布故事的启发

戴蒙教授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像「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么干燥，生态环境没有那么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十五世纪初，中国派郑和七下西洋，在一四零五年的首航中，有「宝船」六十二艘，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随行二万七千八百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后由于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开始了廿八年后戛然而止。对于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但戴蒙教授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 Medina-Sedonia 公爵，被拒后，再去求 Medina-Celi 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戴蒙教授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戴蒙教授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而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

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教授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五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幸而中国出不了哥伦布

◎ 钟祖康

我在上一篇为推介戴蒙德教授 (Jared Diamond，1937-)大作《枪炮、病菌与钢铁》 (Guns，Germs andSteel)发表的〈长期统一导致今世落后〉一文，在网上引起颇大回响，在着名的中国思维网，更迅即跃为该网站本年最多人阅读的文章 (见 www.chinathink.org/Aindex/lisu_n.asp) 尽管这些网站已经擅自给拙文题目加上个问号，减轻震荡，许多有中国大陆背景的读者看来还是怒不可遏，并提出不少质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大陆政府历来向民众灌输的思想是：中国越统一，中国就越强大，人民就越幸福，跟我在文章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反：干吗人生最高价值所在 -----国家统一-----突然变成中国落后的罪魁呢？

本来，「领土越统一，国家必越强大，民众必越幸福」这种废话之荒唐，是不辩自明的，就如说两个地方、两家公司、或两个人结为一体，充其量只可以说可能会更加幸福，却万万不可以说，必然会更加幸福！反而因结合而带来痛苦的例子倒铺天盖地，蔚然成灾。要是欧盟成员国只许加入不许退出，你看会有多少国家会感兴趣？现代文明社会要是没有离婚的自由，你说有多少人会愿意结婚？至于「指腹成婚」、「抢婚」、「逼婚」、「先奸后婚」等等封建陋习，即使在中国大陆也已在法律严禁之列。但这些封建陋习的幽灵却仍然主宰着廿一世纪的中国政治。

国家前途不宜孤注一掷

不少读者问，若说中国的领土和政治大一统令郑和的航海事业无疾而终，拱手予哥伦布，从而令中国 16 世纪后的发展被殖民大国急速抛离，那么美国既大一统又强大的现象如何解释呢？这问题的答案有几方面。一是戴蒙德教授只是尝试解释中国在 16 世纪后落后于欧洲的特有原因，他发现中国过于统一，一再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但他并没有将这种解释引伸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毕竟每个地方有其不同的发展经验。这就正如一个地方四分五裂是否就一定成功呢？当然不是。但大一统本身肯定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而中国在这样的豪赌中输得屁滚尿流。中国人素来口头上视赌博为恶习之一，却对自秦以还的领土统一和自汉以来的思想统一这样的惊世豪赌没有感觉。

其次，不要忘记，美国其实是欧洲人成就的延续，美国的扩张，当然是意味着欧洲价值、利益而不是亚洲或非洲价值、利益的扩张。美国的成功，是一群现代欧

洲人在祖先的文明基础上，走捷径成功的故事。美国社会在这种源于欧洲文明传统的理性和自由等精神的调和下，减低了大一统的风险。但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设若「南北战争」是主张蓄奴的南部胜出，美国文明就会遇上难以预计的逆流。至于「统一」的程度，美国也远不及中国，美国总统的权力虽大，但与中国的皇帝、主席、总理相比，还是万不及一的。

有读者说，戴蒙德教授和笔者将领土统一和政治制度混淆了，即是说问题的关键应是一个地方是否独裁还是自由，而不是统一还是分裂。此论貌似有理，但有其严重盲点。那就是，哥伦布当年身处的欧洲，还是专制君主的天下，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专制国家林立，但由于诸国互不隶属，各有不同利益盘算，互相竞争，因而令不同构思或发明有发展空间，不容许一个胡闹的政策垂之永世，也不容许真知灼见永沉海底。要是中国身处欧洲，恐怕两千多年来就不会将孔夫子的臭脚抱得那么紧，也不会将妇女的香足捆扎一千年那么长。中国也不至于成为闹剧大国。而且，诸国林立，异见人士必要时也有路可逃。这跟中国先秦时代列国纷立、百家争鸣空前绝后的景象何其相似。若再追问，干吗欧洲可以从罗马帝国逐步良性分裂为生机盎然的多个小国，而中国则从诸国林立、百家争鸣，堕落为领土和思想俱高度统一的一潭死水？要言之，干吗中国人具有如此巨大「化神奇为腐朽」「点金成铁」的本事？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当中部份原因或者又要回到笔者早前所说的中国毒铅文化长期窒碍中国人智力发展的研究去寻找答案。

又有读者将欧盟之形成说明中国应该统一。笔者只需指出三点，就足以说明这是谬见。一是欧盟主要是经济而不是政治联盟，二是欧盟成员国可以自由退出，三是欧盟的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把普世的民主人权自由价值观推及所有会员国，但中国说的统一台湾是指由独裁残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统帅，而不是把台湾的民主人权自由普世价值，推广到中国大陆，或像德国统一后由西德的民主人权自由普世价值，取代东德的独裁统治那样。所以，现在中国说的统一是由落后统一先进，由野蛮统一文明，与国际间文明社会的做法完全相反，这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危害人类罪」 **(Crime against humanity)** 。

欧洲分裂有助启蒙运动

欧洲的分裂不仅造就了哥伦布，也对其后令欧洲文明跃升的法国启蒙运动功不可没。近读史学泰斗巴森(**Jacques Barzun**，**l907-)**新着《从黎明到衰颓 **-----**西方文化生活五年》

(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对此再得印证。当年法国的启蒙运动主将伏尔泰 (Voltaire，1694-1778)和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得以完成《百科全书》伟业，亦蒙益于欧洲的分裂。伏尔泰被法国政府追捕时，就跑到柏林给腓特烈大帝润饰其法语诗篇，再浪迹布鲁塞尔、萨克森 -哥达公国(Saxe-Gotha)、日内瓦及法德边界的 Colmar，瑞士和法国边界的 Ferney，以便随时逃亡。另外，本身热爱文学的俄国女王凯塞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 1729-1796)一直与伏尔泰和狄德罗保持紧密连络，当她得悉狄德罗在法国出版有困难时，即邀请他可以随时到俄国完成并出版大作，只是狄德罗坚决留在巴黎，但凯塞琳大帝的热情支持，肯定对狄德罗的士气和法国当局的态度起过作用。

同理，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也一直因为中国仍然未能彻底统一而屡屡「因祸得福」，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者为了面子，死口不认。要是中国当年以徐福东渡日本的历史为依据强行索回日本这片「神圣」的中国领土；要是中国第一时间摧毁中国的租界，第一时间引用「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等理由索回香港、台湾、南韩、澳门，第一时间扫除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基地及活口，中国的万马齐瘖场面肯定比现在惨烈百倍。

一个中国已经太多

笔者虽然对戴蒙德教授的观察力相当拜服，但对其立论也不是照单全收的。按笔者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即使中国于 16 世纪的航海事业没有中断，成就了一个中国的哥伦布，我相信这或会令西方的势力扩张减速，却不容易将中国的命运扭转。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一小国扩张成超级大国后的业绩。从历史看，中国政府的管治能力奇差，弄虚作假、草菅人命、暴殄天物、胡天胡地是其专长。再看日人管治台湾和东三省、洋人管治租界、英人管治香港、葡人管治澳门的成绩均无一例外，凌驾中国人统治，全部成为中国本土难民天堂，中国管治之劣，铁证如山！要是当年中国人择居澳洲，英国人开拓中国，中国会否变成难民天堂，或未可料；但澳洲变成难民输出大国，则可断言。所以，我很怀疑，即使中国五百年前出了个哥伦布，也只会令美洲变成另一个鬼哭神嚎的人间地狱，人民仍要为温饱权和生存权挣扎，密西西比河、田纳西河的河患从「百年不遇」增至「千年不遇」，希特拉会好像毛泽东那样因杀人够多而获封神。这是损人不利己的大罪孽。以中国人的人均自作孽算，世间有一个中国都已经太多了，谁会希罕两个！中国出不了自己的哥伦布，阿弥陀佛，真的是全人类的福气，也可能

是中国人几百年来，对世人的最大贡献。但这样的观点，只有中国人自己才容易领略，也只有中国人〈而且是自由地方的中国人〉才可以比较安全地说出来。

〈原载于 **2004** 年 **3** 月《开放杂志》〉

为甚么中国人那样蠢？

◎ 钟祖康

中国为甚么两千年来反复下沉？中国为甚么长时间无法解决许多在其他文明国家无不胜任的事务？中国为甚么无法既发展经济，同时又发展政治、文化和人伦道德？中国人为甚么会如此精于发明并发扬陋习，中国人为甚么会奴性如此深重，崇拜一个又一个以文明社会标准而言，属于十足无赖流氓杀人狂的东西？一言蔽之，中国胡混至今起码两千年，其病安在？

过去，我致力从中国的地理位置或思想垄断等因素思考中国的没落问题。直到近来我发现了一个被所有历史学家忽视了的重大视角，就是中国人很可能是比常人蠢的民族。我说的蠢，不仅包括呆头呆脑，如梁任公说的「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见《新大陆游记》 **1904** 年〉

我说的蠢，更包括损害整个社会福祉的个人小聪明或大权谋。我发现，中国人之所以蠢，不仅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两千多年来一直奉行如余英时教授所说的「反智论」，而是，中国人很有可能生理上的智力发展存有重大缺陷，以致做出了诸如把女人的天足捆绑了一千年；将止泻药阿芙蓉〈后称雅片，再后称鸦片〉当饭来吃；妄图只用道德口号和法律而不用宗教就想把中国变成道德大国、「礼义之邦」；妄图只用法律而不用传媒力量就能促使为官者奉公守法；不断以加高两岸大堤来解决黄河水患，以至当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至 **116.86** 比 **100** 之类罄竹难书、旷古绝今的荒唐事来。

中国人做的蠢事，真是绝对不可理喻的。又如中国人自儒家教导我们要重男轻女之后，就完全再不能用自己脑袋想一想：疯狂压迫糟蹋女性，令其肢体残废，「无才便是德」，即使撇开这种虐杀女性的行径是多么邪恶不论，但这样做难，道不也会严重损害男性的利益吗？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吗？难道只会是女性自己受苦吗？女性占了人类的一半，是所有人的母亲，也是所有中国男丁的母亲，难道她们因缠足而甚么运动也做不了〈当然也难以参与正常生产活动和行军之类〉，身体搞得羸弱不堪，有办法不生出一个个东亚病夫来么？个个「无才便是德」，可以怎样教育孩子呢？但闹剧并不到此为止。一个国家毫无需要的制造了那么多

不能料理自己生活的残障妇女，怎么办呢？于是又要炮制一大群让她们饭来张口的奴婢，还有把她们搬来搬去的人力轿夫。每个奴才下面都一个令自己暗自庆幸的更悲惨的世界。

但据闻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全球最脆弱的，极易伤害，揭发中国人蠢是很敏感的事，决不能假手于洋人，否则会引起种族歧视的轩然大波，情况或跟中国人只接受中国人打中国人那样，所以笔者感到责无旁贷。

中国儿童血铅含量惊人超标

近年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大陆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报告和新闻报导，其中一项关于中国儿童的血铅含量(**blood leadl evel)**，最为令我震惊。中国当局不同机关近年针对中国城市青少年的血铅含量经过多次检验，一致发现中国城市儿童的血铅含量高得惊人，中国城区平均约百分之五十二的儿童中血铅含量超标，有的地方如广州、深圳更高达七至八成，即使海南岛也超过三成。而在先进文明国家，铅中毒的儿童最多不会超过几个百分点。铅中毒最大的问题是，脑部发展会受破坏，智力发展不良，精神涣散，无法专注学习，有的会有过度活跃症，最新的研究显示，犯罪行为与血铅含量也甚有关系。血铅含量对儿童的祸害大于成人，原因是儿童的脑部尚在发育，智愚待定。

有关中国儿童血铅含量研究显示，儿童体内大量的铅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本身也是铅中毒的母亲，其次是空气、餐具、食物，玩具、室内装饰等等。中国人育儿历来讲求天生天养〈其实是自生自灭〉，婴儿尚且可以成为席上珍」、「壮阳补品」，探讨儿童的身心健全、智力发展、正常学习的问题就难免有曲高和寡之虞了。

无怪，无数中国儿童学习迟缓，长大后如李鹏那样的一脸呆相，也无力解决中国千古常新的「老问题」，中国人学者每每要离开中国才大放异彩，甚至勇夺诺贝尔奖〈和平奖或须以坐牢受刑为资格，又当别论〉，看来不尽是因为中国教育资源不足或政府长期控制思想所致，也极有困难可能是由于中国人脑部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破坏而无法健全发展。美国疾病及预防中心年前比较了中国大陆领养儿童抵达美国时和抵达一个月后的血铅含量，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已从严重超标降至接近美国儿童的水平，可见血铅含量在干净环境下即迅速下降，这多少解释了许多在大陆学生或血铅含量偏高地区包括香港等地区的学生去了血铅含量偏低地区求学后，往往有脱胎换骨的表现。即以笔者的个人经验，不才自逃离香港深

水埗移居血铅含量超低地区兼环保胜地挪威以来，也感到头脑思想比以前更清醒、精猛、敏锐，更能集中精神，开始领略清洁环境和高度文明发展的关系。

但令人沮丧的是，虽云血铅含量可以降低，研究显示，早年铅中毒患者 (特别是妇女)即使他日康复，体内的铅也很可能会永久藏于骨头里面，成为日后诞下「毒婴」的祸根。

以智力为代价的国粹

中国人血铅含量特高，稍经考究，似乎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中国文化中有几种国粹，其实令中国人的智力付上了惊人代价，但中国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大抵也是太蠢之故。那就是青铜器、炼丹术和铅釉陶瓷等等。

中国自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这段所谓青铜时代，制造了大量青铜器，炼制方法是将铜、锡及大量的铅混和起来，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古代青铜器铅含量高，从百分之一至三十不等，藉以降低青铜的冶炼温度，并令溶液柔化以利加工。青铜器不仅广泛应用为生产工具，也普遍用作餐具、酒器。这是中国的青铜器发展跟西方的青铜器发展一个不同之处。青铜器由于是贵重器皿，在中国主要是贵族阶层或富贵人家的玩物，在历朝的皇宫都是主要的装饰和餐具。可以推论，青铜器对于抑制中国统治阶层的智力，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在 1869 年的巴黎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青铜器极之夺目，特别是表面都有一层黑色的光泽，观者无不惊叹。后来，巴黎音乐院 (Paris Conservatoire) 的人员就把这些巧夺天工的青铜器化验一下，发现这些青铜器含铅量极高，通常占 10%，最高估 20%，这就是中国青铜器与欧洲青铜器在成份方面最大差异之处，也是中国青铜器远比欧洲青铜器美观的原因。这个事件除了反映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华精粹，对于中国人铅中毒问题也有相当启示意义。 (详见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1874 年第 98 卷第 1 期)。

另外，铜钱相信也曾经长期是中国铅污染的重要来源。过去就曾有研究人员认真化验过乾隆年间铜钱的化学成份，发现这些铜钱大致是由「铅、青铜、黄铜」为主的多种金属混合而成，当中铅含量动辄高达 10%，最高竟达 26%！(详见《考古化学》 Archaeological Chemistry ：Materials， Methods， andMeaning231-244 页 2002 年)。加上中国人爱财如命，钱不离手，还有中国

一直无法建立健全的纸币制度 (这也可能是太蠢之故)，中国人从铜钱当中所吸收的铅，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至于另一个可能更能抑制中国统治阶层智力发展，使其难以清醒思考的国粹是道家的炼丹术。所谓丹，就是将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人体毒药共冶一炉，哄骗蠢人长生不老的不学无术。故炼丹术又名「铅汞之术」。〈详见何丙郁教授的《中国科技史概论》〉就如常人忽视妇女缠足、长期宵禁等中国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样，对于炼丹在中国历更上规模之大，破坏之巨，中国人也是不甚了了。中国人在儒家的思想教育下，缺乏了一种超越现世、令人怀着盼望离开尘世的宗教，结果极度厌恶、恐惧死亡，眷恋现世，哪怕是似人非人的苟活，也不惜一切以冀无限延长。炼丹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占据了整个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的心灵，也因而令他们吞下了大量铅和水银，不但破坏了他们的智力、学习能力和脾气，也令许多人包括皇帝赔上性命。

监于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权力极度集中，代表全中国人民思考，他们智力受损，对中国破坏极大。

铅釉陶瓷铺天盖地

中国自汉代兴起铅釉陶瓷，成就了唐代的唐三彩，和中国的琉璃文化，却甚少中国人关注铅釉对人体毒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技师、釉工因铅中毒而早死，或在绘图中途中铅毒弃世，以致留下不少待完作品的惨事，恐怕也是许多人闻所未闻。中国的铅釉陶瓷文化一直祸延至今，今天中国大陆的铅釉餐具，俯拾即是，「毒碗」满天飞的报导还不绝于闻，香港的廉价陶瓷餐具绝大部份来自中国，也算是有祸同当。中国人买餐具重价钱、色泽或耐用与否远多于安全，不会考究这是劣质铅釉彩，还是安全而略贵的釉中彩、釉下彩。中国人嗜茶，但古来多少茶壶茶杯以铅釉制成？今天则连茶叶都有铅了。英国人同样嗜茶，但早在 250 年前就有人看到并解决这个问题。嗜茶的华尔医生 (Dr.John Wall，1708-1776) 想向穷人推广品茶，又担心铅釉茶具的毒害，于是致力研究，卒以皂石 soap rock 制成无铅的白磁，创立今负盛名的 Worcester 磁器厂。但在中国，只听闻玩物丧志的警告，却甚少人将嗜好与知识、科学结合起来，至于有闲阶级关心贫民死活，则属多管闲事。而且，中国的独裁统治者长期以操纵、压榨和驯服民众为保住万年江山、维持政治稳定的法宝，最怕的正正是民众不够蠢，现在铅中毒能有效压制民众智力发展，使之贴服如黑羊，不违国情，不正是求之不得

的愚民妙法？但中国人是否蠢到某一个地步就会比现在单纯一点，少一点尔虞我诈和阴险毒辣呢？若是的话，他们变得笨一点也可能未必全是坏事。

推而广之，随着中国输往欧美发达国家的陶瓷餐具日多，加上当地也有许多民众旅游中国时私下购买劣质铅釉餐具，和其他大量进口的如儿童玩具、茶叶等铅污染中国制品，相信假以时日，欧美人士的血铅含量必渐提高，那么中国愚民相对之下就没有那么笨了。以笔者看，中国人口之劣质，已不再限于「东亚病夫」〈全国感染结核菌者 **5** 亿 **5** 千万人，乙型肝炎带菌者超逾 **1** 亿 **3** 千万！**)**《注》，也在其智力缺陷；「黄祸」的含义已不仅指中国向外倾倒劣质人口，也扩展至倾销劣质害人商品。

中国的毒铅文化并不以此结束。过去中国妇女嗜服铅粉〈即宫粉或胡粉〉去胎，大夫以铅粉治病，美人揽着铅制的青铜镜或铅镜，以铅粉扑面，「夫铅黛所以饰容」〈见《文心雕龙》〉，中国妇女一天不洗尽铅华，实在很难清醒。自然，古人「以镜为监」，也有越照越蠢的危险。

〈原载于 **2004** 年 **1** 月(开放杂志》〉

《注》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确认，全国有多达 **5.5** 亿人感染结核菌，占中国总人口的 **45%**。有关资料可见人民网 **2006** 年 **3** 月的报导，**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4236518.html**

为甚么中国人那样脏？

◎ 钟祖康

香港的 **SARS** 瘟疫〈又称中国肺炎或称非典型肺炎〉在酿成近两千人死伤后开始沉寂之际，香港特区官员也开始跳出来指挥了。当局基本上只将香港的 **SARS** 瘟疫归因于一点，就是环境太脏。对于《基本法》导致医护人员薪酬过高、进而导致医护设施不足、医护人员过劳之类的政治问题，他们只字未提；至于中国文化一贯贱视人命、迷恋面子以及仇视资讯流通的普遍病态，众高官更视若忌讳。特首董建华已经委任正正被指要为瘟疫爆发负责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担任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实行自己调查自己，董建华甚至着力声明，这调查只会「对事不对人」，也就是说，不容许有人像台湾官员那样要引咎辞职！以「不准有人负责」来规限调查的性质，在中国狗官发展史上也好像闻所未闻。

在这重重禁忌和形式主义的框框下，政府除了可以说要认真清洁香港之外，实在很难有甚么较为敏感的建议。

当局为此成立全城清洁策划小组，由年薪 **400** 万港元、福利逾 **500** 万港元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统领，并将乱抛垃圾罚款 **600** 元倍增至 **1,500** 元，再针对公屋居民实行垃圾罚款扣分制，被扣满分得就要搬离公屋，被罚者的家人也得连坐受罚。

当局只是以清洁环境来预防 **SARS** 瘟疫，正如我一贯所说那样，是片面的。但更糟糕的是，当局对香港环境肮脏的成因看来一无所知，估计清洁香港的大业落在曾荫权手里，最后也是如他处理香港经济那样落得个「乱点鸳鸯谱」的收场。

「街道脏、政治亦脏」

中国统治者只把中国人之脏视作病源，而不是病症，是中国人至今仍然污秽不堪的主因。不了解中国人特脏的成因，不可能让中国人清洁起来。

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够脏的。经济学者林格教授 **(Christopher Lingle ，1948-)** 说，新加坡「街道清洁、政治肮脏」**(clean streets and dirty politics)** ，五个字，就尽得新加坡的治国精神矣，但中国社会则肯定更不如，因为它是「街道脏、政治亦脏」。当年英国掠夺了香港之后就被香港华人的肮脏习性折腾得很惨，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香港瘟疫频仍，英国人和英军在香港死伤甚众，当时在英国就出现了 "go toHong Kong"〈「去香港」〉这句习语，意思就是叫人去死。职业风险太大，看来这也是香港的英国人公务员薪酬特高的原因之一。

为了远离华人污秽的活动范围和逃避瘟疫，香港的英国人绞尽脑汁，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开拓并进住海拔五百多米的山顶〈即今天着名的香港山顶〉，并立法禁止华人搬进来。这些措施，今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是种族歧视，却只有很少人明白英国人这样做有其保存性命的必要。若问，谁叫你英国人来侵占香港呢？但从文明提升的角度看，英国人其实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不请自来的文明导师，他们若不能在香港留下来，损失最大的是中国和香港。百多年来英国管治香港的文献显示，英国人就曾很努力的改善香港华人的肮脏习性，但由于中国人已经停止独立思考逾两千年，文化顽劣过人、每有披金拣沙、去精取粗、在宝山中捡破烂，化神奇为腐朽的特性，英国人的努力在这方面只能做到自保，未能令香港华人脱胎换骨。

为了攻破中国人特脏之谜，我曾就教于多位在世界多个地方呆过的洋人，问他们觉得哪个地方的人最脏，答案几乎都是中国人。当中一位当教师的曾与他的香港学生讨论印度人脏还是中国人脏的问题，那教师说肯定是中国人更脏，令香港学生非常惊讶和不快，显然这些香港学生都像一般香港人那样，还是深陷于大中国情意结和肤色歧视，深信印度人或者说是肤色深于中国人的必比中国人脏。

我又就教于每被香港华人歧视的菲佣朋友，她说最初来香港做菲佣时，跟香港人雇主一家人上酒楼饮茶，见身边一位茶客的喉头竟然咕噜咕噜片刻后吐出一口大痰到地上，她大惊失色、恶心至极，无法进食，出于礼仪，向雇主讹称肚饱，其后他雇主发现后解释说这是香港的普遍现象，不必惊怪，莫说吐在地上，餐后将桌上空杯当成痰罐的吐痰亦属等闲。我的菲佣朋友自此开始领教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华文化。

中国人自古咳唾成风

的确，中国人古来对咳唾之事似不反感，甚而颇有雅兴。中国人不但歌颂「唾面自干」为「风范」、「涵养」，更有诗情画意的：「李白才高，咳唾随风生珠玉」、「咳吐成珠玉，何妨旁若无人」、「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咳唾随风，无非珠玉」、「偶然飞咳唾、珠玉满天风」、「诗成咳唾笔如神」、「辞人咳唾皆成珠玉」、

「咳吐成章」、「无限珠玑咳唾中」、「幸闻咳唾之音」、「锡以咳唾之音」 .....一大堆雅化咳唾的词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更有甚者，东晋时期〈公元 317 年-420 年〉的贵族苻朗，每当口中有痰，皆命「小儿」〈即侍从〉跪而张口，让苻朗咳唾而出，苻朗称此为「肉唾壶」，故事还收录于对中国小孩影响至深的童蒙必读书《幼学琼林》！顺便一提，像「肉唾壶」这种充斥于中国历史的骇人秽事，只有中国人或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人才会相信，你对外国人说，他们准会认为你是在丑化中国。

清末大臣李鸿章出访时，就因把痰随意吐在外国皇宫的名贵地毡上而声名大噪，考证显示他是有痰盂也不用。由此看来，比起苻朗和李鸿章，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只用痰盂不用「肉唾壶」，和没有把痰吐在地毡上，无可否认已是不小的进步，尽管相对于文明世界还是有着令人极度不安的距离。这些在洋人看来彷佛是「自古以来」、自出娘胎以来就没有的恶习，中国人要花上一千多年才略见成果。所以，中国人说中国不断「进步」也是对的，但往往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国父孙中山就会这样记录：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块贵重的地毡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不到办法，就当着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毡上的痰擦干净了。当我擦痰的时侯，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中山先生就说：「像那位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毡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见中国人举动缺乏自修的功夫 ......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 (1904 年)如此描述中国同胞：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弱优劣可见。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人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而下，真自惭形秽。』

是以，中国人咳唾成风，早有光辉传统。加以中国人身体长期偏弱，异常分泌物特多，痰情越涨；益且，中国人童年每多匮乏，以嘴部孺动为人生快感主要来源的口欲期 (oral stage)也可能延伸至成年。在这强力文化传统的笼罩下，似乎教育的作用也有限，我就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见过不少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偶然飞咳唾」，只恨末睹「珠玉满天风」。

草菅人命培养不了公德心

但问题的核心是，为甚么中国人会随意在外面的地方咳唾，却罕有在自己家里的地板、床头咳唾呢？为甚么许多人会将秽物往街上、窗外乱抛，却罕有在自己家里乱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官员一直避讳的原因，就是民众觉得自己的家才是自己的，所以地方脏了就会心痛、就会坐立不安，而外面的世界则是统治者或巨贾所独霸的，故其美丑好坏也是与他无干，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也是中国人「有私无公」民族性的一大根源。

追源祸始，原因就是政府本身是并非由民众选举产生的独裁政府，因此施政上完全无须向民众负责，可以事事独断独行、草菅人命、只重国计、不问民生，高官日薪逾万〈港元〉，小民月薪数千；富者一餐万金，贫者以垃圾为食，如此社会，民众只会感到自己像乳牛一样的被压榨、像麻疯病人一样的被疏离，哪里还有甚么社区归属感？当为政者已经狗肺狼心，待民如猪狗，道德荡然，还有甚么理据、有甚么道德力量要求民众讲公德心？当统治者视民众若贱民，就只能要求贱民履行贱民责任，不可能讲公民责任的。

譬如我自己一向不乱抛垃圾，不当众吐痰，绝不是因为我对香港有归属感，不是因为公地脏了我会心痛，或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所谓公德心，或觉得自己有责任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只是自己个人的清洁习惯使然，若有机会，我倒是很愿意将污痰吐在草菅人命的狗官过厚的脸皮上面的，还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唾面自干」的中国美德。香港即使脱离殖民统治被祖国收回了，但我依然像绝大部份香港人那样被剥夺普选最高政治领导的权利，不能像台湾人那样普选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过百万香港穷人由于纵容主子而依然过着贱民一样的绝望生活，政府高官则个个起码月薪数以十万港元，这样的鬼地方，我有可能会有归属感吗？看到这个可比作所多玛 (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的邪恶之城的陨落，难道我会痛心吗？

香港民众即使有公德心，我看重点也绝不应放在环境清洁上面吧，而是怎样结束这个草菅人命的苛政！

再者，当民众被压迫过甚、痛苦难抵时，有人会靠药物、酒精、赌博、烟草甚至毒品来自我麻醉，也有人伺机以破坏性行为来发泄一下，乱掷垃圾、秽物即属当中一个发泄途径，就如向狗官掷臭鸡蛋、烂蕃茄一样，这都是人情之常，这种赤贫户的反抗手法，我们虽不一定要鼓励，却应深为理解和同情。正如中国圣人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更严重的，就是中国人叫的「玉石俱焚」了，如孟子说的「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那么孟子是公然教人犯法、犯上作乱了。当在位者个个只顾奴役民众，只顾自己穷奢极欲，自己日薪等于民众的月薪，还可以要求他们关注地方清洁么？

一个草菅人命、道德荡然的政权，决不可能培养民众的公德心，决不可能令民众自发地保持公地公物清洁，要既推行苛政而又想搞好公共卫生，就起码要学新加坡那样的课以重刑和羞辱，诸如犯者要当众扫街示众。绕过政权的残民本质，而一味要民众拥护政府的政策，清洁香港，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过份需索；当民众已竞相排队跳楼、烧炭自杀，你却要跟他讲解病菌的可怖，向绝望的人施以阻吓性的法律制裁，向寻死的人判以死刑，只要用脑袋而不是屁眼想想，就会明白只会枉费心机一场空。

〈原载于 **2003 年 7 月《开放杂志》**〉

一本巨著在华的百年孤寂
——读《中国人的特性》

◎ 钟祖康

1890 年，在华传教已廿二年的史密斯先生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汉名为明恩溥)出版了《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此书在往后几十年在欧美和日本也传诵不衰，在国外影响着几代人对中国的认知。

那个时候，史密斯出版了《中国的格言和谚语》(The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of the Chinese) 一书，1899 年，他出版《中国农村生活》 (Village Life in China) ；1902 年，他在被义和团围困于北京使馆后，写就《骚动中的中国》 (China in Convulsion) ；1906 年返美，多番向罗斯福总统游说，终于说服美国把庚子赔款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办妥庚子赔款一事后，他再临中国，并于一次大战后出版《中国之振拔》(The Uplife of China) 他于 1932 年在美国逝世，享年 87 岁。

中文译本波折万重

《中国人的特性》一出版，法、德、日译本随即问世，国际间好评如潮，但在中国却颇受冷落。中国人对知识的传播、保存和累积已不济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大抵已用不着争辩的了，这本书的遭遇只是个很寻常的例子。

到 1902 年，上海的作新社才按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出版，但看来流传不广，甚至博学如鲁迅于 1936 年辞世前还一再诉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见《立此存照》之〈三〉)〈《且介亭杂文附集．立此存照 (三)》，1936 年〉

据张梦阳的研究，大抵鲁迅在 1902 年到日本留学时便看过这书的日译本。鲁迅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他一生作品的主题也跟这书作者的观点相当吻合。

到 1937 年，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 (1899-1967)在其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

族卫生》中收录由他操刀的《中国人的特性》撮译本。从他的自序可见，看来他也不知道过去曾经有人把这书翻成中文。〈潘光旦此书于 **1995** 年改以《潘光旦文集 **-----**第三卷》的书名重印。〉

直到 **1995** 年底，在原作出版了 **106** 年后，我们才有由张梦阳和王丽娟执笔，第一次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全译本。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看来也对以前的两个译本一无所知。

就译本素质而言，我的评价是：作新社译本以文言行文，不合今人阅读，而且从日译本转译，益生谬误，加上已绝版多年，可置之不理；潘光旦的译本很准确很传神，但并非全译；张梦阳等人译本最大缺点是有时严重误解文意，唯整体而言还勉强可以。

勾勒中国人鞭辟入里

本书共廿七章，其中廿六章都是缕述「面子」、「婉转之才」、「有私无公」、「置舒适便利于度外」、「知足常乐」、「无侧隐之心」等等作者心目中的中国人特性。他论中国人对外在环境怎样木然无觉：

『西方人不爱被人凝神注目，于从事甚么细致或艰难的活儿时尤甚。中国人却不然，彷佛看的人愈多，他便做得愈起劲 **.....**中国人虽不打骂你，也不嘲笑你，但是一双双没有流露半点同情心的眼睛，也够让人发疯的。』

他论中国人怎样不爱运动：

『在中国人眼中，运动简直是多余的 **.....**他们对于外国人热爱运动，总是难以了解。漫无目的地、平白的散散步，他们总以为有点无聊。 **.....**至于对拚了老命似的赛跑、比球，他们尤其大惑不解。有位广东的老先生，看见一个外国女人打网球便问她的佣人，「你主人这样为了一个小毛毯赶来赶去，人家到底给她多少钱？」』

他论中国人有怎样超人的耐性：

『中国人的忍功，比任何民族都要强。以前一个老童生，一直考到九十岁，不考

中不止，不考死不止，非极有耐性的人决做不到；功名利禄一类的解释是不中用的。中国人善忍耐是天性，一如麋鹿之善走，鹰隼之善视.....。』

他论中国人怎样不求准确：

『.....例如一斗的土地究有多大，便谁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每个地方不同。贪官污吏向乡民纳粮时便借此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好在中国人耐性好，否则革命早就来了 ......在中国一斤名义是十六两，实际却只给十二两，而且这是公开这么做的，因此又谈不上是欺骗，人们至多也只会视之为这个行业中的「老规矩」.....「我想中国第一代的化学家做实验时会把「一、二十个微粒」和「好几十个微粒」相混，结果引致爆炸以身相殉的不在少数。』

他论中国人怎样欠缺同情心：

『对溺水的人不予营救，令在中国的外国人大为吃惊 .....在中国旅行，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沿途的人见陌生人不肯帮忙 .....当你身陷困境时，他们却会蜂拥上来围观 .....』

他论中国人怎样讲面子：

『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个关乎事实的问题，而是格式的问题，不是事实对与不对，而是格式合与不合.....缺点给人家指出来了，便会有失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确凿，也非要抵赖不可 .....。』

他论中国人怎样能屈能伸：

『在中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成功就是一切。』

目光如炬的大幽默家

民国初年着名社会学家李景超教授在农村待了好一段日子的实地调查后说，「明氏 (即作者)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作者不仅是个目光如炬的观察家，更是个大幽默家，而且是戏而不失之于谑，可让愁苦的中国读者带来多一点生趣。要是有人只是硬抓着他一两个历史资料或判断上的明显谬误而对这本书放言贬损，实在是大不幸。

中国人若有这样一本帮助了解自己的经典也不看，又或是看了还是不反省、不自新，恐怕唯一的解
释就是这是中国人吧。

〈原载于 1996 年香港《星岛日报》，本文引用原文部分取自潘光旦译本〉

为甚么北欧能，中国不能？

◎ 钟祖康

联合国一年一度的人类发展指数又刚公布，依然是挪威排名第 1，这已是挪威连续第五年成为按联合国发展计划定义下全球最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而香港名列 22，竟置于名列 26 的南韩之上，仅排在德国后面！而中国也竟能位列 81，比文明得多的南非还足足高出 40 名，而另一个独裁政权新加坡也能居于 25。可见，这发展指数并不太重视一国的民主人权发展，而且也多只会听取各国自行呈报的资料，或假设全球人类的坦白程度、道德水平是难分高低的。譬如在「主要国际人权文件状况」一栏下面，甚么《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等，残暴独裁如中国都一一签署更予确认，甚至连那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也有签署，只差在没有确认，加起来中国所签署和确认的国际人权文件竟然比美国还多！而且，该联合国发展计划居然指明「中国」的人口包括台湾的人口，并称台湾为「中国的一省」，而台湾也因而得不到任何原本可凌驾于中国的排名，但同时尚未立国的巴勒斯坦却可以「被占领巴勒斯坦地区」(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的名义在人类发展指数获排名！由此种种看来，此计划的运作及其排名对一些独裁而又惯于报喜不报忧、以谎言治国应世的政权如中国、香港等最为有利，也因此对这一类无赖国家的排名不可照单全收；但对于普遍有诚信有廉耻心自尊自重的国家，由于其提供的资料可靠得多，其排名还是不至于太过混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报喜又报忧却依然可以高踞榜首的国家，确是要另眼相看、虚心学习的。

基督教国家一枝独秀

在这个必要的认识底下，这个人类发展指数由于涵盖面比同类指数明显较大，其排名还是有其意义和重要启示的。首先，从多年来包括今年的排名，在表现出众的国家当中显然已可归纳出若干规律。就以 2006 年的排名而言(其他年份的排名也差异不大)，在首 20 名的国家中，国家规模大小不一，有小如冰岛或卢森堡，也有大如美国、加拿大、法国；气候方面，按照我过去申述的理论，当然是集中于偏寒地区，但也有澳洲、纽西兰、西班牙或意大利等少数几个较炎热的国家。左算右计之后，当中最值得注意的规律包括：在首 20 名的国家中，有 20 个奉行自由民主政制，有 19 个是基督教国家〈当中 10 个是新教 Protestantism，9 个是天主教〉，并注意当中没有一国信奉无神论。更值得注意的是，挪威、瑞

典、冰岛、芬兰和丹麦五个均推行「北欧模式」的北欧国家，一直夏宴独造，稳踞最前列。这一次挪威、冰岛、瑞典、芬兰和丹麦的排名就依次为 **1**、**2**、**5**、**11** 及 **15**。北欧国家长期表现突出，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不少人，特别是中国人会说，北欧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足为法，说它们都是蕞尔小国，极易管理，对于中国这堂堂大国没有可供借镜之处，并照本宣科的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类「国情」论者大概不知道，世界上许多小国其实也是可以管治得一塌糊涂，像中国那样变成人间地狱的，如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176** 在榜末倒数第 **2** 的塞拉利昂，人口只有 **500** 多万；排名 **173** 的几内亚比绍 **(Guinea-Bissau)** 人口只有 **160** 万；排名 **172** 的中非共和国人口只有 **400** 万；排名 **157** 的厄立特里亚 **(Eritrea)** 人口只有 **440** 万；排名 **153** 的毛利塔尼亚人口也只有 **300** 万。同理，冰岛的人口跟澳门同是只有几十万，何以两者文明水平，从政治、文化、经济、环保等各方面的发展均有云泥之别。当然有人会说，这样的比较未免太简化了，我只是想突出中国人爱以中国人口特多作为停留在半野蛮状态的「国情」理由之荒谬绝伦。其实美国人口也有 **3** 亿之多，日本那么小的地方也有 **1** 亿人口，按照中国人的逻辑，美、日政府也大有把国民草菅人命的特殊国情需要。所以，我看关键不在于甚么「国情」，还是在于「民情」。有甚么素质的国民，就必会制造出甚么样的「国情」来。譬如，若在一千或两千年前把典型的中国人搬到北欧，中国人准有能力以其博大精深的儒家中华文化把北欧搞到人口爆炸，第一时间耗尽所有天然资源、导致人相食、峡湾断流、沙漠化、生活艰难又不准移民，并下海禁、筑长城、又笃信阴阳五行、满天神佛、妖气冲天，还有女人缠足千年、皇帝和读书人则专心于炼丹玩命，最后靠着人多势众霸占了起码半个欧洲，把原本桃花源一样的欧洲糟蹋成中国大陆式毛厕一样。

中国人总是忘记了，中国几千年前也曾经是个苗条小国，痴肥只是后来的事。

而典型的北欧人挟其文化到中国也必能把中国治理得如今天的北欧那样，就如英国人把澳洲和纽西兰打造成两朵出亚洲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英国人带去澳洲和纽西兰的不仅是征服土人的武器，更是一个优秀文明**-----**基督新教文明。

即使今天就把中国和北欧国家的领导人互调，北欧国家由中国人管理，中国由北欧人管理，以从我对北欧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认识，我也敢肯定，不出百年，中国可以「奇迹地」改邪归正、由蛮邦进化为名实相符的礼义之邦，而且经济发展无需以道德沦亡和摧毁生态为代价，也再不会有人说甚么中国不能发展人权自由的

「国情」。相反，今天北欧诸国如在中国领导人的管治下，我也深信，不出百年，他们就可以把这片人间乐土变成人间地狱，并会出现北欧诸国不能发展人权自由的「国情」来。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遇到的困难总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全世界都是难以明白的，全世界的成功经验都是无可借镜的，总之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而且充满黑色幽默的是，中国人说所有问题都是外人造成的！受害人还要乐于陪葬，因为「子不嫌母丑」，而且也不可向国际文明社会求救，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北欧模式」不易理解

外面世界要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北欧模式」，真的不太容易。除了地理上的因素，还有语言上的隔阂，五个北欧国家的英语水平虽有相当，但整个社会的运作、人际交流到书面资料一概只以本国语出之。虽则北欧国家没有出过甚么经济学大师，至今也只得过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其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特别是国民所享之平均经济福祉，却长期是国际第一流。它也没有出过甚么政治学大师，但其民主政治却并非来自欧美甚至也不是源自雅典式民主，而是独立发源于北欧地带，比欧美民主来得更早也获公认来得更彻底，这一点，当代 (美国)政治学大师道尔(Robert Dahl，1915-)直到近年回顾人类民主发展时，才猛然发觉北欧诸国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不假外求的独特发展历史，而他本人的祖父就是来自挪威。另一个令外人难以认识北欧模式的原因是：北欧人不像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或香港人那样喜欢自我宣传，他们一般非常低调、谦卑、不尚清谈、炫耀、甘于淡泊甚至孤寂，从来不会像中国那样日日夜夜闹着要「崛起」或「和平崛起」，或像新加坡推销「亚洲价值观」那样推销「北欧价值观」。「北欧模式」那样成功，北欧人本来就最有资格以此向外炫耀和推销，但他们却一以贯之的继续脚踏实地的踽踽独行，就如中国人说的如锦衣夜行那样。他们以行动，而不是言辞让所有怀疑者折服，这与中国人沉迷于纸上谈兵、超英赶美、弄虚作假恰恰相反。

要是你碰到一些北欧知识份子，特别是一些不常见的无神论者，他们倒会向你抱怨这片乐土的不足之处，以及会很有教养的以充满同情谅解的态度，谈论对中国发展的欣赏和期盼，加上他们一般强烈反美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交流准会让典型的中国人听得非常舒服，也因而甚么都学习不到，继续沉醉于巍巍五千年中华文化。中国人放不下文化大国使者的身段，令他们很难欣赏夷人文化的优秀之处，他们也不明白，中国文化是整体失败，而只有个别成功例子的文化。而且，中国的个别成功例子也多仅以中国标准衡量而言，而且也没有计及「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涉的天文数字。

虽然，也有人说，在北欧模式的幸福生活下，人很容易变得精神虚空，但要治疗这个精神病也很容易，不用叫他们到中国的爱滋村或上访村体验一下，只要安排他们到香港的笼屋〈约 18 平方尺的铁笼〉小住一两个星期，或在香港做一两个月每天 10 小时至 15 小时或以上、时薪 16 港元的清洁工，精神空虚的北欧人肯定会马上发现人生的意义，并确认自己的祖国是人间天堂。

私心太重难容「北欧模式」

所以，尽管北欧文明有许多值得中国人或香港人师法的地方，但要中国人或香港人认识并道出哪些地方值得师法也并不容易。一般中国或香港官员当然最喜欢考察新加坡那样臭味相投的独裁国家，但即使他们来北欧诸国考察几个星期，恐怕也只能看看热闹而已，就如香港特首曾荫权几年前考察完北欧诸国回来后，印像最深刻的就只有那里蔚蓝的天空而已。对中国人或香港人来说，了解和效法「北欧模式」之难，不仅在于文化差异，也许更在于个人私心。譬如，香港的高官愿不愿意放弃目前动辄几十万港元的月薪，像挪威总理和部长那样只领取几万港元的月薪〈并一律没有官邸也没有房屋津贴〉，也容忍最低下的杂工也领取相等于自己月薪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工资？又如香港会有多少大学教授愿意把人工减半和取消房屋津贴，容许大学门口的警卫员的人工只跟自己相差一半呢？在香港〈或一般传统华人社会〉这是绝无可能的，香港的领导人早已声明这会造成「人才流失」，而且中国人也多笃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怪论。许多诸如此类的社会结构差异，真不是习惯了中国主奴式统治的奴才所能想象的，就像猴子要了解人类社会的那样艰难。若再追问，为甚么挪威人，或北欧人那样有人道精神，而香港人或中国人就没有呢？那就简直等于问，为甚么猴子没有进化为人类那样，要回答并不容易。

〈原载于 2007 年 2 月《开放杂志》〉

为甚么中国主子不如英国主子

◎ 钟祖康

在过去三年多在海外生活的日子，无数外国人，当中包括新闻工作者、专业人士、政界人士、商人等等到一般平民，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在被中共收回之后有何转变。这样的问题出现了过百次，我也回答了过百次。每次我都会说，若在政治方面，最大的分别是，九七后的中国主子远不及九七前的英国主子诚实。

论香港政治的民主成份，除了末任港督彭定康通过扩大功能团体的投票权而给香港带来多一点点民主之外，九七前后的民主发展相差不远，那时港督或者现在的特首都是由主子国〈即那时的英国或现时的中国〉所一手包办，香港一般平民是绝对无权过间的。

英国主子诚实得多

不过，虽然英国主子跟中国主子同样是剥夺了香港人普选港督或特首的权利，但两者在实际处理手法上却有天渊之别。英国主子从来都是坦白表明港督是委任的；但中国主子却从一开始，投入了惊人的人力物力，炮制出一个个假选举大秀来，然后就向全世界宣布：香港特首是香港人选出来的，并说这是英国人管治一百多年来也没有做到的事情，并从而结论说：香港人终于当家作主了。中国主子甚至还说，要以此向已享有普选的台湾人民起示范作用。

当局若把多年来耗费于这假选举的资源用于救济香港的穷人，相信香港几千个像狗一样匍匐于笼屋的笼民都可得安置了。中国人的资源，往往就是为了弄虚作假而这样糟蹋掉。

除了行事较中国主子坦荡荡得多之外，英国主子拒绝给香港人民主，主因之一正是中国政府不容许香港人有民主，国力日薄西山的英国只好向魔鬼就范，并因而打破英国在撤出所有殖民地时均开放民主的惯例，被迫破例引进符合中共要求、极其畸形的反民主选举制度和投票方法。相反，中国主子是否在香港推行民主，并不受制于任何其他国家。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之中，会反对香港推行民主，普选特首和立法机关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因此，在开放香港民主的问题上，中国主子不像那时受制于中国政府的英国主子那样，是握有自主权的。有见及此，当前的中国主子比起过去的英国主子就实在可恶得多。

中国主子为了让国际社会误以为香港在九七后就可以普选香港的最高领导人，于是搞了个 800 人的选举委员会，把全港的亲共中坚和商界大款一网打尽。这 800 人中的七成乃由为数仅约占香港人口百分之四的功能组别选民推举出来。功能组别选举的创始人就是以法西斯统治遗臭万年的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这种选举制度可确保当选人立场保守，易于操控。但港京当局依然不放心，因此投票方法采用极受争议的「全额连记法」(Block Vote)。全额连记法在健全民主选举中早已扬弃，在中国则自清朝开始使用，目前中共的地方人大「选举」也采用「全额连记法」。这一切绞尽脑汁的精密安排，都是为了确保获推举出来的选委具备持久而稳定的可驯服性和可利用性，为中国主子所「钦点」的人选盖个橡皮图章。所以，整个活动的最大特色是，「选举」的结果必于「选举」之前就已铁定，并且党会事先以高调昭示于香港民众，不容有半点误读、妄想，所谓「选举」只是一个事后补充的例行公事。所以这不是选举，只是选择，而且是党的选择。但为了让这「党的选择」看似民主国家的选举，港京当局费尽心思临摹民主国家的选举做法，譬如成立选举办公室、招聘选举职员，聘用公关公司，搞选举筹款，有助选团，还要「落区拉票」、「洗楼」、派传军、搞选举辩论等等，总之是装模作样，另有帮闲者负责打边鼓，搞民意调查，以民意基础为文饰。

造假的也不仅是中国主子，由于香港华人跟中国主子毕竟是出于同一造假文化，香港传媒 (特别是中文的)也合力造假。几乎所有传媒工作者都众口一词的说「特首选举」，而不是「假选举」，或没有至少给特首选举的「选举」两字加个括号。反观，英语传媒人就诚实得多，如韦安仕 (Stephen Vines)一再直指这是场假选举(phoney election)，《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也指这是「由北京策划的假选举」(a phoneyelection campaign orchestrated by Beijing)，《国际先驱论坛报》的 Donald Greenlees 说：这是「被操纵的选举」(rigged election)，《金融时报》的米切尔 Tom Mitchell、《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每用委任(appointment)和再委任(reappointment)等字眼，而当中至为经典的大概是年前《华盛顿邮报》用的「争取再获委任」(campaign for reappoint-ment)！

再等而下之者，中文评论中甚至有人这样拈须摘发、呕心沥血的找到了歌颂这个假选举的理由：「对于两人尝试用普选方式，去处理原本的一个小圈子选举，这种做法和努力，基本上我是肯定的......」(蔡子强，〈打一场精彩的选战〉， 2 月

2 日香港《明报》)每读到这样的中式文人评论，就无法不想起林语堂的〈做人与作文〉：

『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颜之推《家训》中说过：「但成学士，亦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文做不好有甚么要紧？人却不可不做好。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单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但是有人性好文学，总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 .....。

陪跑人选难求

为了令剧情逼真，当局有时也会要人陪跑。但找人陪跑并不容易，而且看来是越来越难，主要是因为陪跑者一般都要有相当名望，否则戏就会做得太假，或有失被钦点者的身份。但已有相当名望的人自然就没有多大兴趣出来纯作陪衬自我丑化，来映衬出真命天子的超世之才。所以，当局在完事后都要给这些愿意陪跑的社会贤达重重打赏，当是肉金也好，片酬也好，但由于这些社会贤达本身已是有钱人，要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猴子戏，有时还要表现得很激动，甚至要挤出几滴眼泪来，令观众更加投入，这确是一件苦差，所以打赏必须很大，求名的起码要颁发大紫荆勋章之类，求利的要赐予无敌商机。除此之外，陪跑者还要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惊人的忍笑能力，要是一想到陪跑之无聊荒诞就哈哈大笑得像滚地葫芦，则钦点工程危矣。

当局虽然有时会要人陪跑，但也有机制阻止有人擅自陪跑，特别是搅局。当局因而制订了极高的陪跑要求(即所谓提名程序)。参加陪跑者必须取得一百个选委的提名，方可成为特首候选人或陪跑人。也就是说，陪跑人最多不可能多于七个，而任何人 (此人当然只可能是中共钦点的)若取得七百零一个提名也确保可自动「当选」，藉此以提名取代假选举，以确保绝对无人可以搅局。而为了确保不会有选委暗中恶搞，提名不受北京欢迎的人陪跑，令北京尴尬，所有提名必须记名！记名提名除了让北京确保谁人可以成为候选人，也让众选委有多一个跟北京及未来特首求爱的渠道。

这次中共「放生」梁家杰，让他取得足够提名成为陪跑人，主因是梁家杰不但完全没有能力威胁曾荫权，而且最为难得的是，他是来自民主派的陪跑人，加上可

能真的是不请自来的，这对提高曾荫权的认受性就更具说服力。基于人有天真无邪的自由，我不敢如某些人那样，说梁家杰明知毫无胜出希望都参选，是中共的卧底，纯为曾荫权抬轿而来。但我敢肯定，完事后北京不但不会亏待梁家杰，甚至可能会异常礼待，令梁家杰感动得泪盈于睫，特别是在陪跑人日益短缺的情况下，要让民主派今后更加踊跃参加这个逢「选」必输的「特首选举」，以加强香港特首的认受性。难怪黄毓民质疑陪跑者那样热情，到底是「精神错乱」，还是「精心计算」？

即使普选北京也胜券在握

由于劣质文化、长期洗脑等许多原因，中国人是精于自我作贱、披金拣沙的民族。你若放手让他们自己作主，按理他们是会弃民主而取独裁，或者是弃小独裁的而取大独裁的。前港督杨慕琦 (MarkAitchison Young，1886-1974)在二次大战后想给香港人民主，在当时英国工党政府的民主作风下，事事垂询香港人，果然被华人所拒而失败，而保守党政府下的彭定康以强硬手腕向香港人推行民主则得以成功。满清初年一再要求汉人妇女放脚，但由于措施温和，最后就不了了之，到民国初年政府以高压强制女要放脚，男要剪辫，中国人才万分不愿意的就范。你若一脉绅士风范作民主谘询，问中国人要不要民主，他们不会感兴趣的，他们最爱反问「民主可以当饭吃吗？」滞留在口腔期的中国人对吃是最关心的了，可怜他们并不了解没有民主跟他们的吃饭问题或大饥荒是大有关系的。若把好东西交由中国人自己选择，肯定花一百年都没有结果。好的东西是否一定要用民主手法由大家来开会决定才推行？特别是当你看到中国人或伊斯兰世界沉醉于自己的史前式生活形态时，或许也会有所动摇。北欧的基督信仰就是由他们的皇帝在 1000 年前以高压手段强制民众皈依的，他们才也不得不从海盗做起绅士来，即使穷，也要做好人。回教国家突尼西亚的妇女权利成为回教诸国之首，就是因为在法国受教育、仰慕西方价值的首任总统布尔古巴 (Habib Bourguiba，1903-2000)以高压手段，废除当地的一夫多妻制、把离婚合法化和把妇女的最低结婚年龄提升至 17 岁等等。

一个逐臭民族也许并不容易享用民主机制的好处。现为香港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出身是喝港英奶水长大的港英鹰犬，但临近九七却突然爱国，一变而为爱国急先锋，全力压制民主人权发展，作风标悍，虽被斥为「香港江青」亦不以为耻，诚属寡廉鲜耻之楷模。此物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必受唾弃，或要遁迹山林；但在香港，居然可以越爬越高，成为立法会主席有年，而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此物居然

确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意调查显示，其民望长期一枝独秀，稳踞第一，不容置疑。而在香港这无耻当道(**survival of the meanest**) 的现象也并非孤立偶然，因为在头十名最受欢迎的直选议员中也起码就有一半属于这一类以反民主为终身职志的无耻政客。不过，这现象也并非始于今天，鲁迅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这样骂中国人：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见《华盖集．通讯》 **1926** 年〉

所以，北京若真的马上在香港推行普选，按理是胜券在握的，但还是不放心，要劳师动众搞假选举大秀。即使一些已开化的香港人对民主派有好感，也会由于持有物业、股票，或一大盘生意，怕香港因中共发癫而动荡，怕中国主子和港京走卒公报私仇，而宁得罪君子，特别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十年浩劫死去活来之后，香港人更加洁身自爱，更加爱惜原来也并非必然的奴才待遇。

〈原载于 **2007** 年 **3** 月《开放杂志》〉

香港人为何如此不理解台湾？

◎ 钟祖康

我知道许多曾跟香港人打过交道的台湾人都对香港人没有好感，一些台湾大专生曾对我说，他们觉得在亚洲，香港人之跋扈是仅次于新加坡。我是香港人，对这我完全同意。特别在对待台湾的态度上，香港人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无知、狂妄、狭隘、趋炎附势和是非不分的德性。

我决无意挑剔香港。有人说，挑剔自己身处的制度、夸张邻家的美好是任何知识分子的习性。但我并没有因而看不到，台湾在廉政、法治和交通等方面显然不如香港。

台湾有两件事，一直为许多香港人嘲笑并谴责的对象。一是立法院中的立法委员的肢体动作；二是台湾的台独风潮。

香港人一来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政治上未获启蒙，对「乱象」仍抱有一种病态式的厌恶，也对「大一统」有一种病态式的追求。香港人对「公义」、「抗争」、「自决」等文明人起码有的理念，至今还冷漠得令人吃惊。香港人虽然也不会对中共有甚么好感，但一谈到台湾政坛上的肢体动作与台独风潮，便跟中共情意缠绵，互诉心曲。更加有趣的是，这里许多对台湾立法院中委员打架深恶痛绝，认为是丢尽中国人脸的人，却对中共对民众的奴役甚至屠杀显得相当谅解，甚或拥护！这等现象，即使是这里一些以人民喉舌、民主斗士自居的所谓名嘴也不能身免！他们甚至以遏止台独风潮为由，反对台湾人行使最基本的政治人权，直选总统！是的，要让他们明白「国家可为民众幸福而设，也可为民众的幸福而分」这个至明之理，就简直像要中共善待其人民一样的艰难。

香港人不但昧于许多台湾人已经奋力去实践的文明人的理念，而且对台湾几百年来的殖民统治、省籍情结甚至国际孤立等等也大都相当无知，他们只会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想搞独立，立法院常常有人打架。然而，一般香港人还是很喜欢以这样贫乏、片面的台湾资料，俨然以中华帝国或中共统战部代言人一样，指点台湾政治。

在当前中共计划在台湾北部一带进行导弹试射一事上，一般香港人的态度也教人相当难受。他们的反应，大抵可归结为：幸灾乐祸，台湾人自食其果，中共无可

厚非、美国人惹是生非。他们大都抱着等看「老父教子」的看热闹心态，有的更甚至附和中共的所谓「宁愿在废墟中重建台湾」的论调。彷佛香港人真的是坐在安乐椅上，弹着烟灰，慢不经心地给正受到北京夺命威吓的台湾人发出判词。这种种「教训」台湾的信息，从这里的电台烽烟节目，到一般报章，简直是铺天盖地而来。

的确，这个世界是够荒谬的。台湾这个作为全球发展得可算是最均衡、健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没有严重偏废的华人社区，竟然要受到这样粗暴和尖刻的对待，特别是受到华人自己的苛待。我们是否需要反省？香港人是否需要反省？中国人是否需要反省？台湾按计划到九六年便会出现首位由普选产生的民选总统，这无论对华人社会发展，中国人政治发展，台湾人的政治抗争或全球民主政治发展来说，都是了不起的大事，是几许台湾人、中国人或华人多少年来的梦。又或者，只要你走在台北的街头，污浊的空气也无阻你看到那种发展的生机、民众的修养、亲切和文化事业的旺盛，这些在华人的社区中已经绝无仅有了。台北一位出了许多优质严肃书，赔了不少本的书店老板对我说：「不要老是谈甚么爱国不爱国，我们只要多出好书给民众看，提高他们的素质就是了。」据我观察，现在许多台湾人便抱有这种既理想又务实的精神。面对这样一个堪称是华人社区发展中的模范的城市，我们有资格「教训」它，忍心「在废墟中重建」它吗？

而且，更加荒谬的是，现在最想教训台湾的不是别人，而且摆明是残暴着称于世的「中共政权」，无论怎样，这也是难以服众的。否则，这世界岂不变成善良向恶霸学习，先进向落后取经？这还不算，荒谬之颠是，这种恶霸欺压善良，邪恶打压公义的现象，竟然得到许多人 -----特别是包括香港人的华人或中国人-----的默许，甚至叫好！这就实在太恐怖了。为什么我们对于纳粹政权、波尔布特政权或北韩政权那样不齿，却对杀人和政治犯更多的中共政权那么宽容呢？

台湾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说：「台湾有一流的人才，应该得到一流的对待」是一句振聋发聩也含有无限苦涩的怨愤之词。其实，人本身就应得到作为人的对待！

善良的要龟缩，邪恶的四处招摇，无知的废话连篇，狂妄的赢得支持，久居这个荒谬世界，台湾人会疯狂，我这个香港人也会疯狂。

〈原载于 1995 年 7 月 26 日《中国时报》〉

中国式霸权主义下的西藏

◎ 钟祖康

只要在有新闻信息自由的地方，只要在自我思想阉割还不太流行的地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国以来怎样残害西藏的信息之多，实在已浩如烟海，不胜披阅。在此仅略举其荦荦大者：

-----1949 年武力侵占西藏；
-----1959 年全面控制西藏，迫使达赖喇嘛流亡；
-----50 年来屠杀过百万起码占六分之一的藏人人口，另外监禁过百万争取自由的藏人； (注 1)
-----50 年来遣派近千万汉人移民西藏，使藏人沦为当地的少数民族；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力摧毁西藏宗教文化，境内两千七百多座寺庙文革后只剩下 8 座，而且都是残缺不全；(注 2)

-----50 年来对西藏宗教领袖肆意羞辱；
-----以侵略者兼无神论的身份，操控达赖及班禅转世的人选，并自 1995 年起长期绑架并禁锢当年只有六岁的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 (Gedhun Choekyi Nyima ，1989-)，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年幼的政治犯。

同样的恶行，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必会引起全球哄动及继之而来的声讨与制裁、禁运、鄙视和唾弃，而公然破坏宗教圣物、羞辱宗教领袖和绑架宗教领袖，更极有可能会引发大战或永无休止的攻击。情况有多严重，只要设想一下罗马教宗被人游街示众、或被绑架并进而像王维林一样的从人间蒸发，就可看到中国无法无天到一个怎样的地步。

所以，引人深思的问题就是，为甚么中国尽管对西藏恶行滔天，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相应的制裁和唾弃，甚至连不少有深厚自由人权传统的国家从政府到一般平民都似乎不把中国蹂躏西藏当作一回事，对于中国绑架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的兴趣，往往还比不上对一个寻常小孩失踪案件的关注。尽管中国的恶行在西方也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甚至是一些学者、一些新闻媒体甚至是好莱坞电影的声讨，但整体而言，这些反对声音跟中国的恶行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小。而在香港、澳门等华人地方，更看来是一面倒拥护中国对西藏的所作所为。

类似情况也不仅西藏独然。譬如，像中国这样极权的国家从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手上收回香港，在国际间看来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而更加令人触目的是，尽管台湾已经是讲究自由人权的民主国家了，而中国依然以残暴极权着称于世，但国际社会对于独裁中国长期打压民主台湾，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即使顽强如回教徒，中国历任统治者即使对之横加杀戮甚至肆意侮辱其宗教，中国的回教徒也无可奈何，也未能像其他地方声称被迫害的回教徒那样受到国际同情。所以，不能不说中国对其霸权之运用，确有非其他超级大国所能及之处。国际对中国霸权相对姑息，到底是否只是现实政治的作用，还是有其他。

一些为人忽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以其宣传机器，（注 3）把中国「改造」前的西藏描绘成鬼哭神号的人间地狱，力图让人相信悲惨的西藏农奴通过中国的「解放」而获得新生。这也令人想起中国曾长期宣传，「台湾同胞」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但蒋虽专制，总没有中国大陆统治那样的荒唐。同样，中国也曾把大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描绘为人间地狱，但香港事实上却成为中国难民的天堂。至于中国政府或许多中国人所痛讽的租界，也原来是推动中国进步思想包括中国革命和庇护革命人士的自由堡垒，而日治台湾的成绩则连中国爱国者梁启超也由衷赞叹，（注 4）甚至连葡萄牙治下的澳门也比中国统治优胜得多。的确，从来只听过外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中国文化所无法孕育的文明，却罕有听过中国通过殖民统治提升被殖民国的文明。唯其如是，中国却会以高度封闭的价值观和绝不高明的管治高度介入被殖民国的文化构建。诚如藏族学者次仁释迦（Tsering Shakya，1959-）指出，中国与其他西方殖民者不同的是，西方殖民者没有企图推翻被殖民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但中共却明显有此企图。（注 5）由此可见，即使同是殖民统治，看来也有良性与恶性之分。有鉴于此，中国对旧西藏社会的指控会否突然乖离其一贯弄虚作假的模式？中国又是否居然可以找到一个管治能力（甚至可能包括道德水平）比中国更低，需要中国「解放」的国家？鉴于中国人也把自己的地方管治得一塌糊涂，这都是极大疑问。而即使过去的西藏真的如中国声称的是人间地狱，但鉴于中共本身正正是侵犯人权，而屡错不改的累犯，而且又是无神论的信徒，所以西藏即使需要改善人权，中共也难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虽然中国从发源自黄河流域的一个小国扩张成吞噬了整个大陆的巨灵，过程中消灭或霸占了无数国家，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认为这是扩张，更加不会认为这是殖民。中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立于天下之中央，统摄四方，文

化无比优越，因此只会说这是 「通」、是「征」、「剿」、「讨」、「伐」、「文化泽被」、「声威」、「德泽」、「恩泽」、「威震」、「声教」、「圣化」、「绥」、「绥靖」、「羁縻」、「荡平」，甚至是当扫垃圾一样的 「罗通扫北」，还有一大堆如「安」、「宁」、「怀」、「抚」等视别国如雏鸡的催眠用语。 (注 6)中国人的政治或军事修辞本事，或可用乾隆皇帝 「十全武功」的笔法为样板：「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髍，弗屑数也。」 (注 7)这种霸权修辞学到中共手里再推向另一高峰，中共除了时而把侵占称为「统一」，并把侵略得来的异国一概称为 「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领土」、或 「不可分割的的中国领土」之类，而不论这掠夺发生的时间有多新近，也从不论证这些新来的领土何以就是万世不易的「不可分割」，更加不论中国是否有能力把这些殖民地管理得好。

在这种文化习染底下以及其他因素的交织下，中国人对其殖民行径缺乏了西方人当中常见的反思和忏悔，从而令中国人上下由学者到文盲，从贫到富一律成为大中国政策的推销人，哪怕是深受中国迫害的中国人，包括已经身在自由邦可畅所欲言的中国异见份子，在所谓「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也多会坚定拥护中国官方立场。这种整体中国人看来发自真心的齐一表现，比起中国外交部的发言稿就有说服力得多，足以迷惑不少外人。 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却对列强对中国领土蚕食和殖民统治极端敏感，捶胸顿足，缠着昔日的殖民主子不放，表现得中国才是天下间最悲惨的殖民统治受害人，至于外国对中国殖民统治的批评，中国则一律以「不得干预中国内政」为由概不受理，更无数次宣布中国「永不称霸」! (注 8)正如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l900-1989)说，中国从最初面对洋人时的目中无人，到后来一变而为一个被列强欺负下哭哭啼啼的被动民族，很容易令人就忘记了中国从来都是充满扩张侵略精神的民族，只是受制于其他更强大的扩张主义者，而暂时不得不伏低做小而已。 (注 9)然而，中国也没有因为被中国统治者害死的人数远超过列强侵华所杀害人数总和，也没有因为中国纂改历史远比侵华列强纂改历史严重而减弱此等哭闹。中国人面对外界指控其殖民扩张 (或其他类似国耻)时所作的激烈反击和自辩，是全球其他殖民者所没有的；同样触目的是，中国对任何人援助或哪怕只是声援被中国欺凌者之万般阻挠与要挟，也是殖民世界中所罕见。

中国这方面的双重标准极其露骨。譬如，虽然从来也没有听周中国人或中国政府忏悔说「新疆」 (意即新掠夺的疆界)这地名是殖民扩张的印记，但中国政府

却一直对英国政府在香港起用 「新界」(NewTerritories 意思也是新掠夺的疆界)这地名非常反感。尤有进者，中国还在无数文献中宣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他们从来也不觉得「自古以来」与「新掠夺的疆界」之间有何逻辑矛盾。(注 10) 美国维吾尔美国人协会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人权项目部主任迈尔斯 (KevinMiles) 就说「维吾尔人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新疆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清朝政府从 1760 年开始武力镇压.....满清政府与汉人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将维吾尔称为新疆 (「New Frontier」)，这是极具污辱性的。」

(注 11)不过，中国长年累月的诉说过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持之以恒，总会博得不少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尽管中国本身从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中在文明提升方面蒙益非浅，而毛泽东也承认日军侵华是中共夺权上台的必要助力。 (注 12) 中国极其高效的政治消音技术，看来也是中国霸权较易为外界姑息的原因之一。就如文革虽已发生了 40 年，但西藏作家唯色近年出版的《 杀劫：四十年的记忆禁区，镜头下的西藏文革 》里面的许多关于中国摧残西藏文化和侮辱西藏人的照片，相信还是绝大多数读者所见所未见的。中国严密封锁西藏的信息，也进一步有力旁证了中国对西藏确是做了些不可告人的事。再比较一下南非的曼德拉 (1918-)、缅甸的翁山苏姬 (1945-)、东帝汶的古斯茂 (Xanana Gusmao，1946-)、捷克的哈维尔(1936-)和中国的魏京生(1950-)五人于被囚禁或软禁时之对外通讯能力和于国内被报导之多寡，就知政治消音技术山外有山。而西藏在其文化地理上的条件，如谭若思 (Ross Terrill，1938-)；所说，也没有新疆甚至蒙古拥有「同类文化外援」的优势，(注 13)因而更容易在孤立的处境下遭受中国欺凌。由此可见，中国与其他独裁者或殖民者另一大不同之处是，中国统治者一般会以惊人的资源用于控制信息，令异见人士在国内所受的囚禁与酷刑完全起不到激励被奴役同胞的作用，让异见人士白受非人折磨，从而令中国摧残异己的代价减至极低。不但代价极低，中国更不时通过交出受其折磨的政治犯，以赚取改善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的报酬。过去，中国利用了一些成长于人道温室、入世未深、充满理想主义并欲为其祖先侵略中国而赎罪的外国人，为中国的滔天恶行涂脂抹粉。今天，中国已不需要再讲革命和理想主义了，它已成功把十亿奴工转化为「为全球服务」的摇钱树，再以由此建立起来的经济力量，以利诱、以恫吓、以公关，迫使国际社会屈从于中国尚待启蒙的价值观，以商围政。在这大气候底下，西藏人的苦难，还是不见尽头的。(注 14)至于有人相信中国经济改革或 2008 年的奥运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化水平，从而也会有助改善西藏的人权发展，对此，我比较悲观。从中东、非洲到亚洲不少经济颇发达却依

然停留在独裁统治的国家可见，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财富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开放 (见表 1)。像新加坡即使经济如此发达，经济体系如此自由，但其统治也同时可以独裁到这个地步，以致被指为奉行把人民当猪猡来养的「养猪哲学」。这种 「新加坡模式」大抵就是中国统治者的梦想和能够想象得到的最高管治境界 (注 15)，而这看来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崛起可以改善西藏人权的极限。

〈本文是「2007 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数据源*CIA World Factbook
见 https://www． 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2007 Index Of Democracy
见 www.economist.com/media/pdf/DEMOCRACY_INDEX_2007_v3.pdf

(注 1)有关数字见
Dalai Lama XIV 着 Freedom in Exile :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美国 :HarperOne，1991 年)，页 249；并见 〈西藏和平五点方案〉 (达赖喇嘛办公室)
http://chinese.dalailama.com/page.26.htm 。
(注 2)这是根据西藏作家唯色在其著作《杀劫 :四十年的记忆禁区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中的数据 ，但过去有关资料一般认为 ，西藏到 1959 年尚有 6250 座寺庙，在中共摧毁下，到 1976 年只余下 8 座。见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ro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Religion or Belief-----Report submitted by Mr. Abdelfattah Amor ，Special rapporteur，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3/25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United Nations 20 January ，1994 年)。
(注 3) 关于中国就西藏历史的宣传，可参考 John Powers 着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国：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年)。
(注 4)见梁启超着〈游台湾书牍〉 (初版于 1911 年)，收录于《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四集 (中国：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注 5) 见 Tsering Shakya 着 The Waterfall and Fragrant Fl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Literature Since1950 ，收录于 Song of the Snow Lion ：New Writing from Tibet (美

国：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 年)。(注 6)见潘光旦着〈检讨一下我们历史上大汉族主义〉 (初版于 1951 年)，收录于《潘光旦民俗研究文集》(中国：民俗出版社，1995 年)。(注 7)见《清高宗御制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三集卷八。(注 8)关于中国一方面虐杀被其殖民者，同时也不断向欺负中国者哭闹的现象，可见 Sarah C.M.Paine 着 Imperial Rivals：China，Russia，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美国： M.E.Sharpe， 1996 年)；并见 Lucian Pye
着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美国：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年)。(注 9)见 Owen Lattimore 着 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Pace，收录于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dPapers，1928-1958 (美国：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年)。(注 10)中国人对「自古以来」的理解颇为奇特，似乎是反映中国思维的逻辑性多于说明历史真相。譬如《人民日报》曾称：「地理上，在远古时代，台湾岛与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地壳的变动，与大陆连在一起的部分沉入海底，形成海峡.....也就是说，台湾岛本是祖国大陆的组成部分......。」(2000 年 4 月 10 日)。另外，在中国大陆已算是较开明的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教授曾这样演绎「自古以来」：「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对台湾我们应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 1683 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收录于《长水粹编》(中国：河北教育出版杜，2002 年)。(注 11)见汤本着 (走向民主的 "五族共和")www.tangben.com/JINDUP-ING/04/wuzu.htm(注 12)关于毛泽东感谢日军侵华，协助中共夺权上台的历史，可见朱学勤着 (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 1995 年第 1 期；并见李志绥着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美国：Random House，1996 年)，页 567。(注 13)关于 Ross Terrill 就西藏、新疆和蒙古的综合讨论，见 Ross Terrill 着 The New Chinese Emprie (美国：Basic Books，2003 年)，页 229-252。(注 14)关于中共怎样威迫利诱外国公司协助中共侵犯人权，可见 Ethan Gutmann 着 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Desire and Betrayal (美国：Encounter Books，2005 年)。(注 15)譬如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 1978 年

访问新加坡后，曾几度呼吁中国大陆要向新加坡学习。

一个「私人重地闲人可进」的地方

◎ 钟祖康

挪威社会以平等精神独步天下，共产精神，无名有实，但这种共产精神同时揉合深厚的理性成份，我且铸新词，称之为「理性共产主义」，或「理性社会主义」亦可。

倾力打击烟酒消费

自问平时热爱搜奇猎异，但逐步深入这个获联合国推为人间第一乐土的挪威社会后，对当中许多制度仍然感到震惊。譬如星期天，还有所有假期，全国的商店〈食肆除外〉禁售包括啤酒的所有酒精类饮品，逢星期天及其他所有假期的前一天则只可以销售至下午三时。即使是平日，超级市场等地也只可以售卖啤酒，而且也须在下午六时前买，其他低酒精啤酒以外较烈的酒精饮品一律要到国营的酒类专卖店购买，而酒类专卖店的分店数目也不是那么多，营业时间也短：朝十晚五、周六半天，周日全休。但食肆深夜十二时后也不得售卖烈酒，凌晨一时后不得售卖啤酒和普通酒。在所有政治选举日，更全国禁售酒精饮品。

法律甚至禁止民众当街喝酒，违者罚款一千到三千挪威币不等。

挪威政府不但严格限制喝酒，对酒精饮品课以重税，更专卖酒类饮品，为甚么当局对喝酒管得那么严呢？原因是正如任何冰天雪地的人几乎都爱喝酒那样，过去维京人也有嗜酒的毛病，即使今天挪威特别在北纬七、八十度的地方，半年以上的日子天昏地暗，患抑郁症者甚众，这类人依然很容易酗酒。所以近代挪威人对酒精相当警惕，不像他们的恶邻兼酒鬼俄罗斯人那样，他们确能做到今是昨非，坐言起行，用不着在公众地方高悬一个口号牌匾，似乎他们才是孔夫子说的『呐于言而敏于行』。今天挪威人平均每人每年喝啤酒约 **50** 公升，其他酒类约 **14** 公升，以纯酒精计为约 **4** 公升，这酒精消耗量不仅低冠全欧，在国际间也属甚低，在极度富裕国家更属奇闻。单从这一点，就可见挪威人的理性反思精神与行动力绝不简单。加上七十年代后挪威逐步富裕后开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挪威地势狭长，开车穿州过省动辄数以小时计，酒后驾驶越来越成问题。为此，挪威政府已积极研究斥巨资从瑞典引进昂贵的酒精锁，如无意外，数年后所有新车就要装上这个一旦侦测到司机喝酒过量即令车辆无法启动的装置。在此之前，当局已通过另一重要交通安全措施，就是在今年年底前所有 **3.5** 吨的重型车辆要装速

度锁，以确保车辆时速不得超过 90 或 100 公里。不过，挪威地大人少，公路上很艰难才会碰到一个警察，民众若不自律，醉酒驾驶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在这方面，这里的人就像绵羊一样的驯服。由于绝大部份人都是自己开车的，一般社交吃饭场合都罕会有人喝酒或啤酒，假如喝了，就会把自己的车子留下，自行坐收费昂贵的计程车离去。

当局除了严控酒精之外，为减少烟草对民众健康的祸害，对烟草征收惊人税款，一包普通香烟在挪威卖挪威币 80 元〈若按 2007 年汇率算，约等于 15 美元)。烟民数目已逐年下降，在 16 至 74 岁的人口中，现在只有两成四吸烟。自本年六月一日起的食肆禁烟令，也在大多数人支持下顺利落实。许多烟徒说这会加强他们戒烟的决心，也表欢迎。

私人重地闲人可进

挪威人虽然奉行私有产权制，但为了贯彻其理性及平等的精神，做出了一些随时令香港的自由派经济信徒大惊失色的举动。譬如，为了自然环境的保育，许多挪威人除正宅之外拥有的每每可以媲美香港半山独立豪宅的郊野别墅，每年最多只可以住人半年，其余半年必须闲置。在这半年之中，有些地区更规定不得连续居住三个月以上。

另一个更可能令张五常之类私有产权尖兵大呼「私有产权已死」的措施是，为了让国民得以共享全国的文化及自然遗产，挪威于 1957 年起正式就「公众涉足权」(allemannsret-ten)立法，容许民众有权进入任何私人拥有而未经开垦的地方。在挪威，除了住宅、花园、草坪、耕地、农场这些开垦地以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属未经开垦地，而在冬天雪封的耕地也属未经开垦地。民众除了可以进入私人拥有的未经开垦地，还可以在该处采摘野果、休息、扎营过夜等。所以在挪威许多标明是私家路的地方即使有门，都是打开或可以推开的，平民与狗，均可内进，但狗只须在四月到八月这段多人四出活动的日子系上狗带。许多未经开垦地上面都围上篱笆来牧羊，物主就会在篱笆上面架一把木梯，让所有路过的人跨过去，常见于中国人社会的过路权争端在这里没有听过。进入私人未经开垦地的人也要遵守若干规则，包括不得毁坏树木、土地等自然资源，或任何建筑物、篱笆等等。

就像郊野别墅不得住过半年这样法例那样，这条「公众涉足权」的法例其实不易执行，且不说「私有产权」方面的问题，挪威地广人稀，郊野别墅居民或者尚有零星邻居可稍起监察之效，但全国无边的私人荒地有没有被外来过客所滥用，却是万难监察。唯这两条法例实行至今，民众普遍遵守，自然环境益受保护，每一个国民不论贫富均可登山涉岭漫游全国，挪威人无不称善，罕见纷争。大抵，这样的法例只能适用于有深厚公德精神的高度文明人类，法例只能以制度指出一个方向，能否落实还得靠全民自发自省。

当局为了确保挪威稀少的耕地得到善用，维持挪威的农业，和防止有人兼并农地、坐拥闲田，农地地主不得闲置农地，必须将之用于农耕、畜牧之类农业生产。许多已经不再耕作而依然持有田产的人，往往会让荒田长草作牛羊饲料用。农民若把农居农田放租，所得租金也如其他物业租金那样缴交约百分之三十的租金收入税。如此规定加上「公众涉足权」之类措施，「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在挪威是无法想象的。

个人财务完全公开

可见，挪威人力图平衡私有产权和平等精神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独特措施，令他们的私产状况愈见透明。那就是每一个挪威人的收入、财产和缴纳税款都可任由公众查阅。当然，当中有人或作个别财务安排以掩饰真相，但由于当地人一般不觉得公开私产或纳税状况有何不妥，所以一般也不会太刻意掩饰，有关资料颇为可信。税务当局对每个人的银行户口全面监控，以确保所有收入均有缴税，而纳税人也可申报个人的负债，以获取税务上的扣减。

从以上挪威社会的几个事例及我前此介绍挪威社会的平等作风可见，挪威社会确是相当独特的，并能戛戛然独造境界，这令我不得不深刻反思甚至调校我过去对世界发展的认知。他们沉醉于自家的文化、价值和自然世界，旁若无人，为了人人应该平等的信念、为了实践摆脱人类弱点和失败经验的理性精神，理直气壮，一往直前。这里从没有人偷鸡摸狗的说搞的是「有挪威特色的资本主义」或「有挪威特色的共产主义」，或像「亚洲价值观」喽罗那样大吹特吹甚么「北欧价值观」、「挪威价值观」。他们谦逊、低调得几乎令人费解。他们绝不热切推销一己成功经验，整个社会依然故我的以挪威语运作，外人不易窥其堂奥。他们以行动而不是言词服众。他们的宽容，令这个以路德宗为国教的国家居然成为其文化死敌回教徒的避难胜地，个个乐不思蜀，以致回教成为挪威国教以外第二大教，每

年还得到挪威政府慷慨资助。

〈原载于 **2004** 年 **8** 月《开放杂志》〉

从中国文化看市场垄断

◎ 钟祖康

「外间的人说香港的经济自由甚至把香港排名第一，是浅见。」

——张五常〈何谓自由经济 -----与黎智英商榷〉

《经济学人》杂志曾称香港为垄断之邦〈 Land of monop-oly) ，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港府垄断政治权力和全港土地、两家超级市场垄断 7 成市场、香港电讯垄断固网电话、香港煤气垄断全港煤气，几家电台垄断了原本可予取予求的电台频道、香港电灯垄断港岛电力、中华电力垄断其余地区的电力、轻铁垄断屯门到元朗的集体运输、五丰行垄断大陆猪肉、课本出版商联手定价、汽油公司联手定价、报章联手定价、大集团操纵本地供应商以决定新进竞争者之生死等等等等。

对于香港政府垄断政治权力，一般香港人多是逆来顺受；至于香港巨富对社会资源也就是对财富的垄断，已经令香港的坚尼系数高达 0.53，这是全球发达地方最高者，如此严重的贫富悬殊，只会在第三世界出现。这是为甚么香港的世界级巨富多得完全不成比例，以至于所谓 18 万 4 千港元的人均年收入对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其实毫无意义，但有趣的是，许多香港人，甚至是身受其害的穷人，不但对之逆来顺受，甚至为香港出了那么多世界级富豪感到自豪！这是很胡闹的悲剧。为甚么会这样呢？为甚么似乎中国人不太将垄断当作一回事呢？正如那些外国人不止一次问我，为甚么香港人不反抗呢？

土地垄断自古而然

这个问题的成因可以说得很复杂，你可以概括说是「久跪难起」，而笔者认为，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中国两千年来本来就是个垄断大国。从垄断政治权力始，还有垄断土地，垄断知识、垄断妇女 .....中国人对于垄断之熟悉，几已视之若人间定律。其实，相对于传统中国和中国大陆而言，香港的垄断已算是有所收敛了。

中国自秦废井田制度，容许私有土地以来，土地兼并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资治通监》卷 33〉。到西汉，「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

王侯 .....」〈《前汉纪》卷八〉

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之败亡，都多少与土豪疯狂兼并土地有关。几乎每一个朝代，特别在推翻上一个朝代之后，都好说歹说要抑兼并，要限田，以赢民心。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为了根绝兼并，就下令土地国有化。中国两千年历史，就在限田、均田、兼并这样的循环下反复下沉，就好像皇朝的来去一样。

唐德宗于公元 780 年宣布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后，无形中承认民众可私有土地，北魏以来的均田制于是告终，兼并又再大盛，结果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至宋，又有「不抑兼并」的国策，此后土地兼并，浩浩荡荡，其势难挡。北宋思想家李观在其着名的《平土书》里说：「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他建议，「 .....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民既归而兼并不行，则土价必贱，土价贱则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无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则一心于农，一心于农则地力可尽矣。」 (《富国策第二》)

下至晚清，革命党人一样异常重视财富垄断和土地垄断的问题。谭嗣同说，「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过者裁抑之，不及扶腋之。」〈《谭嗣同全集．报唐才常书》〉孙中山除了首先反政治权力垄断，更加强调这种反财富、土地垄断的思想，他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列为其「三民主义」中「民生」的核心理论。

中国共产党将反垄断做得更加彻底，实行土地国有，一切资源国有，自以为已经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结果还是在中国垄断文化泥沼中打空拳，反而变成了中国历朝资源垄断最严重的皇朝，政治权力之垄断臻于空前，经济资源之垄断也可能绝后，中央政府，或者说全国不足两成的人口长期依法〈请留意是「依法」〉忽视甚而压榨起码占八成人口的农民，即约六分之一的全球人口！以图成就另一个「经济奇迹」，也同时为乔治．欧威尔的《动物农庄》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贴切的场景。

硕学鸿儒与文盲大国并存

传统中国不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被垄断，知识也被垄断。此所以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这一点社会学家费孝道说得很好：

『文献却不是大家可以得到的，文字也不是大家都认识的，　.....乡土社会是有语无文的。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层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载的对象都和民间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学习上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不常常用，很容易遗忘；文言文的句法和白话不同，会说话的人不一定就会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须另外学习，文字所载又多是官家的文书.....没有长期的闲暇，不必打算做读书人。闲暇在中国传统的匮乏经济中并不是大家可以享有的　.....因之.....生产者没有闲暇，有闲暇的不事生产，生产和闲暇互相排斥。』

〈《皇权与绅权．论知识阶级》〉

所以，在中国，无论任何朝代，总是有一小撮人饱读诗书、之乎者也、摇头晃脑、满腹经纶，也同时有更多人目不识丁；有人终生在搞航天科技，甚至说已日渐迫近洋人，几乎令中国人重拾一丝自信了，但无数衣不蔽体脚下无鞋的小孩连入学也成问题，仰赖「希望工程」；推而广之，即使已从「东亚病夫」跃为「奥运金牌大国」了，但人均体育设施仍为全球最低之一，也是肝炎大国，个个面有菜色，体力分布之悬殊，无以复加。

至于传统中国的男性商政巨富对妇女的垄断，也是人类少见。皇帝三宫六院、后宫三千，甚至要阉人性器来确保性独占；富者妻妾成群，奴婢盈室，贫者「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贫而无妻无嗣者所在多有。

中国思想被垄断一沉不起

归根结柢，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是社会资源分布两极化，决不是甚么「中庸之道」，抓不住这些要点，休想了解中国人于万一。所谓「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因此之故，蚁民一般忱于异想天开的「出路」，日夜赌博，又或穷极无聊，自我麻醉，如周作人所说：

『毒贩之死于厚利是容易明了的，至于再吸犯便很难懂　.....第一，中国人大约特别有一种麻醉享受性，即俗云嗜好。第二，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

堪， (俱)以麻醉消遣。』

〈周作人《关于命运》〉

但为甚么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竟然周而复始的陷于垄断不能自拔呢？为甚么中国人可以好像完全不理他人死活的病态兼并呢？受害人又为甚么逆来顺受呢？当中原因，道源祸始，我想还是离不开我提出过的理论，那就是中国的思想于两千年前起就被孔门儒家垄断了。西汉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于汉武帝见纳，自此中国思想界一沉不起，璀灿的先秦哲学成为绝响，自此中国人停止独立思考达两千年。中国思想被孔门儒家独家垄断后，不但埋葬了批判能力之源的逻辑学与自然科学，压制了道德勇气之源的正规宗教，最后走上集体打恭作揖、弄虚作假的极端形式主义，「儒学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德性论和功利论往往会走上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识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如此，你说有甚么荒唐事不可以发生，垄断横行，仅其一端而已。

〈原载于 2003 年 10 月第 3 期 The Frontier Review 〉

从奇技淫巧到科技兴国

◎ 钟祖康

中国本土的统治者，甚至普遍大陆民众，甚至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种已经绝种于文明社会的思维，就是发展经济或科技不需要同时发展政治或文化，又或者一旦发展政治，就要政治挂帅，经济让路，过犹不及。中国人这种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不需要配以政治、文化发展，只「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的思维，看来不止可以上溯至清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条，探本穷源，甚或可以从儒家的「君子不器」、「士先器识」、「先立其大」、「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德性至上论」找到痕迹。

九个政治局常委俱属工程师

中国人对「唯发展经济、科技论」的迷信，从当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教育背景中就表露无遗。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工程师；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毕业，工程师；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工程师；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工程师；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工程师；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工程师；罗干，东德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个国家整个最高领导层全由自然科学教育出身的人，甚至只是清一色的工程师出掌，征诸全球，即使包括其他共产国家在内，也是罕见的。究竟中国是否就是靠科技兴国，这个政治局的工程师团又是否就必有助于中国的科技发展？若从诸文明国家的发展足迹来看，中国的「唯发展经济、科技论」是否行得通，实在令人疑惑。

同样，许多香港人即使是到民主发达国家留学或住上好一段时间，仍会相信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在座制政治、文化发展的环境之下成功，甚至认为压制政治、文化发展是达致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必由之途。至于一些土豪劣绅胆敢反反复覆说甚么香港只是「经济城市」，不得搞政治活动之类的言论，而香港人没有像欧美人士那样奋而革命，也没有像台湾人那样将说话人掌嘴，足以说明，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死而不僵的。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称此事增强

国威、增强军威、振兴中华，无数中国人也认为这是科技兴国的一大体现。但所花的千亿元，足以令多少家学校无法兴建，多少学龄儿童无法就学，却看来从来不是他们会考虑的问题！日本以至国际间科学界早就普遍认为，监于人类在太空任务绝大部分已可由便宜得多的无人驾驶飞船和机械人代劳，送人上天多无必要，也不划算，而中国的太空计划正正是军事、政治图谋远大于商业和科学研究，日本身为中国最大援助国自然不能听之任之，遂于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后大幅削减两成来年对中国的援助，从原来的 11 亿美元减至 9 亿 1 千多万美元，并将省下的钱转拨作伊拉克的重建援助。

爱因斯坦：专门技能并不足够

中国从清朝视火车、轮船为奇技淫巧，到今天的工程师队治国，究竟是进步，还是病态发展？我看是后者居多。到底夷人值得中国人师法的是否就只有「船坚炮利」？到底夷人的「船坚炮利」是否在一个中国一样极度封闭和反智的社会中成就出来，是否可以移殖到中国这样没有思想、言论、宗教自由的地方复制？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向来不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重点，也没有 -----当然也不容许-----在中国本土好好的公开讨论过。科学巨人爱因斯坦 (1879-1955)一向深得中国官、民崇拜，不妨就听听他的看法。其实爱因斯坦，就如许多出色的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罗素、沙卡洛夫、奥本海默等那样，所关心的决不是只是科学的。要是有人以「科技兴国」去就教于爱因斯坦，想必将他气死。爱因斯坦多次强调，通才教育之重要，其中一次说得很清楚，并广为各界引用：

「单单授人一门专门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而没有和谐发展的人格。至为重要的是，学生要对不同价值观有所了解，和生动的体会。他必须对美对善恶感应灵敏。否则，他纵有专门知识，也不过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谐发展的人 .....所以我每每推崇人文科学之重要.....」

(原文：
It is not enough to teach man a specialty.Through it he may become a kind of useful machine but not a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ality.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 lively feeling forvalues.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Otherwise he-with his speciallzed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This is wh

at I have inmind when I recommend the "humanities" as important.....
见《纽约时报》1952 年 10 月 5 日报导 Einsteins stressescritical thinking.)

中国官、民大概在船坚炮利和科技兴国思维的支配下，也只会研读爱因斯坦的科学着作，不会对爱因斯坦关于反教育唯科技化、反独裁专制、反思想控制等大量掷地有声的非科技言论感到一丝兴趣。就如对于当前中共赖以维生的民族主义，爱因斯坦居然不屑一顾的说，「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婴儿病，就像人类总要出一次麻疹那样。」
(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sicknes.It is the measles of the human race.)
爱因斯坦若当面对中国人说这句话，中国人是会跟他搏命的。故曰，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就像对鲁迅或马克思的崇拜那样吧，叶公好龙而已。

其实，科学与技术，传统中国不是就已经睥睨全球吗？传统中国的工程师少吗？仰慕中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I900-1995)用了几十巨册也写不完，但就是无法解释为甚么中国会沦落至此。为甚么传统中国的工程师救不了中国呢？不就是因为没有自由，特别是资讯自由。于是甚么纸张、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等伟大发明都无不浪费净尽，最后只能成为其他自由地方文明起飞的动力。

「中庸之道」痴人说梦

中国的发展，向来都是这样的从一个极端走去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顾此亦失彼、「一心不能二用」、不是「勤」得灭绝人性，就是「戏」得毫无节制，故「勤」「戏」不能并存。从儒家经典上的温良恭俭让，到实际上的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疯狂兼并；从阉人成风之性毁灭到「后宫三千」之荒淫；从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的奴才，到肆无忌惮的乱民、红卫兵甚而皇帝；从无为而治到内乱连年；从全面保古到全面西化；从政治挂帅到经济挂帅；从视「走资派」为弥天大罪，到发展到先付款后救人的惊世杏林奇观；从奇技淫巧到科技兴国。中国民族之极端，恐怕在人类社会中是罕有对手的。不过，所谓极端，由于底子太差，也成不了有板有眼、稍见深度的极端，而只是形式上极端。归根结底，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形式主义挂帅，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国精神。这就是一个民族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后的惨状。

然而，中国却在所谓「中庸之道」的伪装下，一直被当作是客观持平的人类代表。这错得很惨，误人无数。须知中庸之道，就像无数中国古训那样，嘴上说说而已，

大家切勿当真，这是中国文化普遍将理想当作现实的现象。真相反而多半是，太多人太极端，才要鼓吹中庸；人太丑陋，才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地方太脏，才要年年嚷着要清洁香港。「中庸之道」即使有，也只是用于待人，不是律己。或如鲁迅说的那样：

『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则全败，则又「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处之泰然，但又无而不合于圣道。』

到底一个社会发展经济、科技是否就可以只管经济、科技，而完全不理甚至刻意糟蹋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价值、文化发展、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只要从「希望工程」教育基金被人中饱私囊、防洪大坝偷工减料、全国滥伐山林滥采天然资源成灾、膺品市场席卷全国、超标有毒食品货如轮转、城市过半儿童铅中毒智力发展受损、贫富悬殊拾级而上、數以十万计国家精英留学后拒绝回国等等，这些本身虽不一定直接与经济、科技有关，却由于政治问责制度、社会伦理道德、言论自由等等无不荡然，而得以应运而生，越演越烈，以致社会上的经济、科技根本难以健全发展，要不是虚应故事的敷衍，就是代价过高，而且多由弱势社群承担。到最近导致中国经济损失遇千亿的 **SARS** 温疫，追源祸始，还是离不开其封闭的政治制度。同理，中国今天的人口灾难、教育灾难，以致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举步维艰，罪魁祸首当然不是科技过低，而是独裁政治之故。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沈恩教授 **(Amatya Sen，1933-)**一大研究发现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只会发生在资讯不能自由流通的独裁国家譬如中国，原因是当饥荒发生时，传媒不许报导，延缓了外来援助(又或战无不胜的领导为了面子拒绝援助)，加上官员为求自保互相瞒骗，结果小饥荒变成大饥荒，终至局面一发难收。果然，从近年美国政府解封的政治密件就发现，中共为了面子，于 **1961** 初不顾千万同胞饿死，拒绝了美国的谷物援助。 **(**见 **CIA** 文件，编号 **00372/61)**总之，从中外经验可见，中国一天没有政治问责制度、没有起码的、会理会他人死活的社会伦理道德、没有监督各方胡天胡地的言论自由，就休想摆脱九贫一富的主奴式「经济繁荣」、摆脱文盲遍地而斥千亿送人上天的专断和虚荣、摆脱每年损耗几千亿元的旱涝灾害、摆脱最终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态破坏，和摆脱从一个挂帅荡向另一个挂帅的「挂帅主义」。

〈原载于 2003 年 12 月《开放杂志》〉

种族歧视的自侮根源

◎ 钟祖康

笔者一向没有中国人多罹患的排外恐外或妄想被洋人迫害症，始终相信种族歧视在今天的洋人社会，就如礼义廉耻在今天中国社会那样，决非主流。而且身在对异族极度宽容的挪威，再加上外游时往往和洋妻同行，对于日常生活的所谓种族歧视，体验极少。这次终于大开眼界。

我于去年底(2004年)11月16日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取道法兰克福回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坐汉莎的飞机。我于早上七点先乘 LH3163 班机从挪威 Stavanger 到法兰克福，航程仅两小时。这飞机很小，乘客最多一百人，可以一目了然。机上也只有两位女服务员，乘客看来大都是挪威人，而我则就目力所及是机上唯一的亚洲人。这两位看来都是德国人的女服务员在提供饮品时服务态度相当热情，譬如她们会很乐意的给干了杯的乘客再斟，又探问他们是否足够等等，她们两人在极狭隘的通道上，在我面前来来去去，在我前后右边的人都得到异常体贴的服务，但就只有我一个，没有获赐予任何饮品，就像《诗经》里面「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那样的巧妙。我看机上诸公都几已杯盘狼藉，再看看两服务员对我视而不见的态度变本加厉，就向当中态度较鄙夷的一位服务员扬声，她连我话都没有说完就很匆忙的以英语说，「转头就来」！

机舱人员拒绝脉务黄种人？

她们继续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很热情的服务其他所有人，继续对我视而不见，我越看越愤怒，见她们已开始收拾餐具了，实在是死火山也要爆发。我叫较接近我、态度较没有那么鄙夷的一位女服务员过来，以英语问：「拒绝服务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她们航空公司的政策？」我刻意很大声很清楚的问，务求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到，以制造群众压力，我问她知不知道她们这样做可以有很严重的后果。她一听我这样说脸色大变，随即几乎整个人就要扑通一声的在我面前跪下来，哀求我原谅她们，很快那位看来就态度较鄙夷的一位服务员很紧张的走过来，问我先前是不是去了厕所，我指着前后右三方的乘客说她们可以做证，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座位，而且还主动向她们示意过要饮品。我揶揄她们说，她们可以这样在我跟前兜兜转转几十次而置我于不顾，也是需要相当技巧的。她们见大势已去，而我还是表现得非常愤怒，声如丧钟。她们央求我接受她们道歉，并请我任点饮品，并拿来一瓶酒算是请罪，我看了反而更加生气，因为这简直就像拿波板糖逗小孩一样。

最后她们还是在废话连篇，不断央求，不肯离去，我只觉她们相当骚扰，就草草叫了一杯清水，并说这只是表示我想她们在我面前消失而已。

当时我感到最遗憾的是，事件不是发生在美国，和汉莎不是美国公司，否则我必定掉下一切公务私务，跟他们周旋到底，起码讨回几个亿的赔偿。

黄种人规避黑人

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候转机的八个小时里，一边在看鲁迅骂中国人的杂文，一边在不断反思先前在机上发生的事件。我想，平心而论，抚心自问，要是那两位服务员真的因为我是中国人，特别是因为她们真的多少知道中国人之丑陋与自侮历史而侮辱我，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实在是自侮于前，而她们又怎能知道我也许比她们对中国更反感呢？只是我对中国的反感会以较「文明」的手法表达出来。信言不美，她们没有装作喜欢我，也不尽是坏事。

在这次遭遇中我也想起了中国着名传播人现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的水均益投诉在成田机场被日本服务员不予理会的经验，水均益事后在其广受中国网民欢迎的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里依然怒气难消：「记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愤慨地说：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太可恨了！ .....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但我更加无法理解的，像他这样也受过相当教育的中国人，居然不能冷静下来想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从政治上，到日常生活层面上多年来做了多少令人讨厌至极的不文明行为，这正就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的必然道理。也许水均益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参与这些不文明行为〈对于一个在党喉舌传媒任高职的人，这当然更没有可能〉，但当绝大部份中国人都不文明的时候，谁会把你水均益跟其他中国人区分开来，就如汉莎航空公司的职员不会知道锺祖康跟其他绝大部份中国人不同那样。而且，水均益和无数支持他的中国人若真的那样在意被歧视，那么中国政府本身对中国人不仅是歧视人，简直就是奴役人，但何以从来没有听过水均为及其一伙对中国政府哼过一声呢？

当中国人的所作所为确实已充份符合了招人鄙夷也就是「人侮之」的条件，那是很难一面倒的严以责人的。要是那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傲慢是由于中国人集体不文明所致，我即使被无辜殃及，也是死而无怨的，但要是基于别的原因如肤色等

等，我就难以苟同了。

接着我以战战竞竞的心情再登上汉莎的 **LH0738** 到香港的班机，在我前面分别坐了三个人，左边是个白人，中间是个样子和口音都很像中国人的黄种人，右边是个很黑的黑人。很快我就发现中间那个黄种人很用力的将身子左倾，看来是很想避免和右边的黑人有肌肤之亲，但在非常狭隘的经济舱位，他这样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却非常刺眼。然后这个黄种人不断主动问在附近通道张望的其他乘客是否想调位，不明真相的旁人看了谁不赞叹这黄种人急公好义？其后他又向服务员作类似查问。我看在眼里感到非常愤怒，几乎要破口喝止了，但又多少被不要生事的中国基因叫住，而且再想事情闹大，可能会令这个黑人在其后十二个小时的航程中更难受。我想起了先前服务员对我的歧视，又望着眼前的歧视，有无语问苍天之慨。

中国人兽行须公诸于世

回到阔别一年多的香港，感到此地还是荒唐如昨。我探望了《开放杂志》同仁，才得知《开放杂志》于 **2003** 年 **7** 月以图片揭发了国内贩卖「广东婴儿汤」后，居然被香港特区政府控以刊登不雅刊物，并罪成罚款。这岂不是吃人肉无罪，卖人肉也无罪，唯独揭发个中勾当者有罪？用国际语言来说，就是希特勒杀人无罪，协助希特勒杀人的也无罪，刊登希特勒及其帮凶残杀生灵的骇人照片的则以「刊登不雅刊物」治罪！敢问：天理何存！〈这或又是一次的「中央操控」又一力证〉，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人对吃人肉越来越习以为常，谁敢保证中国的罐头商不会制造混有婴儿肉的餐肉，毕竟中国一年到头有数以千万个强迫堕胎的死婴，货源极其充沛，这是中国特有「国情」，外人很难知其底蕴。我的经验是，常人，尤以外国人，不看过这些照片，是罕会相信所谓「五千年文明大国」的子民真的会这样烹婴的。现在特区政府为了维护中共的面子，狗拿耗子，大跳忠字舞，惩治报信人，却反而将中国人喝婴儿汤的惊世丑闻之新闻价值进一步增值。鲁迅在《坟》里面不是就说：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

在的青年的使命！』

原来这话即使到今天还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我将会尽我的能力将这超级荒唐的事件在有自由的地方以图文并茂公诸于世，即使这会令中国人的兽行更为人所知，令我在飞机上更被外国服务员歧视也在所不辞。

〈原载于 2005 年 1 月《开放杂志》〉

《跋》「黄祸」确是发生了

◎ 钟祖康

在北欧的天涯海角，夜阑人静，我展读一篇一篇绝大部份曾刊登在《开放》的旧文，回望我多年来的心路，我看到一个中国的逆子，朝着荒野宣讲一些简单而真确得令人怀疑的道理，反反复覆，新瓶旧酒。我要把一些虽然写得很好却已因时局变化而变得过时的文章割爱，也把一些事后看来错得贻笑大方的评论抽掉。令我安慰的是，大部份的文章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许多我指出的问题，一百年前在中国就是这样，而按照我对中国的认识，一千年前的中国相信也是这样，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过时的。中国的精神文明气质始终没有大变，所以我们今天读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觉其过时。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教授在推荐序里说：『目前中国已进入「大国崛起」阶段，国势日盛，「国民性批判」似乎变得不合时宜。正因如此，锺祖康这部《来生不做中国人》更显其难能可贵，它并不分享中国崛起的欢欣症，却针对中国人难移之本性。』并说，这是『大国崛起声中的鸦噪』。的确，我并没有像无数中国人那样，感染中国崛起的欢欣症。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极不健全，极不公义，也极不环保，这是对求真求善，尚有一丝执着的人所不难体会。而且中国这样行恶，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当中许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而要走邪学歪。中国统治者从过去到今天，都没有为后代走出一条脚踏实地的正路来。

「为求富贵无所不为」

中国目前的文化，是彻头彻尾的「为求富贵无所不为」〈 get-rich-at-any-cost 〉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这样就会好起来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国这样是走邪门，最终并不能提升中国人的精神文明水平，甚至连物质生活水平，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里面有实质提升，就如历史学家李弘祺教授说的：『像这样的〈中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为原则，也不以之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维护统治机关 .....中国这样的体制一让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为止，然后朝代循环，一切从新开始 .....』

〈见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序言〉

一个民族里面若有小部份人不脚踏实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个民族，或当中大部份人都不脚踏实地，不拿出诚意和一点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来正视人生，而只一味以强凌弱收拾弱者，或虚应故事，或万般狡辩，则这样的民族，从常理推之，从人类历史观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所有的璀灿和繁华，都是一将功成，都是过眼云烟，并不值得希罕。

而我现在发出的鸦噪，不少有识之士也早已发过，如我以前提过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1839-1899)在其用中文写的《自西徂东》就说：「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 .....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 .....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树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 .....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 .....」并特此声明「多直言不讳」，「绝无浮谈」，以「警醒中国之人」。洋人用中文写书，多艰难啊！但还是要拚一口气把绝大部份中国人都有理解困难的显浅道理吐出来，这种良心，令我非常感动。「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这几个字就已道尽中国之国病所在，但傲慢的中国人却把这些逆耳忠言当作耳边风。

正如中国着名学者李慎之说，「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 Rule by Law 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见《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这就是因为「学问失其要」。不但「民主」、「法治」、「解放」、「政党」、「选举」等等在中国全走了样，共产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青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听起来似是危言耸听，但深谙中国者就会明白。这也是因为「学问失其要」。

中国政府借联合国掩护国企

在花之安向中国人当头棒喝「学问失其要」的一百二十年后，中国在五痨七伤、沉痾久病不医、百毒俱全的条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来了。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德性呢？

欧洲投资银行 (EIB)总裁梅斯达德(Philippe Maystadt 1948-) 早前就说「中国的银行具竞争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不用考虑社会或人权状况。」他说忧虑欧洲投资银行在亚洲和非洲等落后地方都不是中国银行的对手。

今年年初联合国要通过决议，敦促缅甸释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国却为了让中国「国企」成功争夺到缅甸的天然气、原油开采等多国觊觎的肥肉，把其他与之竞争的本身也不太重人权的亚洲国家击退，而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永久理事国的议席否决决议，理由竟然是，缅甸的局势「并不危及国际和平」。这无疑把中国人「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峰。这就是五千年文明的风姿，八荣八耻的道德新貌。

在苏丹，中国也重复着同一类模式的勾当，由中国政府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权跟苏丹的中国国企里应外合。当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压力下撤离了，却只有中国可以完全不理国际压力，不但雷打不动，还不声不响的把西方能源公司撤离时要脱手的生意统统接过来，实践江泽民提倡的「闷声发大财」。

曾驻尼日利亚和南非的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 (Princeton Lyman，1935-) 早已把中国人这一切的小权谋看在眼里，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国对非洲最具吸引力之处是能够提供免遭国际制裁的政治保护，而对于非洲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不设诸如政府管理、财政监督等政治条件。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国家公司所不能比的 .....中国向苏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协议 (complete package) 』，包括资金、技术援助，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中所具有的影响。」

所以，严格而言，把中国国企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万亿美元、全球规模最大的黑钱清洗活动。而事实上，世界上也确实有些公司因为被指清洗黑钱而被一些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拒绝上市申请。但由于中国国势日盛，而且中国人有仇必报，和在道德上毫无制约并愿意花钱，至今还没有听过有哪个国家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绝中国国企的上市申请，而美国维珍尼亚州众议员 Frank R. Wolf 自 2001 年起就要求美国纽约交易所把在苏丹大赚黑心钱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没大进展。

每天三百多人死于工业意外

也由于中国的竞争力主要建基对人权的践踏，不理劳工 (和消费者)的死活，中国目前每天因工业意外死亡的就有三百多人。这是因为，不理会生产安全可以大

大减低成本。而每死或每伤一个劳工所造成的赔偿(如有的话)或开支，在中国是低得可以不理，也如花之安说的，「 (中国人)视物为重，视人为轻.....缘其利欲熏心，故倒行逆施至如此耳 .....。」

虽然我基本同意鲁迅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但中国这样藉着不顾生产安全以提高竞争力，最终也会连别国不是愚弱的国民由于无法与之竞争或使用中国劣货而要陪葬。

针对中国每天三百多人死于工业意外的惊世纪录，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就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不仅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安全生产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同时还具有特殊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无所作为的思想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思路对头，真抓实干，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缩短西方国家普遍经历的安全周期。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 .....」。但西方国家在提升劳工权益的历史中，其动力来源主要不是技术提升，而是普遍自由并日趋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为民众奠下了道德伦理底线的宗教自由，这两样最重要的提升劳工权益的宝器在中国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国，政治虐杀和道德沦丧都是不设下限，没有底线的。德国的共产运动，迫使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改善劳工权益，从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包括社会保险等等劳工立法的国家，俾斯麦并称此社会改革为「实用基督教」(angewandtes Christentum) 。但中国的共产运动则只带来了对共产党的捕杀和最终由流氓治国的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精神文明一穷二白，中国凭甚么拿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凭甚么说「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 .....」？这是怎样定出来的？难怪中国国父孙中山说：「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按理，中国要花上西方所用时间的十倍才对〈但按照中国「国情」我根本就怀疑中国永远也做不到西方已经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治民主化议题上总是毫无必要的强调「循序渐进」，但在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议题上却要「超英赶美」。

中国落后不是纯技术的问题

中国人坚决相信西方的技术优势只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无法想象这与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关，甚至不相信这与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伦理道德基础有关。对于

洋人对待宗教信仰的严肃和巨大投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并每予嘲笑。今天，西方国家为甚么会「自找麻烦」，花那么多钱接收并呵护被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迫害的中国人；为甚么加拿大政府要为赖昌星这个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劳师动众，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导致庞大的贸易损失；为甚么美国、澳洲等洋人国家会花那么多钱为违反中国「一孩政策」的中国妇女提供政治庇护；为甚么美国国会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国法律的雅虎老板上听证会接受盘问和训话，对于这些，一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只觉得洋人多管闲事，这是因为，说得难听一点，绝大部份中国人的文明末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本来是自命文明优越过人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但绝大部份中国人并不感受得到。

中国人觉得，有逾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有上海的高楼和磁浮列车、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奥运金牌大国，甚至还将举办奥运，就是中国人文明的证据？

有些用心善良的人为中国辩护说，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中国人衣食足就会知荣辱，会文明起来的。但请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国大款和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有没有羞耻之心？又或那些虽不能如大款和中国领导人那样呼风唤雨，但已属人上之人的中国运动员怎样以其嚣张和野蛮震撼国际。原来在中国，一旦有羞耻之心，即使不被投进黑牢，也很难「先富起来」，在中国，因果关系是如此。

一般中国人只会觉得，只要扳回纯技术和纯物质的落后形势，中国人就会好起来。所以，许多中国人会对中国先后超越日、美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而自豪，也常常洋洋自得的说甚么福建 GDP，或广东 GDP 可望超过台湾，他们并不会理会中国人为制造这些出口产值和 GDP 糟蹋了多少自然资源、付上了多少血肉、生命、尊严和自由，他们在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优劣时，看来并不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

同理，绝大部份中国人〈包括海内外的中国教授或识字份子〉，看来也不觉得中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之匮乏，会怎样摧残中国文学作品的品质。他们会觉得，中国即使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不会影响中国人的文学创作表现，因此他们大都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专门跟中国作对，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写给奴才看的奴才习作。

又如最近香港政府说香港的学校将不再可以用广东话上课教中文课了，而是要用普通话来教，所以将从中国大陆大量输入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中文科教师。在此姑且不论何以有五千万人口说的广东话〈操挪威语者只有四百多万，操冰岛语者只有三十万〉也必须臣服于大一统政治而不获准提升广东话的书写潜力，但至今连以华人为主的、饭碗已岌岌可危的香港教育界反击时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极重要的论点，那就是教授语文〈或中文〉，本身并不可以单单考虑语言本身，也要考虑讲话人本身的文明水平，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程度。由来自中国大陆奴隶所的正牌奴才给原已相当奴性的香港人做中文老师，后果堪虞。就像一些中共领导或所谓中共知识界人物虽然普通话是字正腔圆了，但说出来的都不是人话。要是真的要输入普通话教师，也应从文明水平较高的台湾输入吧。

中国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国在雅典奥运也能以 32 金仅次于美国的 35 金，为甚么诺贝尔奖的成绩这样寒酸？

欧盟的成立，把欧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国的崛起，却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分别。我一直担心的「黄祸」确是发生了。

〈原载于 2007 年 12 月《开放杂志》〉